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歷史小說《北京法源寺》之研究—從主角譚嗣同的視角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of “Beijing Fayuan Te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agonist Tan Sitong

賀忠民

Chung-min Ho

指導教授：陳章錫 博士

Advisor: Cheng-Hsi Cheng,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January 2023

# 南華大學

文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歷史小說《北京法源寺》之研究—從主角譚嗣同的視角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of "Beijing Fayuan Tem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agonist Tan Sitong

研究生：智忠民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陳章錫  
曾金昇  
高知遠

指導教授：陳章錫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9日

## 中文摘要

新歷史主義把文學看成是歷史與文學交匯之處，同時指出文學也是一種參與塑造裡歷史動能的力量，《北京法源寺》是作家李敖在台灣的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但歷史充滿斷層，歷史由論述構成，文本作者如何小說方式發揮想像力書寫以文補史之創作，同時也符合新歷史主義之論點。本研究研先從戊戌變法中譚嗣同真實的歷史事件材料中，與文本內作者所書寫的真实與虛構及想像三方面開始，接下來研究戊戌變法中譚嗣同在文本的敘事結構，最後從歷代俠客的生死結構的對應關係，分析文本中譚嗣同的意涵結構以及墨家的世界觀精神，作為研究文本中戊戌變法中譚嗣同是烈士還是俠義之論點與用以管窺作者李敖的意識型態，以上研究的目的，綜以歷史、文學、意識三方面讓《北京法源寺》被重新解讀並產生歷史與文學價值。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先就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開始，爰以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論文架構，期擴展歷史小說研究新領域。

第二章：將對文本作者李敖的歷史文學背景及創作《北京法源寺》過程做引介，接著介紹歷史人物譚嗣同與戊戌政變之關係，最後地誌上的北京法源寺做與文本有關的背景研究。

第三章：以《北京法源寺》的歷史敘事做分析，首先分析比對文本書寫的歷史事件與真實歷史事件相同之處，其次分析文本中的虛構與想像，最後研究作者以文補史的地方。

第四章：以《北京法源寺》的文本小說敘事研究，首先分析文本敘事時間及空間結構，其次分析文本主角譚嗣同扁平化的人物結構，最後分析主角譚嗣同在文本中生與死情節結構。

第五章：《北京法源寺》的俠義意識做分析，首先分析法源寺的建寺的「善」與「偽善」思辨過程歸納，其次由文本中的譚嗣同分析俠義精神的人格探究，最後分析譚嗣同與俠義的對應關係、意涵結構後，推論譚嗣同的歷史意識及世界觀為何。

第六章：綜合本文析論觀點，將《北京法源寺》主角譚嗣同融合歷史敘事、小說敘事及俠義思想，對作者李敖的新歷史主義的表現手法，給予歸納及彰顯《北京法源寺》中歷史人物譚嗣同的創作精義。

關鍵字：北京法源寺、李敖、譚嗣同、新歷史主義、兩崑崙

## Abstract

New Historicism regards literature as the intersection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points out that literature is also a force that participates in shaping the kinetic energy of history. "Beijing Fayuan Temple" is the first full-length historical novel written by writer Li Ao in Taiwan, but history is full of Faults, history is composed of discourses, and how the author of the text uses his imagination to write in a novel way to supplement history, also conforms to the argument of new historicism. This research begins with Tan Sitong's real historical event materials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the truth, fiction and imagination written by the author in the text.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and death structures, the analysis of Tan Sitong's connotation structure and the spirit of Mohism's world outlook in the text, as the argument of whether Tan Sitong was a martyr or a chivalrous man during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in the text, and the author Li Ao's ideology, the purpose of the above research, Based on three aspects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consciousness, "Beijing Fayuan Temple" is reinterpreted and has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value.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Chapter 1: Start with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purpose of this thesis, with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methods,

The scope of research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sis are expected to expand the new field of historical novel research.

Chapter Two: Introduce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background of the author Li Ao and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Beijing Fayuan Temple", then introdu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figure Tan Sitong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and finally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xt related to Beijing Fayuan Temple in the topography Research.

Chapter 3: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Fayuan Temple in Beijing", firstly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historical events written in the text and the real historical events, then analyze the fiction and imagination in the text, and finally study the author's supplementary history The place.

The fourth chapter: Based on the text novel narrative research of "Fayuan Temple in Beijing", firstly analyze the time and space structure of the text narrative, then analyze the flat character structure of the protagonist Tan Sitong, and finally analyze the plot structure of the protagonist Tan Sitong's life and death in the text.

Chapter V: Analysis of the chivalrous consciousness of "Fayuan Temple in Beijing", firstly analyzing the speculative process of "goodness" and "hypocris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ayuan Temple, secondly, Tan Sitong in the text analyzes the personality exploration of chivalrous spirit, and finally After analyzing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

Sitong and chivalry and the connotation structure, it is deduced what Tan Sitong'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world outlook are.

Chapter 6: Synthesizing the analysis point of view of this article, the protagonist Tan Sitong of "Beijing Fayuan Temple" integrates historical narrative, novel narrative and chivalrous thinking, and summarizes and highlights "Beijing Fayuan Temple" to the author Li Ao's new historicism. The essence of creation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 Tan Sitong.

Keywords: Beijing Fayuan Temple, Li Ao, Tan Sitong, New Historicism, Two Kungluns



# 目錄

中文摘要 .....	I
Astract .....	II
目 錄 .....	IV
圖目錄 .....	V
表目錄 .....	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	5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論文架構 .....	7
第二章 李敖與創作《北京法源寺》 .....	9
第一節 李敖歷史學術背景和文學創作 .....	9
第二節 李敖創作《北京法源寺》過程 .....	11
第三節 歷史的譚嗣同與北京法源寺 .....	13
第四節 本章小結 .....	17
第三章 《北京法源寺》歷史敘事的真實與虛構 .....	19
第一節 《北京法源寺》歷史敘事的真實 .....	20
第二節 《北京法源寺》歷史敘事的虛構與想像 .....	27
第三節 《北京法源寺》填補歷史的空白的歷史敘事 .....	34
第四節 本章小結 .....	42
第四章 《北京法源寺》小說敘事研究 .....	44
第一節 文本敘事時間及空間結構 .....	44
第二節 譚嗣同扁平化的人物結構 .....	59
第三節 譚嗣同的生與死情節結構 .....	64
第四節 本章小結 .....	71
第五章 《北京法源寺》俠義思想 .....	73
第一節 文本「善」與「偽善」的之思辨與歸納 .....	73

第二節 譚嗣同具俠義精神的人格探究 .....	78
第三節《北京法源寺》俠義的對應關係、意涵結構分析 .....	84
第四節《北京法源寺》中譚嗣同的世界觀 .....	87
第五節 本章小結 .....	90
第六章 結論 .....	92
參考文獻 .....	95

## 圖目錄

圖 1：獄中遺札第一封 .....	98
圖 2：獄中遺札第二封 .....	99
圖 3：獄中遺札第三封 .....	100

## 表目錄

表格 1：文本戊戌政變六件重要事件 .....	21
表格 2：文本戊戌政變重要人物 .....	24
表格 3：文本敘事時間（一） .....	46
表格 4：文本敘事時間（二） .....	46
表格 5：譚嗣同移動地點 .....	57
表格 6：康有為對善的斷定 .....	75
表格 7：康有為與余法師對善的斷定（一） .....	75
表格 8：康有為與余法師對善的斷定（二） .....	76
表格 9：文本中俠客兩大類表 .....	81
表格 10：文本中俠客引述歸納 .....	81
表格 11：歷代荊軻型俠客一覽 .....	84

# 第一章 緒論

《北京法源寺》<sup>1</sup>是作家李敖<sup>2</sup>在臺灣的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新歷史主義<sup>3</sup>把文學看成是歷史與文學交匯之處，同時指出文學也是一種參與塑造裡歷史動能的力量，既然是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歷史充滿斷層，歷史由論述構成，文本作者如何透過小說用小說方式發揮想像力書寫以文補史之創作，同時也符合新歷史主義之論點。本研究研先從戊戌變法中譚嗣同真實的歷史事件材料中與文本內作者所書寫的真實與虛構及想像三方面開始，接下來研究戊戌變法中譚嗣同在文本的敘事結構，最後以高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的關鍵理論<sup>4</sup>，從結構的對應關係、意涵結構、世界觀精神作為研究文本中戊戌變法中譚嗣同是英雄還是俠義之論點用以管窺李敖的意識型態，以上研究的目的，是讓《北京法源寺》被重新解讀並產生歷史文學價值。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研究動機

《北京法源寺》創作時代背景乃作者李敖第一次成為政治犯時在獄中決定並構思故事架構，出獄後於 1976 至 1991 年間成書<sup>5</sup>，小說以北京城的法源寺為場景做為故事之開始，情節描述 1898 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歷史稱六君子之中的譚嗣同為變法失敗以身殉道，喚起人民推翻西太后政權，擁護變法的故事。

《北京法源寺》畢竟是一部歷史小說，文本的主角設定為譚嗣同，為了想了解更多了解歷史上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到底發生了什麼真實的事，我參閱了當年參與戊戌變法梁啟超先生所著的《戊戌政變》〈譚嗣同傳〉<sup>6</sup>內容提及當時他所見，到譚嗣同的生與死，及譚嗣同孫子譚訓聰在《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sup>7</sup>所著的譚嗣同傳，內容提及當時他記憶中的祖父，這兩部書都是傳記或回憶錄方式記錄了記憶與回憶，共同想表達的是當年譚嗣同經歷的實景，而且也描寫了想要譚嗣同以身殉道擁護變法，因此我為了解及想發現作者李敖用歷史小說

<sup>1</sup>李敖：《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

<sup>2</sup>李敖（1935 年 4 月 25 日－2018 年 3 月 18 日），字**敖之**、臺灣歷史學家、作家、電視主持人、政治評論員、時事評論員、前立法院無黨籍立法委員、文化批評者。

<sup>3</sup>盛寧：《新歷史主義》，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28。

<sup>4</sup>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北，桂冠出版社，1990。

<sup>5</sup>李敖：《北京法源寺》〈結尾：我寫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

<sup>6</sup>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香港，友方出版社，1958。

<sup>7</sup>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與上述兩本傳記或回憶錄有什麼不同？是我的第一個動機。作者李敖自己在，我寫「北京法源寺」談到如下：

正宗小說起於十八世紀，紅於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小說家說來，本已太遲。」「我相信除非小說加強僅能由小說來表達的思想，它將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說筆觸來說故事的也好、糾纏形式的也罷，其實都難挽回小說的頹局。<sup>8</sup>

這裡指出文本作者透露自己有意寫的是一部「表達思想的歷史小說」，這句話有兩個含意。第一個含意是這是一部小說，第二個含意是要透過小說表達思想，因此就小說的部份一定會有角色，從愛德華·摩根·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sup>9</sup>談到人物的角色有扁平與圓形的角色，文本中的譚嗣同是如何被書寫？會是扁平或圓形的角色？小說的情結是如何的書寫？另外文本從敘事時間空間會有什麼的敘事結構？想了解小說的敘事結構是我的第二個動機。

接著因為文本作者提到《北京法源寺》是一部「表達思想的歷史小說」，小說中的重要人物譚嗣同是一位充滿愛國情操的志士，張灝<sup>10</sup>在《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一書提及，譚嗣同在中國近代史上，譚嗣同是一位有特殊歷史意義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只活了三十六年，而他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只不過三、四十年的時間，但在這短短的時間裡，卻留下了光彩的事蹟、感人的身世和深遠的影響。文本作者如何透過小說中的譚嗣同表達什麼思想？另外文本作者自己想表達什麼意識？他的世界觀又是什麼？是我的第三個動機。

## 二、研究目的

《北京法源寺》是一個文化的符碼<sup>11</sup>，北京法源寺這個建築物符號它必須透過歷史事件及小說主角和情節以一定的順序組織起來而形成意義，當《北京法源寺》意義的關係是透過小說系統的歷史文化固定起來，我們才能夠清楚易懂它的意義，也才能了解隱藏文化符碼的運作與實踐。

因此從我想了解《北京法源寺》這部自稱「表達思想的歷史小說」到我想從新歷史主義研究這部小說，主要的原因是在新歷史主義<sup>12</sup>指出歷史是文學或文本，更進一步將文學視為歷史，文本既是歷史小說作者如何利用書寫主角譚嗣

<sup>8</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結尾：我寫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365頁。

<sup>9</sup> E.M.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

<sup>10</sup>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1988

<sup>11</sup> Chris barker 羅氏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五南出版社，2004，86頁。

<sup>12</sup>陳滢巧：《圖解文化研究》，臺北，易博士出版社，2007，122頁。

同歷經了一場失敗的政變的歷史事件，寫成小說體並傳達文本作者的思想及文本如何讓文學與歷史並存與平衡是本研究的最終目的，因此本研究有三個目的分述如下：

第一、歷史充滿斷層同時歷史由論述構成，研究文本作者如何透過小說將自己參與歷史，在文本中主角譚嗣同參與政變的過程中哪些是與真實歷史事件相同？哪些又是文本作者的虛構與想像？是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

第二、歷史由論述構成，既然《北京法源寺》是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在沒有文本之外的世界，小說中會有角色的設定及情節發展，文本中的主角設為譚嗣同情節是他參與了戊戌政變，在情節的發展上譚嗣同是如何開始與結束他參與戊戌政變的過程，因此文本之敘事結構為何？是研究的目的之二。

第三、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我們都透過這種結構再理解整個世界，文本作者從主角譚嗣同的敘事視角的書寫及敘事中傳達的意識型態為何？世界觀為何？是研究的目的之三。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在前人研究方面，首先文本作者李敖在〈我寫《北京法源寺》〉提到這本書想要強烈表達如下：

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廟為縱線，以抽象的、煙消云散的歷朝各代的史事人物為橫剖，舉凡重要的主題：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隱、朝野、家國、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強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變、去留、因果、經濟（經世濟民）等等，都在論述之列。他說這是一部內容豐富又罕見的思想的小說。<sup>13</sup>

這是文本作者自己對自己的文本做出說明，以法源寺這座唐朝至今另在的歷史古廟為縱軸，再以君臣之關係、夷夏之種族、中外之強弱、群己與人我、公私與情理、去留之決定、因果之輪迴..等為橫軸，來書寫一部具有思想的小說。

---

<sup>13</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結尾：我寫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363。

其次第一位研究學術論文為曾建誌：《《北京法源寺》救國思想對民族教育重建之研究》<sup>14</sup>在研究緒論中提及研究的目的是以北京法源寺這個歷史的古剎開始，逐一探討書中所呈現的忠奸、善惡的意涵，考量現今臺灣的族群對立的隱憂，思維倡導民族教育重建的重要性。此論文的第二章已將作者的生平羅列完整，並對法源寺的歷史文獻做了歸納，在人物方面對譚嗣同的生平也有深入介紹，論及《北京法源寺》作品內容風格易稍作介紹與評析，此碩士論文論述部分著墨甚深在於譚嗣同的忠與孝。

在書籍部分與《北京法源寺》有關的三部書，分別為李敖：李敖：《李敖回憶錄》，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sup>15</sup>，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sup>16</sup>。

第一本《李敖回憶錄》李敖為文本作者親自講述了他從出生到 62 歲之間從一位自許文壇彗星到與眾人論戰，有身之年出版被查禁的書高達九十六種之多並受到十四年牢獄之災的獨特生涯，書中論及他創作《北京法源寺》的動機與完成創作的過程。

第二本《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這是一本李敖在創作《北京法源寺》看過的書，譚嗣同是《北京法源寺》小說中的主角，這本書作者不是用傳記體書寫譚嗣同而是從性格、身世與環境的描述開始再透過他的一生行跡與作品，鉤畫出譚嗣同一生由保守到激進的思想發展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影響和變化。

第三本為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譚嗣同傳〉，因為梁啟超先生為譚嗣同之好友也親自參與戊戌政變是當時的歷史人物，他將譚嗣同以傳記體方式寫出譚嗣同的一生，其中包括譚嗣同所經歷的戊戌政變。

這三本書都很重要第一本《李敖回憶錄》談到《北京法源寺》創作的動機，第二本《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談到《北京法源寺》主角譚嗣同的性格跟他的思想還有他心境的轉變，第三本《戊戌政變記》是譚嗣同他在戊戌政變中歷經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梁啟超為當事人在戊戌政變發生的當時是與譚嗣同共同一起經歷這起歷史事件。

另有些文章的評論如臺灣作家楊照於 2000 年 2 月評述認為《北京法源寺》無情節也少有戲劇起伏，評論如下：

自己大言夸夸，自欣自憐說《北京法源寺》是什麼樣了不起的曠世巨著，結果反而使得文學界的人心生反感，望而卻步；非文學界的人慕名

<sup>14</sup> 曾建誌：《北京法源寺》救國思想對民族教育重建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2010。

<sup>15</sup>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sup>16</sup>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香港，友方出版社，1958。

而來，卻只見滿紙議論，既無情節也少有戲劇起伏，讀完只覺頭痛和失望。<sup>17</sup>

師大教授古添洪在〈讀李敖《北京法源寺》〉文章中提出

歷史小說，可說是一個雜種，可以偏歷史，也可偏小說，而西方則以後者為多。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可說是傳統的「文史哲不可分」的高度發揮。這也未嘗不可是歷史小說的一個可能的模式。我寫這個文本閱讀，其原因不僅於此，而更多的是有感於我們此間的文學作品，感性刻劃細膩，而哲學的思維，卻往往付之闕如。我希望我們的文學，知性與哲學多點些，而讀者也能在閱讀裡，要求多一點的知性，並且懂得欣賞這特質。<sup>18</sup>

古添洪教授認為這部小說的雖是歷史小說但內涵卻包括文史哲，已經不是單純的一部寫實小說。

由於以新歷史主義方法研究<sup>19</sup>將歷史事件轉換成文本，文本轉換成社會普遍共識，李敖書寫《北京法源寺》書中的戊戌政變主角譚嗣同的歷史，文學，思想主義方法等的歷史小說相關研究，目前並無研究專著；因此研究者將本論文限制在書中所呈現的以文補史、俠義思想、歷史小說的敘事結構等議題上研究，日後讓有更多的先進及後學能對其他歷史文學作品或是有關《北京法源寺》作品，有更多更廣泛及深入的研究。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北京法源寺》共十七章外加一篇〈我寫北京法源寺〉，本論文採用李敖出版社於 2000 年出版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全書共三六六頁為研究文本<sup>20</sup>。

本論文採取以下主要研究方法研究，分別陳述：

一、文獻研究法：蒐集及整理有關《北京法源寺》與戊戌政變人物相關的書籍、論文、期刊，作其連結及比較。

<sup>17</sup> 楊照：〈評論李敖：李敖與文學〉，臺灣，中國時報 2000.2.17。

<sup>18</sup> 引自：古添洪：〈讀李敖《北京法源寺》〉，臺北，觀察雜誌第 24 期，2015。

<sup>19</sup> 盛寧：新歷史主義，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29 頁。

<sup>20</sup> 李敖：《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

二、新歷史主義研究法：歷史也是一種文學，陳澄巧《圖解文化研究》<sup>21</sup>論及從80年代發展的後結構主義去中心化的概念出現後，讓新歷史主義對定義歷史有了不同，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敘述同一個故事，只是呈現當時的某個觀點，而非重現事實，譚嗣同參與戊戌政變是事實，以《北京法源寺》為書名，文本作者用北京法源寺的歷史為開始，到譚嗣同捨身殉國停靈在北京法源寺，法源寺不過是一個能指的符號，其所指正是作者的意識參與歷史部分，本論文將以新歷史主義探討文本如何將歷史與文學兼具。

三、小說為文學表達的一種方式，小說作品的結構及敘述方式以在張雙英《文學概論》<sup>22</sup>提及「小說主要特色」有小說的敘事觀點、小說的時間及情節和人物我以這個作為研究，其中角色研究以愛德華·摩根·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sup>23</sup>〈人物〉角色的型態作為《北京法源寺》在文學方面的研究。

四、胡亞敏《敘事學》對視角的定義「視角指的是敘述者或者是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者是狀態，換句話說敘述者或者是人物從什麼角度觀察故事」<sup>24</sup>，為研究作者如何對《北京法源寺》主角譚嗣同視角書寫？本論文以法國茲韋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敘述視角分的三種形態：全知視角、內視角和外視角。分析《北京法源寺》文本作者用什麼視角書寫主角譚嗣同。

五、本論文將由《北京法源寺》文本，以高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的意涵結構，解構《北京法源寺》主角譚嗣同的視角看敘事中的歷史傳達的意識型態為何？

本論文將透過《北京法源寺》文本中的主角譚嗣同的視角，如何被敘事書寫及如何表達譚嗣同的歷史意識，作為研究題目。

至於本論文研究步驟，研究者闡述如下：

一、探究《北京法源寺》作者及書中主角與書名，首先由李敖開始，了解作者自身的歷史與文學背景及創作動機，接著了解書中主角譚嗣同的歷史背景與思想，另外成為書名的北京法源寺是具有歷史背景的地誌，最後將探究北京法源寺與文本與關係。

<sup>21</sup> 陳澄巧：《圖解文化研究》，臺北，易博士出版社，2007。

<sup>22</sup> 張雙英：《文學概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

<sup>23</sup> E.M.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

<sup>24</sup> 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19頁。

- 二、針對《北京法源寺》書中內容主軸之歷史事件戊戌政變，研究文本作者在書中做書寫歷史敘事時那些是與真實事件相近那些是虛構與想像，文本作者如何以文補史。
- 三、從小說中角色譚嗣同的視角，研究《北京法源寺》文本敘事時間及空間結構，就文本呈現作者如何塑造文本角色譚嗣同的人物結構及譚嗣同在小說中面臨光緒年間戊戌變法的生與死情節結構。
- 四、針對書中「俠義」的思想，分別就文本「俠客」與「俠義」之不同觀點作探討，藉以探討譚嗣同的捨身殉國是來自「俠義」的思想所產生的影響。
- 五、最後則以高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的意涵結構，解構後推論作者譚嗣同的世界觀為何。

####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論文架構

《北京法源寺》故事時間為清朝光緒至民國成立，而主要的敘事時空以戊戌變法前後一百天為時空背景，人物以文本主角譚嗣同為主軸，所以本論文將研究範圍規範如下：

- 一、清光緒年間戊戌變法前後的歷史為研究的上下限。
- 二、在《北京法源寺》一書所呈現戊戌變法中譚嗣同從參與變法到死亡為止，為研究重點論述取材範圍。
- 三、《北京法源寺》是歷史小說，透過文本譚嗣同的角色對作者李敖在文本中如何書寫歷史，文學，思想主義方法等研究。
- 四、《北京法源寺》是歷史小說並不是譚嗣同的傳記，本論文研究的對象是透過譚嗣同的文本角色性格及行跡，鉤畫出作者對他的思想發展與心路歷程，同時呈現譚嗣同的意識為何？因此本論文研究的對象是文本主角譚嗣同，目的是從主角譚嗣同的敘事書寫推論譚嗣同的歷史思想意識為何。
- 五、研究結構如下：共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包括：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論文架構共五個小節。

- 第二章：將對文本作者李敖的歷史文學背景及創作《北京法源寺》過程做分析，接著對歷史上的人物譚嗣同與地誌上的北京法源寺做與文本有關的背景研究，本章包括李敖與歷史學術和文學背景、創作《北京法源寺》過程、歷史的譚嗣同與北京法源寺共三個小節。
- 第三章：將對《北京法源寺》的歷史敘事做分析，首先分析比對文本書寫的歷史事件與真實歷史事件相同之處，其次分析文本中的虛構與想像，最後研究李敖的歷史敘事以文補史的地方，含小結共四個小節。
- 第四章：將對《北京法源寺》的文本小說敘事研究，首先分析文本敘事時間及空間結構，其次分析文本主角譚嗣同扁平化的人物結構，最後分析主角譚嗣同在文本中生與死情節結構，含小結共四個小節。
- 第五章：將對《北京法源寺》的俠義意識做分析，首先分析法源寺的建寺的「善」與「偽善」思辨過程歸納，其次由文本中的譚嗣同分析俠義精神的人格探究，最後以高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的意涵結構，解構俠義的對應關係、意涵結構後，推論譚嗣同的世界觀為何，含小結共四個小節。
- 第六章：將對文本書寫歷史敘事及小說敘事是否具有歷史與文學的平衡及也對推論譚嗣同的世界觀為何？做出結論。

## 第二章 李敖與創作《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是一部歷史小說，在探討這部小說之前，有必要對作者的生平及寫作的心路歷程做探討，文本內容中的主角譚嗣同在歷史上背景為何？北京法源寺是個地理位置同時也是《北京法源寺》小說的名稱，因此也有必要對其歷史與文本之關係做了解，本章將針對作者李敖先生的創作動機與心路歷程及譚嗣同與北京法源寺在歷史上的背景做研究分析其目的為本論文研究之相關人文背景做為起點。

### 第一節 李敖歷史學術背景和文學創作

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在其回憶錄<sup>25</sup>提及在1954年以同等學力參加大專聯招，第一志願填的是臺灣大學中文系，因分數關係考上台大法律專修科，因為自己的志向為文學，因此6月27日自動退學重考並於1955年時年二十歲，以第一志願考入臺灣大學歷史系。回顧李敖先生的求學過程中可以發現他對文學及歷史具有興趣，從放棄讀法律系重考後入歷史系就讀的決定，改變了他的命運從此他不是一位律師或法官而成為一位歷史學家。

李敖先生在世期間出版許多有關歷史的書籍，比較有名的有：依歷史人物的評傳有《胡適研究》<sup>26</sup>、《胡適評傳》<sup>27</sup>、《蔣介石評傳》<sup>28</sup>，在中華文化的批判有《獨白下的傳統》<sup>29</sup>與《傳統下的獨白》<sup>30</sup>，在中國文學著作有《上下古今談》<sup>31</sup>、《要把金針度與人》<sup>32</sup>，最後在歷史專著有《讀史指南》<sup>33</sup>、《中國近代史新論》<sup>34</sup>、《中國現代史正論》<sup>35</sup>、《中國現代史定論》<sup>36</sup>等。

---

<sup>25</sup>李敖：《李敖回憶錄》第五章〈台大〉，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7。提到：在1954年以同等學力參加大專聯招，第一志願填的是台大中文系，但因幾分之差，卻誤入台大法律專修科。我個人本來志在學文，不在弄法，只因幾分之差，沒考入台大文學院，淪入法學院，心有未甘，決定重考。但台大學生不能重考本校，得先自動退學才成。我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氣，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動退學了。1955年我二十歲，暑假後以第一志願入台大歷史系。

<sup>26</sup>李敖：文星叢刊李敖作品集《胡適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70。

<sup>27</sup>李敖：文星叢刊李敖作品集《胡適評傳》，臺北，文星書店，1970。

<sup>28</sup>李敖：《蔣介石評傳》，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0。

<sup>29</sup>李敖：文星叢刊李敖作品集《獨白下的傳統》，臺北，文星書店，1970。

<sup>30</sup>李敖：《傳統下的獨白》，臺北，李敖出版社，1990。

<sup>31</sup>李敖：文星叢刊李敖作品集《上下古今談》，臺北，文星書店，1970。

<sup>32</sup>李敖：李敖大全集《要把金針度與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1。

<sup>33</sup>李敖：李敖大全集《讀史指南》，臺北，李敖出版社，2001。

<sup>34</sup>李敖：李敖大全集《中國近代史新論》，臺北，李敖出版社，2001。

<sup>35</sup>李敖：李敖大全集《中國現代史正論》，臺北，李敖出版社，2001。

<sup>36</sup>李敖：李敖大全集《中國現代史定論》，臺北，李敖出版社，2001。



以上這些與歷史有關的著作，及 1993 年他任教東吳大學歷史系，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在 1994 年 8 月 15 日的一場公開演講中說：「李敖是備受爭議的作家，有人說他是瘋狗、有人說他是流氓、有人說他打手、有人說他天才，但我們很單純，就是讓任何角度的學者都可在東吳發展一個看法、一個見解。」<sup>37</sup>，都足以證明他是一位在臺灣的歷史學家，李敖先生在臺灣大學讀歷史系過程中葉慶炳教授公開誇獎他的作文全班第一<sup>38</sup>，在世期間出版與文學相關的作品有：《為文學開窗》<sup>39</sup>、《恰似我的溫柔》<sup>40</sup>《啟發你的小故事》<sup>41</sup>、《只愛一點點》<sup>42</sup>、《我們沒有明天》<sup>43</sup>、愛情小說《上山、上山、愛》<sup>44</sup>等，生涯中文學作品雖然沒有歷史作品多，但其著作在文學型式的散文與愛情小說都可以證明他是具有文學寫作能力，他曾經在 1979 年 9 月 18 日《中國時報》上發表〈忘了我是誰〉歌詞如下：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了心裡都是你，忘了我是誰。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時候心裡跳，看過以後眼淚垂。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  
不看你也愛上你，忘了我是誰。<sup>45</sup>

之後由許翰君作曲、王海玲演唱新格唱片公司以「金韻獎」第一名推出專輯唱片後引起市場轟動及暢銷，假若一個歷史學家跟一個文學家如果出版的書賣不出去，雖然不能代表這些作品沒價值，但可以這麼說市場接受度與傳播都不高，李敖先生雖說不是每一本的作品都暢銷，但有很多都是十分暢銷，至今過世的李敖先生有些書籍目前出版社還在出版，包括《北京法源寺》這也證明了他是受讀者歡迎的，尤其是《北京法源寺》於 2000 年 1 月，李敖宣稱《北京法源寺》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以上都足以證明他也是一位寫作長才。

---

<sup>37</sup> 引自：李敖罵蔣經國 卻被蔣經國之子章孝慈聘到東吳任教，中國時報新聞網記者李志成，2018/03/18，<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18002233-260405?chdtv>

<sup>38</sup> 李敖：《李敖回憶錄》第五章〈台大〉，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7。提到：中文是葉慶炳教的，第一次繳作文，他雖在班上公開誇獎李敖的作文全班第一。

<sup>39</sup> 李敖：《為文學開窗》，臺北，李敖出版社，2001。

<sup>40</sup> 李敖：《恰似我的溫柔》，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9。

<sup>41</sup> 李敖：《啟發你的小故事》，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9。

<sup>42</sup> 李敖：《只愛一點點》，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9。

<sup>43</sup> 李敖：《我們沒有明天》，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9。

<sup>44</sup> 李敖：《上山、上山、愛》，臺北，李敖出版社，2001。

<sup>45</sup> 李敖：《李敖回憶錄》第十四章〈回憶〉，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7。

## 第二節 李敖創作《北京法源寺》過程

李敖先生在自傳提到在他的人生歲月中坐過兩次牢，第一次為西元 1971 年至 1976 年因叛亂罪判刑主文為李敖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六年，時年三十六到四十一歲<sup>46</sup>；第二次為西元 1981 年至 1982 年因侵占罪名判刑半年，時年四十六歲<sup>47</sup>，兩次牢獄共被關了六年二個月。《北京法源寺》作為書名，是第一次當政治犯時在獄中決定的<sup>48</sup>，整個寫作的過程在我寫《北京法源寺》描寫如下：

在那種年復一年的陰霾裏，我構想出幾部小說，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由于在黑獄里禁止寫作，我只好粗略的構想書中情節，以備出獄時追寫。一九七六年我出獄，在料理劫后之餘，開始斷斷續續寫了前幾章。一九七九年我復出文壇，在其他寫作方面，一寫十二年，出書一百二十種，被查禁九十六種，被查扣十一萬七千六百冊。這十二年間，幾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寫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誤了。十二年中，只斷續寫了萬把字，始終沒法完成。<sup>49</sup>

由於坐監期間，寫作是被禁止的，因此李敖對文本先粗略的構想情節，出獄後的 12 年間陸續創作，只斷斷續續寫了萬字，後來下定決心每天寫兩個多小時，〈我寫《北京法源寺》〉描寫如下：

《北京法源寺》將不知何年何月問世了。因此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天寫兩個多小時，終於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sup>50</sup>

文本最後終於在一九九零年底完成整部小說並交付出版，以上為李敖先生書寫〈《北京法源寺》〉的過程。

<sup>46</sup>李敖：《李敖回憶錄》第十二章〈監獄〉，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7 年 9 月 15 日出版。提及：我在 1972 年自保安處改押景美軍法看守所後，等候軍法審判，全部過程中，有可笑的一些變化。原來我在警總軍法處被亂判叛亂的「主文」是：李敖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六年。判了我十年大獄。判決日是 1972 年 3 月 10 日。

<sup>47</sup>李敖：《李敖回憶錄》第十四章〈復出〉，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7 年 9 月 15 日出版。提及：我是 1981 年 8 月 10 日再度入獄的，表面上是普通刑事案件，實質上是第二次政治犯入獄。

<sup>48</sup>李敖：《北京法源寺》〈結尾：我寫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一文指出「《北京法源寺》作為書名，是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在國民黨黑獄中決定的。」

<sup>49</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結尾：我寫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362。

<sup>50</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結尾：我寫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363。

至於李敖先生寫《北京法源寺》的動機，他在《李敖回憶錄》〈二進宮〉寫道好友許以祺有一篇《〈鐘聲無恙我將歸〉——李敖二度出獄有感》，認為許友頗能知他因此在回憶錄中全文照登，其中談到有關《北京法源寺》如下：

1980年再去看他時，他說他正在寫有關譚嗣同的歷史長篇。他滔滔不絕地講譚的滿腔熱血，他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胸懷，以及譚的文學造詣。戊戌政變失敗後，譚不願逃走，寧可以死酬國，在菜市口被清廷斬首時毫不畏懼從容就義。李敖當時講得很激動。這種事本來就是使人感動的，但對李敖，卻不止此。你會覺得他是在身體力行。那天我們談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來了，帶來一個扇面送我。他記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寫幾個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譚嗣同的詩給我。前首八句頗能表達李敖自己的情懷：

無端過去生中事， 兜上朦朧業眼來。  
燈下髑髏誰一劍？ 尊前屍塚夢三槐。  
金裘噴血和天鬥， 雲竹聞歌匝地哀。  
徐甲儻客心懺悔， 願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說李敖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鬥志。二十年後，本性未改。許多人說李敖這樣下去遲早是一個悲劇角色。看他的詩，看他對譚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準備似的。他不止一次對我說，你們這些在外面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的精英，但是你們為中國做了些什麼？這是李敖對我們的期望，而我們對李敖的期望是什麼？李敖第二次入獄，多少人覺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聽途說，落井下石，我們連起碼的把人同事分別開來都做不到。我們在乎的還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則支持。<sup>51</sup>

李敖先生在獄中滿腔熱血提及戊戌政變的譚嗣同有三項人格特質，第一項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胸懷，第二項譚嗣同是具文學造詣的文人，第三項戊戌政變失敗不願逃走，被斬首時毫不畏懼從容就義，這是李敖口中譚嗣同，至於為什麼李敖如此欣賞譚嗣同？這似乎與李敖在獄中的情境想似，因為他與譚嗣同都是政治犯名義進監獄，他自己也有豐富的文學造詣，同時他被關之前他助彭明敏出國自己留下來被關與譚嗣同勸梁啟超出國去日本自己留下來入獄。這種英雄惜英雄，是最有可能的寫作動機，最後在文本完成之後，李敖在〈我寫《北京法源寺》〉描寫如下：

我高興我完成了以大人物為主角的這部《北京法源寺》。寫大人物是多麼振奮自己、振奮人心的事！書中大人物之一譚嗣同，他以身殉道、"

<sup>51</sup>引自李敖：《李敖回憶錄》第十五章〈二進宮〉，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7年9月15日出版。頁387

踔屬敢死"（章大炎語），更是"清季以來"、"一人足以當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語。）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學》一書。<sup>52</sup>

李敖用《北京法源寺》這部歷史小說寫出心目中的英雄譚嗣同，讓世人透過閱讀去理解譚嗣同以身殉道、實踐自己的仁學並具俠義精神，是在李敖心目中的一位英雄。

在過往李敖先生為了要求日本政府對臺灣慰安婦正式道歉及賠償，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辦自己珍藏的百件珍藏義賣會，而這些募款全數用來義助慰安婦<sup>53</sup>，由他對臺灣慰安婦打抱不平之舉，可見李敖先生自己也是具有俠義精神之人，2018年李敖辭世，總統蔡英文總統表示，在那個因為威權壓迫而寂靜無聲的時代，因為有李敖而不再沉悶，他的過世，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消逝。<sup>54</sup>

### 第三節 歷史的譚嗣同與北京法源寺

#### 一、歷史的譚嗣同

譚嗣同，湖南長沙瀏陽人，1865年陰曆二月十三日出生於北京宣武門外爛熳胡同，十二歲染役幾殆康復後取字「復生」<sup>55</sup>，1898年於陰曆七月十三日下午二時西太后旨諭軍機大臣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者即處斬，下午四時問斬於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時年33歲，同時與被害的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等維新人士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譚嗣同在1896年寫了他的著作《仁學》，這本著作本人在《仁學界說》論及仁學思想背景：

凡為仁學者，於佛學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

---

<sup>52</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我寫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年2月1日出版，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

<sup>53</sup>〈李敖義賣珍藏 義助慰安婦〉，《華視新聞》（1997年08月31日）  
<https://news.cts.com.tw/cts/general/199708/199708310007619.html>。

<sup>54</sup> 崔慈悌：〈李敖過世 蔡英文：代表一個時代的消逝〉，《中國時報》（2018年03月18日）。

<sup>55</sup> 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論語》、《禮記》、《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sup>56</sup>

「仁學」也說明思想來自佛、儒、墨、道，而這些思想，同時也影響譚嗣同自己在戊戌政變的命運，

魏德東在〈論譚嗣同的成仁理念〉認為譚嗣同成仁的原因有四點：

第一從心理層面來講，梁啟超在《戊戌變法記·譚嗣同傳》稱，譚「幼喪母，為父妾所虐，備極孤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譚嗣同青少年時代的，因遭受父虐待而形成的輕生心理另外，因由親人死亡而體驗到生命無常感受，這兩件經歷直接影響，譚嗣同對於其死亡心理的形成。第二從層面哲學層面來講，譚嗣同在《仁學·自序》中說：「以吾之遭，置之婆娑世界中，猶海之一涓滴耳，其苦何可勝道。」。梁啟超在《仁學序》中為其發揮說：「今天世界乃至恆河沙數之星界，如此其廣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然則我之一身，何可私而有？何可愛而有？既無可愛，則毋寧捨其身以為眾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以上可看出譚嗣同以宏觀的宇宙對比自己的渺小，願跳出小我、獻身人類的世界觀，作為捨身成仁之動力，體現了時代精神。第三從層面宗教層面來講，譚嗣同相信佛教的因果報應、生命輪迴學之說，因而為惡來世伴隨地獄，揚善去惡、捨生取義來世善報道出了人生的真諦。第二從層面道德層面來講，光緒皇帝對有知遇之恩。當看到光緒「位幾不保，名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等救」的詔書時，譚捧詔慟苦。在這一思想基礎上，面對光緒生死不明的局面，譚嗣同生起「士為知己者死」的想法，未嘗不可理解。譚嗣同的死亡的最重要因素是捨生取義的君子人格，這也是其成仁理念的核心所在。<sup>57</sup>

張灝在《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譚嗣同的仁學〉<sup>58</sup>內容提及譚嗣同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張載的名言講出了自己的使命感，張灝的分析如下：

譚嗣同認為這種使命感就是儒家「仁」的精神體現。但是他的這個「仁」，顯然也揉合了墨子摩頂放踵的任俠精神，普救眾生的大乘菩薩精神，和基督教士冒險犯難的傳道精神。這份「仁」的精神，不但表現在譚嗣同的思想爽，而且也體現在他的生命裏，他的〔仁學〕是1896年寫的，根據現存的他的私人函件，我們可知從那時起，他就抱定了他所

<sup>56</sup>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仁學界說》，北京，中華書局，1981。

<sup>57</sup> 魏德東：〈論譚嗣同的成仁理念〉，《哲學與文化》，第303期，2017。

<sup>58</sup>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譚嗣同的仁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副「殺身滅族」的決心。1898年，譚嗣同死於戊戌政變。在死難前，他本有充分的時間逃亡，但是他拒絕逃亡，從容就義，這份烈士精神就植基於他的「仁」的精神。<sup>59</sup>

讓譚嗣同在戊戌政變中拒絕逃亡，從容就義，譚嗣同實踐了仁學中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使命感也為一生畫下句點。

## 二、歷史的北京法源寺

法源寺，又稱憫忠寺，目前位於中國北京市西城區菜市口附近教子胡同的南端，這座建築的歷史遠至唐太宗以詔令於幽州城內建寺，意在唐太宗悼念在東征高麗戰爭中陣亡的將士，西元696年萬歲通天元年佛寺建成後，當時的武則天依唐太宗原始建寺之意賜名為憫忠寺，「憫」為動詞指哀憐之意。之後至清朝雍正皇帝把它改名叫「法源寺」再至清乾隆皇帝時代大修法源寺後贈送了「法海真源」牌匾，近代民國時期法源寺曾是北京城停靈寺院之一，現開放民眾參拜外也是中國佛學院院址，研究者曾於2000年到北京參觀法源寺。

在1960年代李敖由法源寺的原名「憫忠」而產生靈感，創作了一部記述百日維新後譚嗣同就義過程的長篇小說以《北京法源寺》為書名，文本有三個結構圍繞著法源寺構成，第一是小說的空間結構以法源寺這個歷史空間在小說第一章〈憫忠寺〉以法源寺為小說之場景為開始，小說最後第十五章〈古剎重逢〉亦以法源寺場景為結束，第二是小說人物結構始於康有為初訪法源寺，而終於康有為的重訪與告別法源寺，中間有梁啟超與譚嗣同的相知相遇，袁世凱與譚嗣同密談變法都於法源寺，第三小說人物情節中以歷史上明代袁崇煥與北宋謝得坊和文本譚嗣同及王五的死亡歸宿均在法源寺，因此作者將北京法源寺的歷史空間書寫成為歷史小說。

《北京法源寺》是李敖第一次以政治犯在獄中所決定的書名，由於法源寺是從憫忠寺改名，文本中的第二章〈寂寞餘花〉文本設計了一段寺的取名是法源寺好還是憫忠寺的對話，文本的角色之一康有為在法源寺對主持余法師對話如下：

「法師認為，是法源寺的名字好呢，還是憫忠寺好？」

和尚對突如其來的問話，沒有任何驚異。順口就答了：「從對人的意義

---

<sup>59</sup>引自：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108頁。

說，是法源寺好；從對鬼的意義說，是憫忠寺好；從對出家人的意義說，兩個都好。」青年人會心地一笑，法師也笑著。<sup>60</sup>

接著文本安排主持余法師接著講「因為寺廟的用意並不完全為了超度死者，也是為了覺悟生者。」，如何覺悟生者？覺悟了什麼？在第二章〈寂寞餘花〉對這兩個議題做了對話式書寫，也意涵著以譚嗣同停靈之地的法源寺，在譚嗣同歷經戊戌政變中拒絕逃亡，從容就義，他的生與死，對讀者可以有什麼覺悟？研究者認為這也是李敖寫作動機之一。

### 三、戊戌變法與譚嗣同

戊戌變法的起因來自清朝與日本甲午戰爭失敗後，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賠償白銀，臺灣、澎湖列島遭割讓，清朝統治者自覺得如果再不變法，可能面臨亡國的危險，因此變法之聲四起，全面向西方學習變法維新的要求開始於 1895 年於北京發生公車孝廉連署上書（公車上書）。當時民間人士倡議在政治方面解除報禁，在經濟方面，鼓勵民間創辦企業，在教育方面，舉辦京師大學堂，廢八股文，在軍事方面，改用西洋軍事訓練，允許私人開設軍事工廠，製造軍火。康有為和梁啟超當時作出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sup>61</sup>，依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記載「強學會開創時，公未參加」<sup>62</sup>可見當時譚嗣同並未參加強學會，但有以變法之意。

1896 年譚嗣同先認識梁啟超之後在上海也認識了康有為，依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記載如下：

先公識康梁二氏之後，思想從此日趨變化，康氏為學之主旨，主公羊三世之說，禮運大同篇之經論，演成之進化史觀，公是時篤好西學，故梁

<sup>60</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二章〈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19 頁。

<sup>61</sup> 引自網路維基百科：戊戌變法<公車上書>，<https://zh.wikipedia.org/wiki/戊戌變法#公車上書>，瀏覽日期：2022 年 6 月 6 日。

變法維新的要求開始於 1895 年於北京發生公車孝廉連署上書（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各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並且向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 月，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得到多人連署。5 月 2 日，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薦派，依照漢代孝廉乘公家馬車赴京師接受考核之慣例，對「舉人進京參加會試」又俗稱為「公車」，故此稱為「公車孝廉連署上書」，簡稱「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效果，但是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sup>62</sup> 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 17。

氏有信致其師云：譚復生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此，惜傳西學過甚，伯里璽天德之選也。<sup>63</sup>

譚嗣同認同康有為和梁啟超之思想後，展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決定，就是參與戊戌政變也改變了一生，文本故事之時代背景為戊戌變法，時間在於清光緒二十四年間（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戊戌年）光緒皇帝為改革君主立憲所做的經濟、軍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全面性的改革，最初由慈禧太后默許光緒帝主導，然而後期改革過於激烈，讓保守派的反對力量變大，加上光緒帝有意通過維新派奪回權力，且有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建議將慈禧太后囚禁、暗殺等傳聞，從而惹怒慈禧太后，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與直隸總督榮祿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帝，同時逮捕了譚嗣同六人等並將發動戊戌政變時所逮捕的六名變法派人士斬首史稱六君子，分別為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與康廣仁等六位，當時在未經刑部審訊的情況下，被慈禧太后下令押到北京菜市口法場問斬，回顧戊戌變法僅經歷了103日就告終是敗，維新派首領康有為逃往天津，梁啟超逃入日本駐北京大使館，光緒帝則被軟禁於中南海瀛臺，慈禧重新當政，作者李敖用《北京法源寺》以北京城的法源寺為故事開始為場景，情節描述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六君子中譚嗣同為以身殉道，喚起人民推翻西太后政權，擁護變法的故事。

文本之情節以譚嗣同被捕時在獄中候刑時，據流傳曾題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sup>64</sup>之後譚嗣同被移至北京菜市口法場問斬，這段譚嗣同為變法失敗到斬首可歌可泣的事件，讓文本作者以此時空背景做為故事的素材，用小說方式發揮想像力並以文補史之創作，同時也符合新歷史主義之論點。

#### 第四節 本章小結

回顧李敖先生的一生，雖然出生在北京，但人生中幾乎都是在台灣度過，最後也在台灣逝世，在一生的歷練當中無論是求學、愛情、工作、及坐牢之過程，都在他的回憶錄當中詳述，他具有歷史的背景，在求學的過程當中他還是選擇了台大歷史系，在文史的工作中他有多部歷史人物評傳及歷史思想與評論有關的著作，無論現代史與當代史他都有自己的跟歷史見解，一生中他也有一段在東吳大學教歷史經歷。同時他具有文學的背景，寫過愛情小說及著名的傳唱〈不看你的眼〉的歌詞，在政治方面當選過立法委員也競選過總統，也曾做過政治犯，在坐牢的過程當中她也在思索著如何寫一本跟歷史有關的小說，他

<sup>63</sup>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25。

<sup>64</sup>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44頁。



發現了譚嗣同跟他的遭遇非常的像，在戊戌政變中他認為譚嗣同具有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胸懷，也是一位具文學造詣的文人，譚嗣同具有毫不畏懼死亡從容就義的人格特質，因此他開始思索想寫一部譚嗣同的小說，以及是一部與眾不同的歷史小說，之後以《北京法源寺》作為這本小說的名稱，內容以譚嗣同在獄中題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為核心素材，書寫譚嗣同參與戊戌政變從容就義的故事。

小說取名為北京法源寺，來自於法源寺原本是唐太宗為犧牲的軍人所建造的寺廟，是紀念為國捐軀的軍人們，李敖先生從批判的角度來看譚嗣同參與的政治，最後卻因政治而犧牲的生命為國捐軀，卻進不了法源寺的角度，來書寫這一部歷史小說，何鵬飛在《李敖回憶錄》序言談到不論是新的李敖或傳統的李敖，不變的是與他參與了整個臺灣蔣氏父子與李登輝時代社會與政治，卻憑他一己之力，與政權對抗、與歷史互動，攪動社會，參與改變！<sup>65</sup> 這段話也顯示了李敖先生他不會因強權而依附強權，寫出協助依附強權的歷史，李敖先生在寫小說的方面雖曾寫過愛情小說但卻沒有寫過歷史小說，李敖先生在歷史見解方面只有他專業獨到的一面，據李敖先生說獲得諾貝爾獎的提名，具有歷史專業及文學背景加上不懼政治強權的李敖先生，這部《北京法源寺》歷史小說，我將從主角譚嗣同的書寫中，分析李敖先生對歷史人物譚嗣同的敘述以及小說敘事來研究，也分析李敖先生眼中譚嗣同的意識與世界觀。

---

<sup>65</sup> 李敖：《李敖回憶錄》，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7年9月15日出版。

### 第三章 《北京法源寺》歷史敘事的真實與虛構

歷史小說中將歷史性和非歷史性，所涉及到的區分應該是真實與想像的區分，這部分就牽涉到想像的問題，用想像以呈現真實，想像的作用是什麼？它是不是只有消極的、負面的意義？還是想像活動是它的積極性？歷史想像其實是一種能力，這個能力事實上有它的積極效應，歷史小說可以說是這積極面的展示。

論及歷史上戊戌政變的結果論來看，政變的時間僅短短百日，造成主要人物光緒皇帝被囚於瀛台，倡議變法之首康有為逃至日本，梁啟超也赴日避難，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與康廣仁等六位變法大臣遭斬首，從消極的角度來看政變未達目的，因此歷史的定位是一次失敗的政變。

作者在我寫《北京法源寺》論及文本是有意對小說的破格，描寫如下：

《北京法源寺》在小說理論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視過去的小說理論，也不重視現代的，因為它根本就不要成為“清宮秘史”式的無聊小說、也不願成為新潮派的技巧小說，所以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該趕快“過橋”的，也就不多費筆墨；該大力發揮的，也不避蕭伯納（G. B. Shaw）劇本《一人演說》之讖。<sup>66</sup>

這個破格主要不想《北京法源寺》成為清宮秘史式的無聊小說，也就是指用傳統敘述方式講歷史未記載或民間傳聞的故事，也不願意書寫說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歷史故事，最後作者不逃避個人的寫作風格。

從積極的角度《北京法源寺》既是一部歷史小說，作者又說要破格小說的寫法，文本應有作者對歷史想像的一面，文本在主角譚嗣同的視角下，這一百多天的歷史事件文本作者是如何敘說戊戌政變歷史，其敘事模式是如何的展開，文本作者在創作的想像面所產生積極效果是本章研究的重點。

歷史事件是材料，本章將從文本研究作者如何將戊戌政變真實事件，安排在小說中，文本中那些歷史敘事是接近事件與時間的真實，其次研究文本中那些歷史敘事作者是用虛構與想像，創造小說情節來重新鋪成新歷史，最後研究作者欲填補歷史的空白的歷史敘事其意義的解析，因此本研究以戊戌政變歷史敘事中的真實歷史事件與想像開始。

<sup>66</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結尾：我寫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363。

## 第一節《北京法源寺》歷史敘事的真實

海登·懷特〈當代歷史理論中的敘事問題〉<sup>67</sup>論及歷史是關於過去真實發生的事件，所謂的真實事件它是發生過所以只是「在」，它不會「說」（real events should not speak, should not tell themselves, real events should simply be），因它不會「說」指的是真實事件它不會說自己是怎麼怎麼發生的，因此當我們瞭解發生了什麼樣的歷史事件要把它以「說」的方式來呈現的時候，就會牽涉到敘事的問題，說歷史的時候，進入語言世界那就會牽涉到敘事的問題，因此歷史和敘事之間，產生必然的關連性。

歷史是關於過去真實發生的事件，我們對歷史小說的看法，會牽涉到所謂的真實事件來對應歷史，回顧到清朝光緒年間(1898年)的一項改革運動，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譚嗣同等發動政變失敗，光緒皇帝被囚，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害，這次變法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終於失敗，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這個戊戌變法無疑的是一個歷史事件，文本將這段歷史以譚嗣同為主角康有為、梁啟超為輔，利用角色對話及場景描述的敘事結構重現歷史。

在歷史裡脫離不了人物與事件的本質，本節將戊戌政變以譚嗣同為主的相關人物與事件來分析文本中歷史的真實部分，為接近譚嗣同在戊戌政變中的真實事件，本節參閱戊戌政變當事人之一且為譚嗣同好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中《譚嗣同傳》，探究文本之相關歷史事件，及歷史人物以證其文本是由真實歷史事件及歷史人物所改寫，本節研究以此為本對照與文本主角譚嗣同有關與事實的相關性。

### 一、戊戌政變有關事件

敘事就是它同時是一種話語，就是它說的內容，同時是形式也是內容，真實的事件會被敘述出來，不僅因為它曾經存在過、發生過，而且它還被記得過，所以它可以以一種「時間序列」的方式呈現出來，有這些因素，它最後才會呈現為「敘事」讓讀者所閱讀時發生一種歷史敘事。

戊戌政變前後大約百日依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這百日中譚嗣同經歷所發生的真實事件依時序有六件重要的事件：

1. 光緒帝命康有為及四卿（包括譚嗣同）設法籌救之詔。

---

<sup>67</sup>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當代歷史理論中的敘事問題〉，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 譚嗣同與袁世凱會面。
3. 譚嗣同進入日本使館。
4. 譚嗣同與俠士商討謀救皇。
5. 譚嗣同被捕。
6. 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害。

戊戌政變之時間及事件依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第四篇政變正記之譚嗣同傳，做為比較之標準，其用意在梁啟超亦為戊戌政變事件中之當事人也是譚嗣同友人，同時亦為當代文人，他能帶著記憶記載當時發生的事情是接近歷史事實，經對比歸納發現上述六大事件與均出現於文本中，研究者將歷史事件與文本對比歸納如下：

表格 1：文本戊戌政變六件重要事件

事件編號	時間： 依陰曆	歷史事件	文本出現之章節	備註
1	戊戌 7 月 29 日	光緒帝命康及四卿設法籌救之詔	第九章：光緒帝九月十四日候的第 9 天及第 3 天遞出密詔	
2	戊戌 8 月 3 日	譚嗣同與袁世凱會面	第九章：九月十八日譚嗣同與袁世凱會面於法源寺	袁世凱聽到譚嗣同要求他二件事，誅榮祿和圍頤和園，另外已雇好漢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無須袁世凱出兵。
3	戊戌 8 月 6 日	譚嗣同入日本使館	第九章：九月二十日譚嗣同見梁啟超	文本描素「儘管外面風聲鶴唳，譚嗣同卻沒有逃走。但是，瀏陽會館找不到他，他帶了一個市包，去了日本公使館」

4	戊戌8月 7、8、9日	譚嗣同與俠士 商討謀救皇上	第十一章：譚嗣 同見王五商討謀 救皇上	文本未有日期
5	戊戌8月 10日	譚嗣同被補	第十二章：九月 二十五日譚嗣同 被補	文本依是陽曆 1898年9月25日 文本特別註8月 十日
6	戊戌8月 13日	譚嗣同被斬	第十二章：譚嗣 同四天前被補，	因此為8月十三 日被斬

在研究者歸納表一過程中，有兩個發現，其一是在上述之事件二，劉鳳翰在《袁世凱與戊戌政變》內寫及袁世凱日記第三段談譚嗣同會談內容：

因出一草稿，如奏片式，內開：榮某謀廢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佈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予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譚云：『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予謂：『皇太后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為訓戒，如今以作亂，必不可行。』譚云：『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祿，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請旨辦理。』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准也。』譚云：我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硃諭一道面交公。<sup>68</sup>

此內容論及袁世凱聽到譚嗣同要求他二件事，其一誅榮祿；其二圍頤和園，並提及另外已僱有好漢數十人，以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無須袁世凱出兵。

在文本中描述譚嗣同親赴法源寺訪袁世凱，談話內容要求袁世凱同意他殺掉榮祿並包圍頤和園，也無須袁世凱派兵，文本描寫如下：

<sup>68</sup>引自 劉鳳翰：《記袁世凱與戊戌政變》，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159。

在臥室裡，譚嗣同出示光緒皇帝的密詔，以取信於袁世凱，並告訴他，救皇上、救中國，在此一舉，譚嗣同並表示，根本的關鍵在西太后，只有清除了西太后，才能解決問題，如今要袁世凱配合的是：一、殺掉榮祿；二、包圍頤和園，至於進頤和園對付西太后，無須袁世凱派兵，譚嗣同在北京可掌握好漢幾十人，並可從湖南招集好將多人，足可解決園內的一切。<sup>69</sup>

綜上依袁世凱日記寫譚嗣同會談之情況，描述譚嗣同首先說事屬機密，要求在臥室與袁世凱單獨談話，袁世凱照辦了，此段與文本論及會談內容為大致相同，袁世凱也是戊戌政變的關鍵人物<sup>70</sup>，用他的日記對照文本，由此可證事件二在文本的書寫是接近真實的書寫。

第二個發現是在表一歸納比對後，發現這一百天的歷史事件，文本作者從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以小說的型式，敘說歷史事件的確都有提及真實的歷史事件，其文本中的事件結果也如歷史事件一樣，可見作者並無意改變歷史事件，只是書寫的方式不同。

## 二、事件人物

文本中有的小說人物角色，是否根據事實來描寫也是本節研究的重點，事件來自人物創造事件，在戊戌政變這個歷史事件中有那些真實人物，這些人物在小說中是不是與歷史相符也是本節探討之目的。文本作者在〈我寫法源寺〉明白的提及書中史事都盡量與歷史符合包括人物，內容如下：

大體說來，書中史事都盡量與歷史符合，歷史以外，當然有大量本著歷史背景而出來的小說情節，但小說情節也時時與史事掛鉤，其精確度，別有奇趣清朝史學家說"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中有調劑而人不知"，大率類此。

<sup>69</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九章〈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190。

<sup>70</sup> 劉鳳翰：《記袁世凱與戊戌政變》，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自序提及：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是這本書的重心，因為袁世凱與戊戌政變的直接關係，都記到他這篇「戊戌日記」裡，可是袁世凱與他的代筆者，為了洗刷告密罪狀，並且準備向歷史詭辯，把真假史實，揉合在一起，編織成一篇似真又假的故事。我的工作先從「外部考訂」開始，將這篇「日記」的「版本」、「作者」，都作了一個詳盡而又合理的解釋。至於「內部考訂」我對袁世凱所記的每一件事，都作了細心的分析，而且所得的結論，我相信非常接近史實。

小說中的人物也是能確有此人、真有其事的符合歷史人物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樣。能確有此人、真有其事的，無不求其符合。<sup>71</sup>

文本中有七位重要的人物分別為光緒帝、西太后、康有為、梁啟超、袁世凱、譚嗣同、大刀王五，前面五位都是歷史名人，惟大刀王五未入歷史，但作者在文本中對此人特別描寫，歷史人物各有各的命運，戊戌政變發生後這些參與者各有各的結局，文本中的人物那些是真實，本研究以比照這些人物在歷史事件中所發生行為來認定文本是否偏離事實：

表格 2：文本戊戌政變重要人物

編號	文本角色與歷史人物	人物參與事件之最後結果	文本及描述	文本角色與歷史人物對比
1	光緒帝	光緒帝被囚及瀛臺	第 13 章 一九〇八年，光緒皇帝在位第三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五日（舊歷十月二十二日），七十三歲的西太后終於死去但在他死前一天，三十八歲的光緒皇帝卻神秘的先死了，是毒殺？是巧合？只有埋在豪華墳墓的西太后自己知道。	符合 有心救國的傀儡皇帝，變法的主要支援者，變法失敗後被囚禁，後病死。
2	西太后	垂簾聽政	清朝末期的實際統治者，頑固，有心計卻沒有大局意識的婦人。把持朝政，荒淫無度，貪圖享受使中國經濟軍事實力急轉直下。	符合

<sup>7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我寫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 364。

3	袁世凱	袁世凱出賣 譚嗣同	袁世凱當了總統	符合
4	康有為	赴日	第 14 章 他住在日本，五十多歲的年紀，卻已投閒置散。他的心情是蒼茫的。他四十歲以前，守舊者說他維新；他五十多歲以後，維新者又說他守舊。並且這種說法，早就開始了。他五十多歲時發生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為出局之時。	符合 戊戌變法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本文中康有為是清末做為改良派的先鋒，同時又是民國革命派中的落伍者。
5	梁啟超	赴日	變法失敗後到日本。後參與辛亥革命，反對帝制。 梁啟超赴日	符合
6	譚嗣同	譚嗣同被斬	第 12 章 舊歷八月十三日就下了這樣的第三道命令：  「諭軍機大臣等：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	符合 譚嗣同被斬



			壓。」	
7	王五	王五救帝計畫失敗	第 19 章 據事後法源寺附近的人透露，那個黑衣大漢，聽說不是別人，就是大刀王五，但義和團為什麼追殺他，真相仍不明。 「普淨走後，余法師自己也行蹤神秘起來了，聽說他參加了援救光緒皇帝的行動，這一行動，是譚嗣同死前囑托大刀王五代為執行的。由於清廷政府保護的嚴密，行動失敗了。」	符合 譚嗣同的臨終請求營救光緒帝而被義和團殺死在法源寺。

在梁啓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中論及譚嗣同與江湖俠士談如何救光緒帝但並未指名是大刀王五，在《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sup>72</sup>中論及江湖俠士就是王正誼俗稱大刀王五，可見此人亦是真實人物並參與了戊戌政變。

趙稀方在〈當代文學中的歷史敘述〉<sup>73</sup>一文，提到新歷史主義「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告訴我們，根本不存在所謂歷史的「本質」，只存在對於歷史的敘述，任何歷史家和作家都是從一定的觀念出發敘述歷史的，文本作者在文本中所描寫戊戌政變的歷史事件，作者選擇了用小說的脈絡書寫，讓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出現在文本中，並且讓各角色之命運與歷史相同，這些角色是小說中的核心人物，尤其是文本中的譚嗣同及譚嗣同之死，對情節的發展相對是重要而且有必要的，此正說明了文本內的小說人物是根據事實來描寫的，因此文本是以戊戌政變中的真實歷史事件開始做歷史敘事，綜上本節發現可證

<sup>72</sup>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 42。

<sup>73</sup>趙稀方：〈當代文學中的歷史敘述〉，中國福建，東南學術，2003 第 10 期。

其文本作者站在歷史事件的已知的角度上用情節拓展文本視野，文本作者顯然是以第三人稱全視角來書寫這部歷史小說。

## 第二節《北京法源寺》歷史敘事的虛構與想像

歷史小說因為涉及的是人類過去的敘事，在本質上過去是無法再重新被感知的，因為它已經過去了，不存在於現在的時空中，因此歷史小說作者藉由想像及虛構來表述，彼得·蓋伊·劉森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sup>74</sup>論及小說是虛構的故事，小說具有相當的長度，小說中的人物和事蹟所描述的人生，是以某種複雜程度的情節建構而成的，因此歷史小說是一種創作過程。

文本作者在〈我寫法源寺〉提到「歷史小說，自然發生"寫實的真"和"藝術的真"的問題」<sup>75</sup>兩種真的表達如何都能做到，是作者在歷史小說創作特別考慮的，無論如何文本已是小說，在小說理論虛構就是想像也是建構，本節將以文本之事件虛構部分分析如下：

### 一、地點的虛構：

作者在〈我寫北京法源寺〉論及譚嗣同在法源寺會面袁世凱是虛構的，描寫如下：

在文本中譚嗣同會面袁世凱這一段就是虛構依，我寫北京法源寺談到甚至還有將錯就錯之處，在小說中，我另做處理），甚至還有將錯就錯之處（例如譚嗣同孫子譚訓聰寫《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中說“親赴法源寺訪袁”，但照袁世凱《戊戌日記》，他住的是法華寺。但我為了強調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譜將錯就錯處理）。<sup>76</sup>

研究者翻閱譚訓聰在《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sup>77</sup>中的確提到譚嗣同「親赴法源寺訪袁」，同時我也翻閱王樾在《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sup>78</sup>，提到「八月初三夜譚嗣同到法華寺去拜訪袁世凱」。但研究者發現最直接的史料是劉鳳翰

<sup>74</sup>彼得·蓋伊·劉森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 SavageReprisals：BleakHouse，MadameBovary， Buddenbrooks. 》，臺灣，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sup>75</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我寫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 365。

<sup>76</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我寫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 364。

<sup>77</sup>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 44。

<sup>78</sup>王樾：《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臺灣，臺灣學生書局，1990，頁 42。

《袁世凱與戊戌政變》袁世凱的日記中提及在北京租寓法華寺<sup>79</sup>，因此文本第九章〈戊戌政變〉提到當天晚上，譚嗣同聯絡上袁世凱，約好晚上十點，到法源寺去拜訪袁世凱，文本中描述譚嗣同親赴法源寺訪袁如下：

袁世凱那時事忙，沒住在自己的海澱別墅，就便住在法源寺裡，他為什麼住法源寺，沒人知道，也許在學恭親王吧？<sup>80</sup>

的確如李敖所說在文本中譚嗣同會面袁世凱這一段就是虛構，這是第一個事件地點的虛構，虛構之目的在讓小說情節上能與文本書名為法源寺有關連。

## 二、譚嗣同法源寺見梁啟超的虛構及想像

文本第七章〈回向〉內容為譚嗣同與梁啟超的見面的情境，他們會面的地點是在法源寺，這個見面地點在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提及：

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為非常人矣。<sup>81</sup>

由上述得之譚嗣同與梁啟超的見面並未記載是發生在法源寺，另外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sup>82</sup>，也是提及在京見面並未提及法源寺見面，因此見面地點是虛構，這是第二個事件地點的虛構，虛構之目的與第一個虛構之目的相同，主要還是在讓小說情節上能與文本書名為法源寺空間有關連。

最後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同時記載談話內容為強國並未論及佛學，然而文本卻以小說敘事方式寫出談話內容從佛學的討論，引出成仁之仁學思想，這純粹是作者的想像，虛構之目的，主要在表達譚嗣同的佛學思想。

## 三、譚嗣同入日本使館的虛構及想像

文本第九章〈戊戌政變〉其中一段譚嗣同入日本大使館見梁啟超如下：

<sup>79</sup>劉鳳翰：《袁世凱與戊戌政變》，臺灣，傳記文學，1979。

<sup>80</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九章〈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188。

<sup>81</sup>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香港，友方出版社，1958，頁202。

<sup>82</sup>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17。

日本人也不落英國人之後，在公使館裡，他們首先收容了梁啟超。這天正是九月二十一日，西太后正式「臨朝訓政」了，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維新，從今天起宣告結束。兩天以後，消息傳來，光緒皇帝已失掉自由，被西太后關在皇宮的湖心小島瀛台裡。儘管外面風聲鶴唳，譚嗣同卻沒有逃走。但是，瀏陽會館找不到他，他帶了一個市包，去了日本公使館。<sup>83</sup>

依狹間直樹(はざまなおき)〈梁啟超對“國家”認知的心路歷程〉<sup>84</sup>有梁啟超曾到訪日本駐華公使館做以下的描述：

1898年9月21日政變當天，梁啟超曾到訪日本駐華公使館，但祇是與林權助(1860-1939)代理公使見了一面便回去了。晚上，林權助與當時身在公使館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商量之後定下方針，於次日把梁啟超當作亡命者藏匿起來。日方認為，北京未必安全，遂於24日將其轉移到日本駐天津領事館；26日，又將其轉移到停泊在天津港的日本軍艦“大島號”上。這樣一來，梁啟超便完全處於日本政府的保護/管理之下了。<sup>85</sup>

當時梁啟超的確是躲在日本大使館，而依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提及譚嗣同「勸東遊」<sup>86</sup>，譚嗣同也進入日本大使館見梁啟超，見面的主要內容在勸梁逃避日本，營救康有為，這段歷史在《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裡提到了譚嗣同與梁啟超的談話內容如下：

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

<sup>83</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九章〈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190頁。

<sup>84</sup>狹間直樹(はざまなおき)，1961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1966年在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取得滿期後退學，1977年擔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授，1985年擔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2001年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京都大學名譽教授，京都產業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兼任孫中山紀念會副理事長；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代表性日文著作有《中國社會主義の黎明》、《梁啟超——東アジア文明史の轉換》，合著有《中國文明選 15 革命論集》、《データでみる中國近代史》、《世界の歴史 27 自立へ向かうアジア》，合作翻譯的中文著作有《中國近代史(1840-1924)》(胡繩)、《周恩來傳》(金沖及主編，全三卷)、《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全五卷)。

<sup>85</sup>狹間直樹(はざまなおき)：《南国学术》，澳門，澳門大學編輯出版，2016，第 20163 期，頁 430-442。

<sup>86</sup>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香港，友方出版社，1958，頁 206。

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携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sup>87</sup>

上述內容中譚嗣同對梁啟超的談話有四個重點：勸梁啟超赴日、將書托負、請梁設法救康、自己選擇成仁。因此作者在已知的角度，然後運用了想像力寫出了譚嗣同與梁啟超的談話讓當時的情境重現，因為作者在文本中都沒有更改四個重點，至於作者是如何書寫這四個重點？文本中如何讓譚嗣同與梁啟超的談話的歷史情境重現？研究者以「敘事視角」（Point of View）指作家講故事的方法以及角度，並通過此種方式和角度向讀者描寫人物、敘述故事、編織背景等等。

西方現代小說的敘事視角，大致可分為第三人稱全知觀點、第三人稱有限全知觀點、第三人稱主角觀點、第一人稱自知觀點、第一人稱旁知觀點、客觀觀點、混合式觀點等七種。在實際運用上小說家為避免敘述進程單調或刻板，許多敘事作品都不是運用一種敘事觀點類型<sup>88</sup>，作者也是運用多種敘事視角完成以便製造更豐富的說故事效果，文本內將其上述勸梁啟超赴日、將書托負、請梁設法救康、自己選擇成仁四個對話重點轉化為成以人稱書寫小說情境，以下歸納如下：

（一） 文本第九章〈戊戌政變〉內容有論及勸梁啟超赴日，文本內容梁啟超與譚嗣同對話如下：

可是，復生！梁啟超急著抓緊譚嗣同的肩膀，你怎麼可以留下來？留下來是無謂的犧牲、是死路一條！

我當然知道。譚嗣同堅定他說，並且我非常贊成你走。這是一種分工合作，目標雖然一個，但每個同志站的位且，卻不可能全一樣。有在前面衝鋒的、有在後面補給的、有出錢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適合甲的未必適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兩人做。我覺得今天的情形適合我留下，也必須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國去，回頭來為我們的事業東山再起。<sup>89</sup>

<sup>87</sup>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香港，友方出版社，1958，頁206。

<sup>88</sup>張瀛太：〈從敘事視角之運用看朱西甯小說的寫作技巧〉，臺灣，《人文社會學報》第5期，2009，頁229-249。

<sup>89</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九章〈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193。

以上對話可看出的文本作者以第三人稱主角觀點的視角書寫梁啟超與譚嗣同的對話。

(二) 文本第九章〈戊戌政變〉內容有論及譚嗣同將書托負梁啟超，文本內容梁啟超與譚嗣同對話如下：

我今天帶來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學》的稿子，對我們所爭執的問題，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給你處理吧。總之，我決心出來證明一些信念。而這些信念，對我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範的。這部《仁學》，卓如兄你是看過的。有些章節，我們還討論過的。「是啊！」梁啟超說，「這部書最精采的部分是反對愚忠、反對糊里糊塗為皇帝而死。我還記得很清楚。譚嗣同把布包交給梁啟超。「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關心的不是留名，而是留什麼樣的名。我希望你帶走這些稿本，連同我已經發表的，將來一塊兒代我整理、代我印出來，同時用你一支健筆，代我宣傳我這一點苦心焦思以後生命的成績，也算不虛此生。」<sup>90</sup>

以上對話也可看出的文本作者以第三人稱主角觀點的視角書寫梁啟超與譚嗣同的對話。

(三) 文本第九章〈戊戌政變〉內容有論及譚嗣同請梁啟超營救康有為，文本內容梁啟超與譚嗣同對話如下：

如果你對改良的路這樣悲觀，你希望我的，是走哪條路？「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路，但我知道康先生的路，他的路好像定了型，如果皇上死了，康先生可能轉成革命；但如果皇上活著，康先生在外面，他絕不會丟掉皇上，他一定還是君王立憲，走改良的路。以你跟康先生的關係，我真不知道以後的演變。我說過，卓如兄，你有大慧根，能夠瞭解我，也能夠瞭解我不能瞭解的，也瞭解康先生，也瞭解並且不斷瞭解中國的前途、中國的路，你好自為之吧，你一定會有最正確的選擇、不斷的選擇。人的痛苦是只能同敵人作戰，不能同朋友作戰；或只能同朋友作戰，不能同自己作戰。你可能是一個例外，只有性格上大智大勇又光霽月的人，才能自己同自己作戰，以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作戰……噢，時候也到了，卓如兄，一切保重了。譚嗣同站起來。」<sup>91</sup>

<sup>90</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九章〈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194。

<sup>9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九章〈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207。

以上對話同樣也可看出的文本作者以第三人稱主角觀點的視角書寫梁啟超與譚嗣同的對話。

(四) 文本第九章〈戊戌政變〉內容有論及譚嗣同自己選擇成仁，文本內容梁啟超與譚嗣同對話如下：

譚嗣同笑了，他拍拍梁啟超的肩膀，站起來。通過公使館的方窗戶，向遠望著。就是什麼都不能說，才能加強血薦的效果。他側過頭來，望著梁啟超，梁啟超抬頭看他。

譚嗣同笑著，「卓如啊，你一個勁兒的想說動我出走，事事都朝出走有好處解釋，甚至要死也該在海外死，你可太愛朋友了。你明明知道要血薦就是要借這口老太婆的刀才妙！這也叫借刀殺人吧？怎麼可以自殺？老太婆殺了我，才證明給天下這個政府無道，大家該革命；若如你所說，不給老太婆殺而去自殺，不但給這個老太婆脫了罪，自己消滅了他們的眼中釘，並且自殺又變成了種種離奇解釋。比如說，人家就會說自殺是因為改良失敗而厭世，或是什麼別的，總之，那個時候，整個的效果完全不對了。所以，要血薦，就在這兒血濺，就要血濺菜市口。在這兒，才有最好死的地方，才有最佳死的方式。」<sup>92</sup>

以上對話同樣也可看出的文本作者以第三人稱主角觀點的視角書寫梁啟超與譚嗣同的對話。

由上述的歸納作者大量使用第三人稱主角觀點的視角書寫對話，其目的之一是為讓故事與讀者跟著角色談話內容一起發生譚嗣同勸梁啟超赴日、將書托負、請梁設法救康、自己選擇成仁事件發生共感，創造主角的性格感並拉近讀者與敘事者間的距離，但這種方式也會因作者的意識而有所限制因此第三人稱主角觀點敘事者不一定會忠實呈現角色的體驗，可以說文本作者的想像是創作在運用第三人稱主角觀點敘事視角完成，這種虛構目的在製造更豐富的說故事效果，這種運用第三人稱主角觀點敘事也是文本作者在這本歷史小說中大量運用的書寫方式，其目的之二是為讓〈戊戌政變〉的內容著重在譚嗣同身上，讓譚嗣同勸梁啟超赴日、將書托負、請梁設法救康、自己選擇成仁四件事由譚嗣同自己說出自己的想法，這當然是虛構及想像但也是作者要從小說表達譚嗣同思想的必要手段。

---

<sup>92</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九章〈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206。

第二個虛構發現是在《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提及當時確有日本志士對譚嗣同苦勸去日本，譚嗣同拒絕不聽外並說明各國變法未有不流血，描寫如下：

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sup>93</sup>

以上並沒有提及日本志士是誰及對譚嗣同談話的地點及談話詳細的內容。

文本第十章〈搶救〉以小說敘事內容提及平山周回大使館見日大使林權與梁啟超說明譚嗣同為仁人君子值得一救，因此讓梁啟超寫了一封信交給平山周去勸譚嗣同可以赴日本避難，但譚嗣同還是拒絕了，文本如此描述：

「告訴梁先生，月照與西鄉兩位，我和他各自做法一人。順便想想你們日本的維新志士吧，維新的第一功臣，是西鄉嗎？是木戶嗎？是大久保嗎？是伊藤嗎？是大隈嗎？是井上嗎？是後藤嗎？是板垣嗎？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陰。吉田松陰一輩子沒有一件成功的大業可言，他要逃到國外，失敗了；要糾合志士幫助皇帝，失敗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惡勢力前來，失敗了。最後以三十歲年紀，橫屍法場。但是，吉田死後，全日本受了感召，風起雲湧，最後達成維新的果實，這證明了吉田雖死猶生、雖失敗猶成功，他以敗為成。我就用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做臨別紀念吧！」四個日本人走出瀏陽會館的時候，大家啣咕起來。<sup>94</sup>

上述發現梁啟超沒有提及日本志士是誰？以及對譚嗣同談話的地點及談話詳細的內容，在文本第十章〈搶救〉出現了地點是在瀏陽會館，有日本志士平山周而且是四個日本人，談話有了詳細的內容，可以推論作者是用第三人稱全知的視角加上此段運用以第一人稱虛構了平山周見譚嗣同的情境，內容並對當時與梁啟超告別「月照西鄉」做了補白，談話內容主要是想像與虛構出譚嗣同告訴日本人武士道與中國俠士不同的思想並讓日本人佩服中國的民族情懷，有關俠士的思想將於第六章討論。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如下：

第一：袁世凱與譚嗣同見面地點在法源寺的虛構其目的在與書名主題的連接，有其必要性，文本作者也承認自己的地點虛構。

<sup>93</sup>引自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香港，友方出版社，1958，頁207。

<sup>94</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十章〈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233。



第二：在真實的歷史事件下，事件的當事人對話除非有錄音否則是無法有展現真實內容，作者是運用以第三人稱的全知的視度，運用第三人稱主角觀點書寫譚嗣同在事件中與梁發生的對話內容，這也呼應了作者在我寫《北京法源寺》論及文本是有意對小說的一段要為文本“破格”「該大力發揮的，也不避蕭伯納（G.B.Shaw）劇本《一人演說》之讖。」<sup>95</sup>，作者隱藏利用在小說裡用第三人稱主角觀點的內容是非常具有主觀性，批判性的作品。

### 第三節《北京法源寺》填補歷史的空白的歷史敘事

盛寧的《新歷史主義》在傅柯項傳統歷史觀挑戰中論及，傅柯以結構主義及後結構主義的歷史觀，給新歷史主義四項具體的啟發：

第一、摒棄了傳統歷史眼光是「單聲道的」(monological)及單一的政治眼光傳統的看待歷史，將歷史看成是全民共有的簡單化傾向。

第二、強調了政治上的利害關係，新歷史主義批評的表述，便處處流露出傅柯所謂「權力」、「權威」等「力」(power)的影響因此文學作品，便都成了「角力場」(fields of force)，成了「表示不同意見和興趣的地方」，成了「正統勢力和顛覆勢力相撞的場合」，傅柯的研究就是要具體考察並把握這種「力」對於人文表述。

第三、傅柯不同凡響地指出關於歷史性的本源 (the origin of historicity)的看法，在現代思想觀念中，已不再是本源引出歷史性；而是反過來，是歷史性提出了需要一個源，而這一本源「既存在於歷史性的內部，它同時又置身於該歷史性之外」作為一門學科的「歷史」當然也不例外，與其說它是發生於某個本源的連貫故事，毋寧說它是一種或多種認識世界的方式。

第四、歷史不能脫離文本性，一切文本都不得不面對文學文本所揭示的不確定性的危機。<sup>96</sup>

綜述傅柯對新歷史主義的啟發觀念在上述有了所謂「填補歷史的空白」的概念，新歷史主義實際上是變換我們自身的認識歷史的角度和認識方式，用傅柯的慣用比喻，即所謂不斷更換「思考座標的格柵」(grids for thinking)也正是認

<sup>95</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我寫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364。

<sup>96</sup> 盛寧：《新歷史主義》，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95。

識將「歷史」與「文學」的等級關係顛倒過來歷史不能脫離文本性，也為新歷史主義批評開拓了文學的創作的空間。

新歷史主義以文補史大體說來使用歷史敘事讓小說家們會用自己的意識參與到歷史敘述，文本作者在〈我寫法源寺〉提到提及：

文本中史事都盡量與歷史符合，歷史以外，當然有大量本著歷史背景而出來的小說情節，但小說情節也時時與史事掛鉤，其精確度，別有奇趣清朝史學家說「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中有調劑而人不知」，大率類此。<sup>97</sup>

文本作者道出了創作過程中有「中有調劑而人不知」，所調劑的正是本節的研究之本節重點，文本作者書寫歷史小說要為歷史補白的兩個地方，第一是譚嗣同入獄後所寫書信的歷史補白，第二是「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兩崑崙所指為何？以上作者在小說中如何做歷史補白以下是我的研究：

#### 一、譚嗣同入獄後書寫的三張書信的補白

文本第十二章〈從監牢到法場〉其中一段譚嗣同入獄後寫了3封信，依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記載如下：

公在獄中凡四日，有獄中書三紙致其隨從僕人羅升胡理臣字條上無月日後面署主人譚復生字余私見認為第一紙通知他們，繫南所頭監……寄鄂書請郭之全老爺寄(河南人，與世凱有來往)，外面何消息可以告我，第二取應用物件紙後未署名，第三紙言：汝滿懷忠愛可嘉至小字一行五爺才可進來)速託其通容飯食等事湖北已由郭寄你們不必寄。<sup>98</sup>

經與文本比對研究者有了以下的發現：

(一) 當時譚嗣同的確寫了3封信，文本第十二章〈從監牢到法場〉其中一段譚嗣同入獄後寫了3封信數目與文本的無誤，文本描寫如下：

「譚大人嗎？獄卒輕聲他說，我是佩服你的人，昨天中午的牛肉和辣椒就是我的一點小意思。你家僕人有信帶來，還托我帶上一點日用品，等下我塞在門後。獄座說著，左右張望了一下，等天亮後，請大人借紙

<sup>97</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364。

<sup>98</sup>引自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43。

筆，說要寫信通知家中僕人送日用東西來。收到紙筆後，再加寫一兩封信，加寫的信，可說秘密的話，我明天早班來取，我會秘密替大人送去。」說完了。不等譚嗣同開口，轉身就走了。天亮後，譚嗣同照做了。他把第一封信公開交給獄方轉加寫的兩封，也寫得很含蓄，以防萬一。」<sup>99</sup>

依上述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所記載獄中三封信其實是不完整的，譚訓聰沒有說明三封信內容是什麼，依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記載這三封信分別第一信內容不完整僅記載為獄外有任何消息可以請告之，文本如下：

余私見認為第一紙通知他們，繫南所頭監……寄鄂書請郭之全老爺寄(河南人，與世凱有來往)，外面何消息可以告我。<sup>100</sup>

文本文本第十二章〈從監牢到法場〉將此書信依《譚嗣同遺墨》完整化，文本描寫如下：

速往源順鏢局王子斌五爺處，告知我在南所頭監，請其設法通融招扶。再前日九門提督取去我的書三本：一本名《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二本《名稱錄》，現送還會館否？即回我一信。我遭此難，速請郭之全老爺電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順便告我。主人譚復生字。<sup>101</sup>

第二封信在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無正式內容無屬名，僅附帶說明請僕人取衣物，記載如下「第二取應用物件紙後未署名」<sup>102</sup>。

第二封信在文本第十二章〈從監牢到法場〉將此書信依《譚嗣同遺墨》完整化，文本描寫如下：

北半截胡同瀏陽會館譚家人胡理臣羅升：逆來厚被窩一床、洗臉手中一條、換洗衣褲並襪子腳布一套、紫棉馬褂一件、棉套褲一雙、筆墨信紙並白紙等件、枕頭一個、呢大帽一頂、靴子一雙、扣帶一根，均同來人送來為要。又取銅臉盆一個、筷子一雙、飯碗一個。<sup>103</sup>

<sup>99</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 269。  
」」<sup>100</sup>引自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 43。

<sup>10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十二章〈從監獄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 269。

<sup>102</sup>引自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 43。

<sup>103</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十二章〈從監獄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 269。」

第三封信在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有不全之正式內容，談及王五可以進來見面無屬名，記載如下：

第三紙言：汝滿懷忠愛可嘉至小字一行五爺才可進來)速託其通容飯食等事湖北已由郭寄你們不必寄。<sup>104</sup>

第三封信在文本第十二章〈從監牢到法場〉將此書信依《譚嗣同遺墨》完整化，文本描寫如下：

速往源順鏢局王子斌五爺處，告知我在南所頭監，請其設法通融招扶。再前日九門提督取去我的書三本：一本名《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二本《名稱錄》，現送還會館否？即回我一信。我遭此難，速請郭之全老爺電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順便告我。主人譚復生字。<sup>105</sup>

以上經研究者發現在湖南省博物館藏紀錄<sup>106</sup>，在1957年2月湖南省博物館將譚嗣同的遺墨將其匯裝成冊頁裝訂成《譚嗣同遺墨》集，書中共收入將譚嗣同在獄中的遺札三通<sup>107</sup>，這三封遺墨其內容與文本相同，作者這麼做也就是讓讀者更近距離的貼近譚嗣同在獄中的真實與臨場感之外，更重要的是這個交代也補了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對譚嗣同在獄中的遺札記載不完整之補遺，也讓後面研究譚嗣同在獄中的資料更完整與豐富。

## (二) 譚嗣同在獄壁上詩中「兩崑崙」所指為何？

歷史上廣為流傳譚嗣同在獄壁上詩「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此詩中兩崑崙所指為何？文本是如何解釋分析如下：

首先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裡提到提一詩於獄壁上「君既獄，題一時于獄日，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

<sup>104</sup>引自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43。

<sup>105</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十二章〈從監獄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270。

<sup>106</sup>1957年2月，湖南省博物館將其匯裝成《譚嗣同遺墨》集，譚嗣同遺墨集為冊頁裝訂，共收入譚嗣同遺墨15件，計有給夫人李閏書3通，給鄒岳生札1通，獄中遺札3通，給張薊雲札1通，給大伯父譚繼昇夫婦4通，《送別仲兄泗生赴秦隴省父》七律4首，木版印名刺1柬。此為博物館網址 <https://www.hnmuseum.com/zh-hans/zuixintuijie/>《譚嗣同遺墨》集。

<sup>107</sup>同註99，信函影本在本論文附錄圖一、圖二、圖三。

留肝胆兩崑崙，蓋念南海也。」<sup>108</sup>，蓋念南海也說明兩崑崙所指一人為康有為另一人未說明。

其次依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對有關記載去留肝膽兩崑崙如下：

公在獄中從容不迫，常繞室閒步，如拾有地面更香餘燼(獄史以更香為接班人信號)，即於牆上題詩，公僅有題壁詩一首傳出，詩云：望門投止思張儉(漢代黨錮傳，張儉被捕，無處可避，望門投止，人重儉名留之，有因此破家)，忍死須臾待杜根(杜根，後漢安帝時人，時帝年少，太后鄧氏臨朝執政，是時，權在外戚，杜根請太后歸政，太后捕殺之，將死棄於野，得蘇，日後鄧氏敗，根復任官)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首句言逃亡，言不願張儉行為望門投止，二句言忍死受辱，但清廷將亡之兆，第四句有人將去留二字分講，我認為不必如此，時公獨居京師，僅二僕相從——羅升、胡理臣。(崑崙奴，唐宋時用馬來人為奴，曰崑崙奴，體力強，能泅水，越高山如履平地)。)<sup>109</sup>

譚訓聰認為兩崑崙指的是崑崙奴也是兩位家僕羅升及胡理臣。

再其次近代依張建偉在《溫故戊戌年》〈譚嗣同獄中題壁詩考〉<sup>110</sup>論及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認為這詩是梁啟超篡改後的偽作，它引用了黃彰健找到了「譚嗣同獄中題壁詩」的原作原詩是：「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黃彰健先生在《繡像康梁演義》中發現了這首詩並作考證的研究，論述如下：

<sup>108</sup>引自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香港，友方出版社，1958，頁207。

<sup>109</sup>引自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44頁。

<sup>110110</sup> 張建偉：《溫故戊戌年》〈譚嗣同獄中題壁詩考〉，臺北，時英出版社，2002，221頁；「兩崑崙」指何物？一直是歷史學家好奇之處。梁啟超認為「兩崑崙」指康有為和大刀王五（王正誼），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稱：「所謂兩崑崙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少年嘗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又有一說是指唐才常和大刀王五，唐才質《戊戌聞見錄》云：「復生七丈雖役其身於清廷，從事維新，而其心實未嘗須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指唐才常）為餞行。酒酣，復生七丈口占一絕，有云：『三戶亡秦緣敵愾，勛成犁掃兩崑崙』。蓋勉伯兄結納哥老會，而已復於京師倚重王五，助其謀大舉也。」也有人認為「兩崑崙」指大刀王五和拳士胡七（胡致廷），尚一山稱：「蓋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二人系武林之崑崙派也。任公曰『蓋念南海也』，恐非是。」亦有人認為「兩崑崙」指譚嗣同的兩個僕人，古人謂僕人為崑崙奴，《唐人傳奇》中指僕人為「崑崙奴」，蒲松齡《聊齋志異·余德》：「向暮，有兩崑崙捉馬挑燈，迎導以去。」

第四句：「留將公罪後人論」，被梁啟超改成「去留肝膽兩崑崙」。原詩句的關鍵是「公罪」二字。清朝刑律有「文武官犯公罪」條款。所謂「公罪」指因公事失錯致罪，不包括謀反。在譚嗣同看來，康黨在形勢緊迫的情況下，預謀武裝奪權，乃「心有不得已之故」。具體說，光緒《密詔》囑咐維新黨人，不可違背太后意旨，但康黨沒有服從光緒的意旨，相反擬調軍隊「圍頤和園」，譚嗣同認為這是非常措施，既使「有罪」，也是「公罪」。這樣的「公罪」，其是非得失，只有留待後人去討論了。譚嗣同這一詩句更加坦誠。但對康、梁來說，「公罪」雖屬「不得已」，卻也畢竟是「罪」。譚嗣同居然承認有「罪」！這樣的詩句，當然更是非改不可。<sup>111</sup>

以上是黃彰健先生認為譚嗣同原先第四句「留將公罪後人論」，被梁啟超改成「去留肝膽兩崑崙」，但確沒有講兩崑崙是什麼指的是誰。

最後劉鳳翰《袁世凱與戊戌政變》，論及梁啟超在他的飲冰室詩話提及兩崑崙論點如下：

梁又在飲冰室詩話裡說：「譚澍陽(嗣同)獄中絕筆詩，各報多登之。但其詩中所指之人，或未知之，今略加案語：所謂兩崑崙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俠客王五，瀏陽作吳鐵樵傳中所謂王正誼者是也。王五為幽燕大俠，以保鑣為業，其勢力範圍，北及山海關、南及清江浦、生平專以鋤強扶弱為能事，瀏陽少年，嘗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盡，忽為義和團所戕，齎志以歿，嗚呼，王五真男兒，不負瀏陽矣。<sup>112</sup>

劉鳳翰先生認為兩崑崙指的是南海康有為先生及俠客王五。

回到文本得第十四章〈明月幾時有〉，作者將背景拉到了民國成立了四年，戊戌政變時出賣譚嗣同的袁世凱操縱民意，想把中華民國改為中華帝國，由他做皇帝，此時候梁啟超、蔡鐸他們再也忍不住了，於是描述了梁啟超與蔡鄂的對話情節，提及了譚嗣同獄中題壁詩如下：

記得你譚老師十六年前的獄中題壁詩吧？

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sup>111</sup> 張建偉：《溫故戊戌年》〈譚嗣同獄中題壁詩考〉，臺北，時英出版社，2002，頁 224

<sup>112</sup> 引自 劉鳳翰：《袁世凱與戊戌政變》，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頁 160

第四句寫出了去留之間，大家肝膽相照，崑崙為中國發祥地。『兩崑崙』指做兩位堂堂的中國人，不論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當年譚老師以程嬰和公孫杵白期勉老師和他自己，『去留肝膽兩崑崙』自是專指老師和他兩人而言。蔡鏗補上一句。<sup>113</sup>

作者用文本配角蔡鏗以第一人稱說出是梁啟超和譚嗣同，接著作者用梁啟超說出兩崑崙是另外兩個人，文本如下：

把『兩崑崙』解釋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應起來，固然相當，但我後來看到譚老師《石菊影廬筆識》中『學篇』第五十六則，有這樣的文字：『友人鄒沉帆撰西征紀程，謂希瑪納雅山即崑崙，精確可信。希瑪納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為崑崙奴，亦一證也。』這段文字，是譚老師生前自己所做的唯一對『崑崙』的詮釋。這樣看來，譚老師所謂的『兩崑崙』可能指的是他家的僕人，就是胡理臣和羅升這兩個人，在譚老師死後，一個去湖北向譚老師的父親報信；一個留在北京料理善後，所以有『去留』之意。<sup>114</sup>

以上梁啟超「兩崑崙」的第一種說法可能指的是他家的僕人胡理臣和羅升兩人，但又被否定，隨後兩人在文本又繼續論及譚嗣同從容就義的說法有很多種，文本書寫如下：

關於譚老師從容就義，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種解釋：或說他為了對支持變法維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說他為了提醒大家要繼續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說他為了證實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說他為了救他父親而死……每種解釋，其實都可以成立。「老師你相信哪一種？」蔡鏗問。<sup>115</sup>

接下來梁啟超從譚嗣同的俠義思想，也就是譚嗣同的內在是從佛法中看破生死，進而要殺身成仁，以完正果，另一方面想要用死來證明改良之路行不通，中國問題要真解決，還是要以革命來完成，接著談到譚嗣同因變法失敗拜託大刀王五去營救光緒皇帝，因此梁啟超認為兩崑崙，一個是譚嗣同，一個是王五，文本描述如下：

---

<sup>113</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十四章〈明月幾時有〉，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312。

<sup>114</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十四章〈明月幾時有〉，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313。

<sup>115</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十四章〈明月幾時有〉，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313。

從這種目標來看，『兩崑崙』是指王五和胡七的說法，反倒近似。有的說王五和胡七是崑崙派劍俠；有的說唐朝小說《崑崙奴傳》有『崑崙奴』摩勒、宋朝《太平廣記》也有陶帆和他『崑崙奴』摩訶，都用崑崙表達俠義的行事，所以『兩崑崙』指的，是劍俠們救皇上的事。那首詩最後寫他自己這邊，從容而死；而把救皇上的行動，托付給劍俠們了。照這樣路子解釋下去，可能『兩崑崙』中，一個是指譚嗣同自己，一個是指王五。他們之間的關係，也變成去者與留者的關係。<sup>116</sup>

以上小說情節特意安排梁啟超與蔡鄂在中華民國成立後的一段有關「兩崑崙」指的是誰的對話，文本作者先安排蔡鄂認為「兩崑崙」是梁啟超與譚嗣同兩人，再安排梁啟超認為『兩崑崙』可能指的是他家的僕人就是胡理臣和羅升這種說法太狹窄，因為這兩個人在譚嗣同死後，一個去湖北向譚嗣同的父親報信；一個留在北京料理善後。因此作者借用梁啟超對蔡鄂說出大家對「兩崑崙」是指誰的推論，梁啟超覺得其他人的推論其實忽略了譚嗣同性格中的俠義成分，因此梁啟超推論「兩崑崙」可能，一個是指譚嗣同自己，一個是指王五，因為兩人都是俠義之士，以上文本作者在小說中認為「兩崑崙」是大刀王五與譚嗣同。

綜述以上依目前綜合分析在「兩崑崙」指的是誰出現了，第一組南海康有為先生及王五和第二組譚嗣同家僕胡理臣和羅升兩人與第三組譚嗣同與王五，共3組五人，若從梁啟超的角度而言，將老師康南海與俠客王五放在一起，是指譚嗣同的死亡後想寄託康有為及王五救光緒並繼續變法，是托付也是忠心。而從譚訓聰的角度而言將「兩崑崙」比為家僕<sup>117</sup>，是意涵著譚家家僕的忠心與譚嗣同對國家的忠心是一樣的，同時托付兩家僕去辦他要完成的事，最後文本作者安排「兩崑崙」是譚嗣同與王五，如此情節乃與主角譚嗣同性格與王五兩人的性格具中國式俠義成分也同為俠義之士，這是文本設計也是作者對譚嗣同中國俠義思想表達，文本設計的角色研究及譚的俠義思想我將在第五章做論述。

本節研究作者在歷史補白的部分，文本設計讓梁啟超用疑問句自己說出「兩崑崙」可能是大刀王五與譚嗣同，這一補述推翻張建偉在《溫故戊戌年》

<sup>116</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第十四章〈明月幾時有〉，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頁313-314。

<sup>117</sup>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44，「望門投止思張儉(漢代黨錮傳，張儉被捕，無處可避，望門投止，人重儉名留之，有因此破家)，忍死須與待杜根(杜根，後漢安帝時人，時帝年少，太后鄧氏臨朝執政，是時，權在外戚，杜根請太后歸政，太后捕殺之，將死棄於野，得蘇，日後鄧氏敗，根復任官)，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首句言逃亡，言不願效張儉行爲望門投止，二句言忍死受辱，但清廷有將亡之兆，第四句有人將去留二字分講，我認爲不必如此，時公獨居京師僅二僕相從——羅升、胡理臣。(崑崙奴，唐宋時用馬來人爲奴，曰崑崙奴，體力強，能泅水，越高山如履平地)。



〈譚嗣同獄中題壁詩考〉<sup>118</sup>論及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詩是梁啟超篡改後的偽作，因為如果是篡改梁啟超所指的就是如梁啟超在他的飲冰室詩話提及兩崑崙是康有為及王五，但文本中寫成讓梁啟超說出是譚嗣同與王五。

本研究有兩個結論：歷史之謎「兩崑崙」在文本作者的情節安排下梁啟超在情節中講出兩崑崙指得是譚嗣同與王五，也補白了張建偉在《溫故戊戌年》〈譚嗣同獄中題壁詩考〉沒說的兩崑崙所指為何人，第二譚嗣同乃為俠義之士這與作者要表達的墨家俠義思想有關，將在第五章做論述。

####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研究文學若從史學的角度去看小說作品，無疑為我們打開了另一層嶄新的讀小說的視野，我們可藉此以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小說中的「事實」，從以上研究中發現文本既為歷史小說，作者所創作小說結構是以戊戌政變歷史真實事件及人物為基礎，再以小說中的角色加以情節上的想像及虛構，在這個過程中作者有意識的表達出譚嗣同的思想意識來完成文本的創作及參與了歷史。

在歷史上戊戌政變大約百日過程中譚嗣同所發生的真實事件有：一、光緒帝命康及四卿設法籌救之詔、二譚嗣同與袁世凱會面、三、譚嗣同入日本使館、四、譚嗣同與俠士商討謀救皇、五、譚嗣同被捕、六、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害。這六大事件均出現於文本，都是歷史真實事件，而文本中無論是時間或事件之因果也見未竄改，在歷史人物上文本中有七位重要的人物，分別為光緒帝、西太后、康有為、梁啟超、袁世凱、譚嗣同、大刀王五等，都是真實人物，也都隨事件在文本中以情節讓這些人物出現，事件中人物發生之時間及人物最後的因果也未見竄改。

文本基於歷史事件在想像與虛構中創作了主角性格，讓歷史情節充滿想像，也為了情節之必要性安排了虛構，本研究有兩項發現：

第一：袁世凱與譚嗣同見面地點在法源寺的虛構，這個虛構文本作者也承認，其目的在與書名主題的連接，有其必要性。

第二：文本在真實的歷史事件下，作者是以第三人稱的全知的視度，運用第一人稱書寫譚嗣同在事件中與梁啟超發生的對話內容，但作者並不是以第一人稱

---

<sup>118</sup>張建偉：《溫故戊戌年》〈譚嗣同獄中題壁詩考〉，臺北，時英出版社，2002，頁221。

書寫文本，而是以第三人稱主角觀點書寫文本並利用小說角色隱藏在第一人稱表達自己的主觀思維與批判性。

文本中以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其實作者自己的意識已經參與了戊戌政變歷史整個事件，這樣的意識參與，讓戊戌政變的歷史事件中的情節做了補白，在戊戌政變歷史所缺與懸案，是譚嗣同在歷史上最著名的獄中題壁詩內之「兩崑崙」所指為何之謎？在文本作者的情節安排下梁啟超在情節中以第一人稱講出「兩崑崙」指得是譚嗣同與王五，依本章的綜合研究在「兩崑崙」指的是誰？在文獻上總共出現了三組五人，分別為南海康有為先生及王五、譚嗣同家僕胡理臣和羅升兩人、譚嗣同與王五，共而文本作者安排推論是譚嗣同與王五，為什麼會有如此情節安排，與作者塑造小說中主角譚嗣同與王五兩人的角色性格，具中國式俠義成分有關，同時也書寫了譚嗣同與王五兩人在戊戌政變的歷史中成為俠義之士，這是文本情節設計也是作者對中國俠義思想表達，同時文本設計讓梁啟超用疑問句自己說出「兩崑崙」可能是大刀王五與譚嗣同，這一補述推翻張建偉在《溫故戊戌年》〈譚嗣同獄中題壁詩考〉論及「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如果這詩是梁啟超篡改後的偽作<sup>119</sup>，梁啟超篡改所指的就是如在他的飲冰室詩話提及兩崑崙是康有為及王五，但文本中書寫成讓梁啟超以第一人稱說出兩崑崙是指譚嗣同與王五，這意味著代表文本作者一方面否定了梁啟超的說法，一方面借由小說論及自己的觀點，且讓梁啟超自己補正「兩崑崙」非康有為及王五，之後填又寫了「兩崑崙」所指為何之答案是譚嗣同與王五。

歷史求真，小說求美，兩者之間若過多的真實或過多的想像與虛構是會有著差距與衝突，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也就是真實跟虛構，或歷史跟文學之間的劃分，究竟能不能成立的問題，本章從文本中歷史求真的部分是非常接近真實，然而求真，求美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我將從下一章文本小說的敘事從這個角度來看，來看文本求美的部份研析歷史跟小說顯的差別。

---

<sup>119</sup>張建偉：〈〈溫故戊戌年〉〉，〈譚嗣同獄中題壁詩考〉。-- 初版。-- 臺北市：時英，2002，頁221。

## 第四章 《北京法源寺》小說敘事研究

《北京法源寺》在文學作品的類型是屬於小說，在體裁上又可分為長、中、短篇，文本為一部長篇歷史小說，歷史小說透過描寫歷史人物和事件，它依據歷史事實呈現某段歷史時期人們的生活面貌，創作的內容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應有歷史根據，也可以作適當的想像和虛構，讓小說具有真實與虛構，提供讀者得到某種認識在於歷史上和美學上的啟示。

歷史小說通常以一個或幾個重要歷史人物的生平為主線串連歷史事件，小說的內容重要的要素含有人物、事件、時間、情節、主題與文體，以上要素必須在趨近於歷史實質存在的架構下開展，主要人物必須是歷史上曾有的人物，若有發展敘事之需要，可增加虛構的次要角色；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與地點應依史實不虛構；在情節設計上應依史實為主若因應情節發展可適度運用想像與虛構的情節；主題以歷史事件中的衝突性為主，讓文本中個別情節組合起來有一致性，文體之對話所使用的詞彙與句法必須符合時空背景，《北京法源寺》有關跟戊戌政變歷史事件的研究已在上一章研究，本章研究重點在文本作者如何將法源寺寫入了戊戌政變的小說中，並合於上述人物、事件、時間、情節、主題如何融合真實場景、歷史事件與虛構故事的小說情節，也透過主角人物譚嗣同的眼睛視角從北京法源寺的視野看戊戌變法波瀾詭譎多變的歷史。

本章將以小說敘事為方法對文本的時間、地誌、人物、故事情節等來分析文本敘事，首先分析文本中以主角譚嗣同為中心的敘事時間及空間結構為第一節之研究重點、其次第二節以愛德華·摩根·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的角色人物類型，談譚嗣同扁平化的人物結構分析，最後第三節分析文本譚嗣同的角色生與死情節結構，以李敖書寫譚嗣同這三方面的視角，來解開文本的文學藝術性。

### 第一節 文本敘事時間及空間結構

在小說必要的要素中時間與空間是分不開的，故事隨著時間不段的推進，空間是人物與情節發生的地方，以時間為背景，空間為前景基礎之上，如何佈置空間環境，讓小說人物得以表現，就成為一項表現作者書寫小說的藝術技巧。

本節將以譚嗣同為主體探討他在文本中的敘事時間、環境空間，首先將以本研究將敘事的環境空間看做一個整體，以加布爾·佐倫（Gabriel Zoran，

1984)《走向敘事空間理論》<sup>120</sup>三個層次空間理論模型，其中建構地誌的空間與時空體空間、兩大敘事空間加上行動域為研究結構，時間與空間必須透過行動才能構成完整的敘事時空，時間及空間都是靜態，需要有人物去行動才會彰顯文本之張力，本節其目的在解構文本在什麼時空下譚嗣同的行動域為何？如何產生劇情之因果？本節研究之敘事時間是以 1898 年戊戌變法前後與譚嗣同有關的時段為主要的時間範圍，敘事空間是以北京法源寺為主要的地誌空間，同時搭配時間來分析敘事文本呈現敘述者(narrator)按照某種的順序有組織某種的順序連接傳達給敘述接受者(narratee)的一系列事件，文本在敘事的時間軸上如同音樂一般能讓由發送者與接收者，順著所產生的敘述行為有所律動，主要在運用時間藝術，也因為敘述行為無法逃離時間軸線，敘事性必然存有時間因子，因此時間便成為敘事性的必要條件。

### 一、時間結構

黎慕嫻在《敘事性的時間問題》引述熱奈特提到的「敘事速度」有兩個基本型式：「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二元性上，故事時間是編年的客觀時間，敘事時間則是文本如何說故事的時間<sup>121</sup>。因此以下先分析文本時間序有「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如下：

「故事時間」：文本之敘事時間是以 1898 年戊戌變法前後時段為主要的時間範圍，依歷史時間變法共百日。

「敘事時間」：法源寺的建寺可追溯到唐朝，文本中因作者常常引經據典文本敘事情節的需要時間最早拉到秦朝荆軻時期，但我認為這都不是真正的敘事時間，文本情節的需要藉由文本角色的口白說出或作者的旁白，真正的敘事時間，文本是從楔子〈神秘的棺材〉開始，文本第一部分〈神秘的棺材〉楔子的時間為戊戌（西元 1898）年 8 月 16 日「那是八月十六，中秋過後第一天的子夜」<sup>122</sup>，然而文本沒有說這口棺材裝的是誰？答案文本作者隱含在第 12 章〈從監牢到法場〉，文本描述說明譚嗣同被斬首後，家僕將其屍體停放法源寺，「胡理臣先進廟裡洽辦，羅升在斜陽中望著廟門，正門上頭有三個大字法源寺」<sup>123</sup>，譚嗣同被斬首這一天是 8 月 15 日，但這不是故事的時間，這是敘事時間，作者以譚嗣同被處決後收屍進法源寺為敘事時間的開始，再從第二章〈寂寞餘花〉康有為進法源寺為時間 1888 年「時間是一八八八年，是清朝第九個皇

<sup>120</sup> Gabriel Zoran : 〈 *Poetics Today* :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 , Vol. 5 , No. 2 ,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Fiction (1984) , 頁 309-335 。

<sup>121</sup> 黎慕嫻：《敘事性的時間問題》，嘉義，南華大學，2004，頁 68，引述關於熱奈特「敘事速度」的說明，參見其《敘事話語》第二章時間距離。

<sup>122</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神秘的棺材〉，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3。

<sup>123</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285。

帝光緒十四年，中國、的戊子年舊歷正月初二日的上午」<sup>124</sup>到最後一章第十五章〈古刹重逢〉康有為從返法源寺「雖然已是一九二六年，清廷玉朝已被推翻了十五年，可是，菜市口還是前清時的老樣子。」<sup>125</sup>為 1926 年，文本中書寫「算來康先生會嚇一跳，近四十年以前。準確的說，是三十八年前。」<sup>126</sup>，敘事時間共歷經了三十八年，因此文本的敘事時間結構安排如下：

表格 3：文本敘事時間（一）

章節	時間	內容	備註
楔子	1898 年陰曆 8 月 16 日	有一副神祕的棺材。	為敘事時間的第一起點
第二章	1888 年陰曆 1 月 2 日	康有為進法源寺	為敘事時間的第二起點
第十二章	1898 年陰曆 8 月 15 日	楔子神祕的棺材內裝的是譚嗣同的遺體。	為敘事時間的第一起點的結束點
第十五章	1926 年陰曆 1 月 2 日	康有為重返法源寺	為敘事時間的第二起點結束點

從本研究第一個發現為敘事時間 1888 年陰曆 1 月 2 日至 1926 年陰曆 1 月 2 日共 38 年，文本真正的敘事時間是從楔子〈神祕的棺材〉開始，時間為戊戌（西元 1898）年 8 月 16 日，第二個發現為譚嗣同死亡的敘事時間為 1898 年陰曆 8 月 16 日譚嗣同的遺體停屍法源寺開始，文本以倒敘法來敘事譚嗣同發生了什麼事。

接下來本研究的重點敘事時間是以文本中的譚嗣同敘事時間為 1898 年的這一年作為範圍，我發現文本第 12 章作者非常清楚的交代了敘事時間序，整理如下：

表格 4：文本敘事時間（二）

序列	時間	文本敘事事件
1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陰曆八月初九	光緒皇帝第一道命令把譚嗣同等六個人「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

<sup>124</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15。

<sup>125</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古刹重逢〉，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329。

<sup>126</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古刹重逢〉，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334。

2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陰曆八月初十日	中國農曆戊戌年八月十日，梁啟超去了日本，譚嗣同被捕。
3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陰曆八月初十一日	西太后於舊曆八月十一日，又下了第二道命令，「著派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都察院，嚴刑審訊」。
4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陰曆八月初十二日	舊曆八月十二日但形式上只「嚴刑審訊」了一整天。
5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陰曆八月初十三日	舊曆八月十三日第三道命令：「諭軍機大臣等：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大逆不道，著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

以上作者在文本第十二章〈從監牢到法場〉的日期就訂到舊曆八月十三日「舊曆八月十三日就下了這樣的第三道命令：諭軍機大臣等：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大逆不道，著即處斬」<sup>127</sup>，接下來作者開始描述「在這命令還沒公佈的清早，刑部監上下已忙做一團，開始「套車」了」<sup>128</sup>以及譚嗣同如何被斬首菜市口，因此譚嗣同的斬首日應為陽曆九月二十八日，陰曆八月十四日，這也合乎史料譚被處決的真實時間為陰曆八月十四日，另外作者為什麼在楔子要交代譚嗣同停屍的日期？作者為了要銜接第十四章「明月幾時有」所做的鋪陳與伏筆，讓楔子描述戊戌年陰曆八月十六日文本中這口棺材裝的是誰？答案在第14章「明月幾時有」也就是譚嗣同。以上為文本之時間佈局，因此以上發現可證明文本是以倒敘法來寫作先寫譚嗣同死亡之日後續再寫譚嗣同如何死亡，此為小說之倒敘法。

## 二、環境空間結構

環境是指構成人物活動的客體關係，是小說結構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環境包含了三大要素：自然現象、社會背景、物質產品，自然現象指的是天氣地域，社會背景指的是活動時的背景、風俗人情，物質產品指的是城市的建築或者是服裝的樣式或者是使用的物件等<sup>129</sup>，本研究指的空間的是地誌，地點及擺設，這三個元素就是構成小說的場景，另外也需要行動域，當人走入場景後就產生了新的互動元素，文本作者如何讓文本具空間感，是本段的重點。

<sup>127</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77。

<sup>128</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77。

<sup>129</sup>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158-160頁。

所謂地誌的空間是指作為靜態實體的空間，也是一系列對立的空間概念，可以是物或人的空間，在物的方面如住家內與家外、鄉村和城市、國內和國外，在人或物存在的形式空間如神界和人界、現實與夢境，建構這一空間可以通過直接描寫達成，也可以通過敘述、對話或小說的文本來完成對這一空間的重現，本研究採文本的建築空間將以譚嗣同有關的四大地誌：北京「法源寺」，瀏陽會館，海南會館，刑部大牢為研究空間來探究其理由及原因如下：

北京法源寺為文本之書名自有他的含意與重要性，也是文本主要**敘事空間**，瀏陽會館乃譚嗣同在北京的家也是商討變法維新的地方，海南會館會館為康有為講學之地同時也是決定變法之地，刑部大牢為譚嗣同變法失敗後囚禁之地，以上地誌都是在中國北京，小說中的時空是戊戌變法的「法源寺」與現在自有不同，以上4個地點為本節研究敘事空間的主體，由此展開空間結構研究以空間地點及空間擺設和行動域三項一窺文本之創作空間的藝術性。

### （一）地誌的空間

是指在靜態實體的空間概念，如內與外、村莊和城市國內與國外。文本與譚嗣同有關的重要地點（place）均在北京共有四處：第一處法源寺，第二處瀏陽會館，第三處刑部獄及第四處菜市口，在這些地點文本同時也描述了譚嗣同從討論中國未來之地到被捕後住入的監獄到斬首及停屍的地誌空間，如何再現歷史空間其實是傳達某種意義也是與讀者溝通行為表現。

#### 1. 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是文本書名自有其重要性，法源寺地理為於北京，建廟起因，乃唐朝貞觀十九年（西元645年），唐太宗詔令於幽州城內建寺，當時叫憫忠寺，建設目的是為了紀念征戰朝鮮半島時戰死的將士，到了清朝雍正皇帝時改名法源寺<sup>130</sup>。本身除了是間寺廟外更有其所指，北京法源寺在文本第十二章從〈監牢到法場〉描述了譚嗣同被斬首後停靈的地方，文本如此描述「他們在廟

<sup>130</sup>李敖：《北京法源寺》〈第一章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年2月1日出版，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法源寺，又稱憫忠寺，位於中國北京市西城區菜市口附近教子胡同的南端，是北京城內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佛寺。建廟起因，唐朝貞觀十九年（645年），唐太宗詔令於幽州城內建寺，以悼念在東征高句麗戰爭中陣亡的將士。唐朝時的高麗，不僅在朝鮮半島稱霸，北邊的勢力，還延伸到中國東北的遼水流域，唐太宗絕不能忍耐朝鮮做大。貞觀十九年（644年），唐太宗親征東北高麗。」

唐太宗的計劃是，用二十萬人以下的兵力，用快速進攻，速戰速決。很快的唐朝的大軍，已進軍到安市（遼寧蓋平縣東北）。高麗動員了十五萬人，雙方展開了惡鬥，最後打不過高麗，因遼東太遠了，補給困難，高麗人很會守城，只好撤軍了，回到幽州，就是北京。到幽州的時，所有的馬，只剩下五分之一了。唐太宗很痛苦，他在幽州，蓋了一座廟，追念這次征東而死的所有的將士，他們的死亡，是為國盡忠而死，死在家鄉以外。這座廟，叫做「憫忠寺」，清朝改為法源寺。」

門口歇下，胡理臣先進廟裡洽辦，羅升在斜陽中望著廟門，正門上頭有三個大字——「法源寺」。」<sup>131</sup>

因此文本中對北京法源寺具有符號學中「所指」豐富的相對涵指域，文本談及法源寺的內部有四個空間分別為大門、藏經閣、憫忠閣、大雄寶殿肆個地點，以下是文本對這四大空間的描述。

1.1 法源寺的大門：在文本第二章如此描寫大門：

法源寺在北京宣武門外西磚胡同，三座大門，中間的門最大，前面左右各一隻石獅子，門頂上是厚重的宮殿式建築，門與門之間是牆，牆頭也同樣鋪上琉璃瓦。<sup>132</sup>

描寫法源寺的空間書寫由大門外觀開始，是三座型的大門，也有廟宇大門常見的石獅子。

1.2 法源寺內的大雄寶殿

大雄寶殿並不高，走上八級台階，就是寶殿正門。正門看上去四扇，只是中間兩扇能開。正門左右有對聯，上面有三扇橫窗，橫窗上就是「大雄寶殿」橫匾。<sup>133</sup>

接著描寫進入法源寺後，動態需走八級台階才上能大雄寶殿。

1.3 法源寺內的憫忠閣

文本描述寺裡面，蓋了一座大樓，叫憫忠閣。在第一章〈憫忠寺〉論及

寺裡面，蓋了一座大樓，叫憫忠閣，立了許多許多有名的和無名的紀念牌位，閣蓋得極高，高得後來有一句諺語：「憫忠高閣，去天一握。」表示它離天那麼近。對憫忠閣特別用諺語憫忠高閣，去天一握。<sup>134</sup>

再描寫入法源寺內的核心建築憫忠閣，此建築物的目的，是讓無論有名和無名為國犧牲的忠烈們上天堂。

1.4 法源寺內的藏經閣：廟上最後一進的藏經閣，文本第 15 章是如此的描述：

<sup>13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285。

<sup>132</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15。

<sup>133</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17。

<sup>134</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憫忠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9。



廟上最後一進的藏經閣。原因是余法師生前說他讀書沒讀夠，死後盼與書為伍。廟上的人為了成其遺願，就把他供奉在藏經閣。閣前有百年古銀杏一棵，枝幹蔭覆半院。階前有兩株西府海棠，也兩百多年了。<sup>135</sup>

最後再描寫入法源寺最內的建築物，文本特別在最後一進的藏經閣安置百年古銀杏一棵及已經兩百多年的兩株西府海棠，此表除了藏經閣外的已百年銀杏及海棠讓讀者有歷史時代的感覺。

以上是法源寺內部的四大空間，作者將法源寺的環境空間，寫入小說的方式是先從大門接下來進入大雄寶殿再往後是憫忠閣最後是藏經閣共三進，這肆個空間地點是有前後順序，目的是讓閱讀者有進入法源寺具有空間感，其中憫忠閣為法源寺的中心，這裡透露此閣放著歷史上曾為國家有犧牲貢獻有名字的和無名字的紀念牌位，但憫忠閣卻沒有譚嗣同的牌位。

## 2. 瀏陽會館

變法期間，譚嗣同住在瀏陽會館，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帝召譚嗣同等維新變法人士到北京，同年七月初五譚嗣同抵達北京，住進瀏陽會館前院的西房，自題名「莽蒼蒼齋」，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常在此商議維新變法之事，瀏陽會館因此是維新派活動中心之一，譚嗣同該時期的不少書信及詩文都作於此處，譚嗣同被慈禧太后處決後，瀏陽會館一度成為悼念他的祠堂，瀏陽會館位置在當時北京宣武門外大街南口，瀏陽會館前院的西房，乃譚嗣同自題名為「莽蒼蒼齋」是商討變法維新的地方，文本第十五章中出現描述如下：

離開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門外大街南口，走進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側，一座地勢低矮的房子出現了，那是譚嗣同住過多年的地方——瀏陽會館。會館裡的莽蒼蒼齋，三十年前，正是他們商討變法維新的地方，多少個白天、多少個晚上、多少個深夜，他和譚嗣同等志士們在這裡為新中國設計藍圖。三十年，這麼快就過去了，莽蒼蒼齋老屋猶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網與劫灰，已是一片死寂。<sup>136</sup>

當時維新派重要人物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他們常在瀏陽會館當活動中心，商議維新變法之事，另外莽蒼蒼齋為譚嗣同為他的書齋，在該時期的不少書信及詩文均創作於此處，作者將當時瀏陽會館空間地點的寫法，是先

<sup>135</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古剎重逢〉，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337。

<sup>136</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古剎重逢〉，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331。

寫地點，再寫會館裡的莽蒼蒼齋，然後運用時間的用語以多少個白天、晚上、深夜三個時間關係，讓讀者進入莽蒼蒼齋主人在為新中國設計藍圖的時空中，此為作者安排譚嗣同設計變法之地。

### 3.南海會館

位址在北京米市胡同此是康有為的居留地，文本第七章寫道：「梁啟超米市胡同的南海會館，他是更常去的。因為南海會館是老師康有為的居留地。」<sup>137</sup>因為康有為是譚嗣同的老師，因此這是他常去的地方，同時也是康有為拿著密詔，跟學生包括譚嗣同決定變法的地方。文本第九章中出現描述如下：

南海會館裡，康有為和大家捧著密詔，做了緊急的決定。同樣的第二天清早，經過一夜的討論，大家在南海會館分別走出來。<sup>138</sup>

以上為南海會館空間地點的描寫，作者描寫當時譚嗣同於南海會館經過與同黨一夜的討論決定變法的地方，此為作者安排告訴讀者譚嗣同決定變法之地，這也是變法重要的環境空間。

### 4.刑部獄

這個地點為譚嗣同被關的地方，依文本用方苞的《獄中雜記》描寫方苞後來被赦出獄寫的《獄中雜記》<sup>139</sup>，此雜記所寫內容寫這所監獄一共有四座老監房。每座監房有五個房間，獄卒住在當中的一間，前面有大窗通光線，屋前有小窗透空氣；其餘的四個房間都沒有窗，可是關的犯人經常有兩百多。<sup>140</sup>若每座監房有五個房間：獄卒住在當中的一間，代表只有四個房間關犯人，但文本卻寫著在提出戊戌六君子斬首時卻有六間單獨的小房間，寫道：

牢門共六間，分別提出來的，是譚嗣同、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譚嗣同住刑部監獄南所的第一間。<sup>141</sup>

然而本研究發現然方苞為康熙年間之人，或許到了光緒年間有了改變，也可能是作者對地誌的想像，另外此為作者安排告訴讀者譚嗣同被囚之地。

<sup>137</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古剎重逢〉，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337。

<sup>138</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90。

<sup>139</sup>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72。

<sup>140</sup>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72。

<sup>14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78。

以上四個地誌空間在文本裡分別瀏陽會館為譚嗣同設計變法之地，南海會館為譚嗣同決定變法之地及刑部獄是譚嗣同被囚之地到法源寺為譚嗣同最後停屍之地，文本地誌空間環境的描寫，包含地點與事件，目的是讓歷史空間重現的書寫手法。

## (二)、擺設空間

美學藝術家李歐納·科仁（Leonard Koren，1948）將安排物件擺放的修辭共分有八個原則層次、輪廓、觀感、隱喻、神秘感、敘事性、連貫性、共鳴。<sup>142</sup>這些修辭不僅是用在審美的表達也是傳達某種意義也是種溝通行為，本段上一段的地點在文本擺設空間的敘事描述及傳達隱喻分析如下。

文本敘事中與譚嗣同有關的空間擺設描述有 1 法源寺內的物件擺設有丁香花，牌匾「法海真源」，及「龜趺」等三項。2 瀏陽會館裡的書齋莽蒼齋 3. 刑部獄的擺設 4 菜市口刑場的擺設，以上有關的空間如何擺設由下列說明：

### 1. 法源寺的物件擺設

#### 1.1 丁香

清代康、乾期間法源寺繁茂多樣的花草樹木名冠京華，清乾隆法源寺以海棠最盛，據洪亮吉詩：「法源寺近稱海棠，崇效寺遠繁丁香。」<sup>143</sup>，到清同治、光緒之後，法源寺則以丁香為名，前庭後院所植丁香，花開時芬芳濃郁 1924 年 4 月，印度泰戈爾應邀訪問中國泰戈爾在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等人陪同下，到法源寺賞丁香。

文本的第一章提及元朝張翥<sup>144</sup>，一首律詩：

百級危梯溯碧空，憑欄浩浩納長風。金銀宮闕諸天上。錦繡山川一氣中。事往前朝人自老，魂來滄海鬼為雄。只憐春色城南苑，寂寞餘花落舊紅。」<sup>145</sup>

<sup>142</sup>李歐納·科仁：《擺放的方式：安排物件的修辭 Arranging Things：A Rhetoric of Object Placement》，臺灣，行人出版社，2014。

<sup>143</sup>洪亮吉（1746 年—1809 年），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江蘇陽湖（今常州市）人，祖籍安徽歙縣。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庚戌恩科榜眼。清代乾隆、嘉慶年間著名學者、文學家，並因人口學說而著稱。

<sup>144</sup>張翥（1287 年—1368 年），字仲舉，世稱蛻庵先生，晉寧人，元朝詩人。

<sup>145</sup>李敖：《北京法源寺》〈憫忠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13。

文本在這一章的結尾書寫了「寂寞餘花的時候，開始了本書的故事」<sup>146</sup>。這朵花是什麼花？於是有了情節的安排第二章就以「寂寞餘花」作為篇章，而第二章除了丁香並沒有提到法源寺有很多丁香也沒有論及其它的花，因此第一個推論「寂寞餘花」的花為丁香，為什麼稱寂寞餘花，文本中論及法源寺是維繫一代又一代的名將、勇士、俠客的名寺，明末名將袁崇煥冤死時，棄屍西四甘石橋，沒人敢收屍，袁崇煥的僕人余氏半夜偷了屍體，埋在法源寺附近，世代為袁崇煥守墓，作者在文本第 1、2 章及第 15 章頭尾的分佈讀者才能看見譚也遭到與袁崇煥同樣冤死被棄屍，僕人收屍進法源寺的命運。

其次作者透過文本角色康有為在第二章之尾引述丁香的意涵：

丁香潔身自好，也好看、也好聞。但要做中藥，得磨成粉煮成湯才有用。若不粉身碎骨，它只是好看好聞而已。<sup>147</sup>

然而隨粉身碎骨的出現就接引著第三章章名〈休懷粉身念〉，粉身是指什麼？文本如此描寫：

丁香很柔弱，結子又多，葉子和花都漂亮，但是是素色中的美麗，不是艷麗的。把丁香種在房子後面，為了是給有思想的人欣賞。丁香自己呢？它早晚像蘭麝一樣發出芳香，但卻不必想到自己會磨成粉的。整首詩的意思是，一個柔弱美麗的生物，它該知道自己的特質，完成自我，雖然自我的最後完成恐怕是粉身碎骨，大家以為雄壯的松樹柏樹歲寒而知後凋，沒注意到柔弱的丁香也是有這種堅強的特性。丁香一輩子，生前死後都發出了它的特質，雖然長得一點也不雄壯。所以，大事不全是強者做的，弱者也可以做不小的事，如果結局是粉身碎骨，弱者也許不敢做。但如果『休懷粉身念』，不必多想它，最後弱者做出的功德，也不一定小呢。<sup>148</sup>

作者在這一章做了丁香粉身是「完成自我」的隱喻，所指的是譚嗣同自我犧牲救國救民的情操；也是這部小說的核心，譚嗣同在變法過程中選擇了自我毀滅並喚起中國的改革如同丁香一般，生前死後都發出了它的特質生前芬芳死後可以當藥材，雖是犧牲但可以救人的象徵。

## 1.2 牌匾：法海真源

<sup>146</sup>李敖：《北京法源寺》〈憫忠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13。

<sup>147</sup>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42。

<sup>148</sup>李敖：《北京法源寺》〈休懷粉身念〉，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66。

「法源寺」本為唐太宗建廟取名「憫忠寺」，作者直白指出這是中國的早期忠烈祠，並提到清世宗雍正皇帝，在一七三一年的時候，它改名叫「法源寺」，四十九年後，清朝的第四個皇帝高宗乾隆也親來這裡並且親題寫了「法海真源」四個字，刻成匾，掛在這廟裡。「法海真源」與寺名有關連，然而作者在第貳章提出了一個問題：「法師認為，是法源寺的名字好呢，還是憫忠寺好？」而法師的回答：

從對人的意義說，是法源寺好；從對鬼的意義說，是憫忠寺好；從對出家人的意義說，兩個都好。青年人會心地一笑，法師也笑著。我覺得還是憫忠寺好，因為人早晚都要變成鬼。……寺廟的用意並不完全為了超度死者，也是為了覺悟生者。<sup>149</sup>

因此作者提示了法源寺包括了死與生兩者的廣義意涵，同時隱喻了文本故事譚嗣同這段生與死的價值選擇，給讀者留下覺悟的空間，同時象徵法源寺的文化符號在「覺悟生者」。

### 1.3 法源寺的「龜趺」

寺內的古跡舊碑下立的烏龜台石文本稱「龜趺」，作者論及龜趺自唐朝以來就流行了及其意義，文本第二章「龜趺」描述如下：

台階旁邊立著舊碑，因為是千年古剎，寺裡的這類古跡也很多。有的舊碑下面塑著大龜，這個烏龜台石叫『龜趺』，唐朝以來就流行了。烏龜頭略向上抬著，好像背負著歷史，不勝負荷。<sup>150</sup>

文本作者把「龜趺」納入書寫，比喻著唐朝以來就背負著一代一代為國捐軀的戰亂歷史，不勝負荷，永遠有下一個「龜趺」，暗指譚嗣同也會入寺，象徵歷史循環的不變性質。

## 2. 瀏陽會館的擺設

瀏陽會館內有設有譚嗣同書房莽蒼齋，這個地方為商討變法維新的地方，同時這個地方是譚商討變法之地也是被捕之地。而這個書房的擺設有匾額

<sup>149</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9。

<sup>150</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7。

書寫著「視爾夢夢，天胡此醉；於時處處，人亦有言」<sup>151</sup>，視爾夢夢指的是什麼？

文本第 15 章作者傳達了譚嗣同將永遠離開他的書房，文本作者描述如下：

如今，三十年過去了，譚嗣同「氣雄萬夫」而去，「視爾夢夢」的，正是他自己。「再見了，莽蒼蒼齋；再見了，復生。」這裡塵封了他們早年的歲月、這裡寄存了當年救國者的歡樂與哀愁、這裡凝結了譚嗣同被捕前的剎那，在那從容不迫的迎接裡，主人迎接捉拿欽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過客，只有舊屋還活現主人，而主人自己，卻長眠在萬里朱般之外，在蒼蒼的草莽裡，默然無語，人亦有言。<sup>152</sup>

文本在最後在第 15 章才出現這個擺設，其目的在營造譚嗣同的視爾夢夢<sup>153</sup>，回首人生逆旅譚嗣同的一生，象徵留給人「人亦有言」去討論譚嗣同的故事。

### 3. 刑部獄的擺設

譚嗣同是被關在刑部監獄南所的第一間，內部擺設有一床一桌一椅，文本第 12 章提及：

他被帶到刑部監獄南所的第一間——頭監牢房裡，房裡一床一桌一椅，陰暗、骯髒而簡陋。<sup>154</sup>

再繼續提及譚嗣同在監獄牢房中向外看的景緻如下：

牢房外有棵大榆樹，他把椅子放到床上，站上去，勉強可攀住高窗，朝外望去，正看到刑部獄的內院，院中那棵大榆樹，忽然提醒了他：這不是明朝楊椒山楊繼盛在獄中親手種的那棵有名的大樹嗎？楊繼盛三百五十年前，不正關在錦衣衛嗎？錦衣衛獄不就正是今天這個刑部獄嗎？而楊繼盛住的，不正是編號頭監的這同一間牢房嗎？<sup>155</sup>

<sup>15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古剎重逢〉，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331。

<sup>152</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古剎重逢〉，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331-332。

<sup>153</sup>《詩經》《抑》「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sup>154</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262。

<sup>155</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265。

以上文本描寫的牢房內外擺設，在牢房內作者營造牢房裡沒有燈光，牢房裡幾乎是黑暗的房裡一床一桌一椅，陰暗、骯髒而簡陋，讓讀者有感于獄中的簡陋，在牢房內作者營造譚嗣同如楊繼盛的命運般被陷害。

#### 4. 菜市口刑場的擺設

譚嗣同是在北京菜市口被刑斬的，其刑場的擺設是在一個棚子下，棚下放著一張長桌、一把椅子，桌上放著錫筆架，上面插著硃筆，給監斬官使用文本描寫如下：

西鶴年堂旁邊就要搭上個棚，棚下放著一張長桌、一把椅子，桌上放著錫筆架，上面插著硃筆，給監斬官使用。<sup>156</sup>

之後戊戌六君子在菜市口被處死，譚嗣同臨死前十分從容，他的喊聲振動法場：「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sup>157</sup>，這裡作者營造刑場擺設簡單，其實刑場主要功能在驗明正身及處死，此擺設讓讀者閱讀時有清朝刑場臨場感。

上述的四段空間擺設的修辭具敘事性及連貫性，讓讀者進入對擺設的敘事有共感的空間，同時也隱喻傳達譚嗣同從生到死的過程。

### 三、戊戌政變譚嗣同的行動域(zone of action)

行動域是指可以容納多個事件在同一地點發生，也可以包含同一事件連續經歷的空間，它是事件發生的場所，但沒有清晰的地理界線，其目的在貫穿時間與空間讓劇情的時空感可以具有張力及歷史的臨場感，文本中的譚嗣同行動域從法源寺遇梁啟超開始，到過的地方有南海會館、日本大使館、劉湘會館、刑部獄、菜市口，這個過程中需穿梭在北京場域，移動的過程中傳達了譚嗣同的生與死，但文本的文本中的譚嗣同行動開始到最後都在法源寺，作者隨場域的移動發展故事情節，而讓文本充滿因移動也讓閱讀者產生參與移動空間的動感。

譚嗣同在變法維新的行動域順序分別為從南海會館進法源寺回南海會館進日本大使館回劉湘會館進刑部獄到菜市口再回法源寺回湖南，這些行動與發生了什麼事分析如下：

<sup>156</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81。

<sup>157</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84。

表格 5：譚嗣同移動地點

順序	譚嗣同移動地點	故事事件	說明
1	法源寺	梁啟超與譚嗣同在第七章於法源寺第一次見面	
2	南海會館	譚嗣同與康有為梁啟超共商政變提議見袁世凱	康有為與梁啟超住南海會館九月十八日清早，在南海會館裡，康有為和大家捧著密詔，做了緊急的決定：第一、要想辦法救皇上，譚嗣同提議去勸說有新建陸軍在手的漢族軍頭袁世凱
3	法源寺	譚嗣同見袁世凱	
4	南海會館	譚嗣同與梁啟超商討救光緒皇帝	
5	日本大使館	譚嗣同與梁啟超討論生與死的決定	
6	劉湘會館	譚嗣同與王五商討救光緒皇帝	
7	刑部獄	譚嗣同被逮入獄	
8	菜市口	譚嗣同問斬之地	
9	法源寺	譚嗣同停屍	
10	湖南	運回譚嗣同屍體	

以上為文本中譚嗣同在變法維新的十項行動域架構，這裡我發現在此行動域的架構下有三個研究發現：

第一：作者書寫譚嗣同的行動域的方式是線性敘事結構的隨著歷史事件的時間序結合事件發生的地點，譚嗣同在戊戌政變的行動域的範圍都在北京但文本作者把法源寺納入後提高了文學性。

第二個關鍵行動領域在日本大使館，如果譚決定求生而去了日本其順序分別為南海會館〉法源寺〉回南海會館〉日本大使館〉日本，一個決定可能改變了行動域也改變了歷史。



第三個關鍵行動領域在譚嗣同生前在法源寺第一次遇到梁啟超最後到譚嗣同死後停屍在法源寺如此書寫表現了生與死、動與靜的張力。

時空體空間包含共時性、歷時性兩種性質，歷時性是強調敘事的順序推進，共時性是強調在一定的背景下是如何被感知，由事件和運動形成的空間結構，也可以簡單稱做「時空」，它包括共時和歷時兩種關係，本研究研析在文本中相互聯繫構成的空間關係。

文本在時間的安排作者以譚嗣同被處決後收屍進法源寺為敘事時間的開始，再以第 2 章康有為進入法源寺為時間 1888 年到最後一章康有為從返法源寺為 1926 年，共歷經了 38 年，因此本研究第一個發現為作者以倒敘法來敘事文本。

環境空間在故事位置分靜態與動態，靜態是限制在基本的固定空間，人物也是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動態是指敘述在某一個地點變化，如西遊記從天上到人間，從一個地方轉向一個地方。<sup>158</sup>文本在環境空間的安排，作者讓與譚嗣同相關的四處空間包括法源寺，瀏陽會館，刑部獄及菜市口，在這些地點同時也描述了譚嗣同從討論中國未來之地到參與戊戌政變被捕後入住的監獄及斬首停屍的地方，文本作者在環境空間在敘事是靜態的書寫，另外作者利用地誌空間，及空間擺設和行動域三項敘事空間重現了戊戌政變之歷史空間。

文本在空間擺設具敘事性及連貫性，讓讀者進入對擺設的敘事有共感的空間，同時也隱喻傳達譚嗣同從生到死的過程，當有了敘事地點及空間擺設後，文本作者書寫譚嗣同的行動域的方式是線性敘事結構，隨著歷史事件的時間序結合事件發生的地點，在行動領域按戊戌政變事件讓譚嗣同由生前從南海會館到死後回湖南之行動領域從：南海會館〉法源寺〉回南海會館〉日本大使館〉劉湘會館〉刑部獄〉菜市口〉法源寺〉湖南），書寫譚嗣同文本讓他在日本大使館決定求死，若譚嗣同決定求生而去了日本其順序分別為從：南海會館〉法源寺〉回南海會館〉日本大使館〉日本，一個決定可能改變了行動域也改變了歷史，中文本作者把法源寺納入戊戌政變事件中，讓關鍵行動領域在譚嗣同生前在法源寺第一次遇到梁啟超及最後寫到譚嗣同死後停屍在法源寺如此書寫表現了生與死、動與靜的張力，這種有張力的敘事結構寫法提高了歷史小說的文學性。

---

<sup>158</sup> 胡亞敏：《敘事學》，湖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163-164 頁。

## 第二節 譚嗣同扁平化的人物結構

金庸說過：「一般西方小說家大概注重三點：一、重心在描寫背景二、以情節為主；三、以人物為主。中國古典傳統小說大致是以人物為主。」<sup>159</sup>，文本具有中國古典小說的特色全文仍是以人物為主尤其是主角譚嗣同，本節我的研究注重作者的將文本中的譚嗣同塑造性格為何？做以下的分析。

愛德華·摩根·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小說人物分成扁平人物及圓形人物，在十七世紀時，扁平人物被稱作性格人物，而現在稱作類型人物或漫畫人物，福斯特認為扁平人物有兩大長處：一是容易辨認，二是容易記憶。<sup>160</sup>扁平人物帶有固定的臉譜化的特徵，僅從單方面讓性格突出化，去掉現實人生中應有的複雜人性，例如小說中一個角色被設定為壞人，因此他的行為特徵只有兇殘、暴力、邪惡、不認親情等，或者一個人物被設定為奸商，他所做的一切都集中為撈錢不擇手段、不顧仁義、為利試圖容等這些方面的性格。愛德華·摩根·福斯特認為扁平人物受到青睞的原因是我們希望看到經久不衰的、人物始終如一的作品：

我們大家都在追求永恆的東西，即使閱歷很深的人也如此，在一般人看來，這也是藝術創作的的主要原因。我們希望看到經久不衰的、人物始終如一的作品，以此作為逃避現實的寄託，這也就是扁平人物受到青睞的原因。<sup>161</sup>

另外一種人物為圓形人物則是豐富的也帶有多個面像的立體臉譜，此類的人在小說中會被分別表現人物不同性格，多面的個性甚至互相衝突因此一般來說圓形人物在細節描寫和心理描寫方面要比扁平人物豐富。文本作者提及這部小說是陽剛的作品之作：

這是一部陽剛的作品，嚴格說來，書中只有一個女人，並且還是個壞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與活動。它寫男性的豪俠、男性的忠義、男性的決絕、男性的悲壯。但它並不歧視女人，從光緒的珍妃的哀怨、到譚嗣同的閨妻的死別，都可反映出這些，只是它的主題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sup>162</sup>

<sup>159</sup>吳明麟：《天龍八部》美學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九十一學年度碩士學位論文），2003，第三章 情節結構、敘述視角與時間空間。

<sup>160</sup>E.M.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頁60。

<sup>161</sup>E.M.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頁61。

<sup>162</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回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364。

上述如果是陽剛之作必定有扁平人物之對照，有忠奸之分，福斯特認為扁平人物有兩大長處：一是容易辨認，二是容易記憶。他認為扁平人物受到歡迎的原因我們希望看到小說人物始終如一的作品，在追求永恆的東西，這也是藝術創作的主要原因以此作為逃避現實，本節以譚嗣同在參與變法到變法失敗被補入獄至處決文本以扁平人物的刻劃及描寫應有特別的性格，一貫的塑造出真俠客，也是仁義之士的形象。

首先作者讓譚嗣同有決定參與變法有抱負青年之性格，文本第七章譚嗣同離開湖南時務學堂決定參與變法，譚嗣同如下表示：

我們大家在時務學堂這段因緣，恐怕就此成為終點，但是我們的師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國之情，卻從梁先生這一標準上，有了起點。我們時務學堂的師生都是有抱負、有大抱負的。此後我們會從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們的國家，成敗利鈍，雖非我們所能逆睹，但是即使不成功，梁先生所期勉的非破家不能救國、非殺身不能成仁，相信我們之中，一定大有人在。在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在不可知不可料的地方，我們也許會破家殺身，為今日之別，存一血證。那時候，在生死線上、在生死線外，我們不論生死，都要魂魄憑依，以不辜負時務學堂這一段交情。<sup>163</sup>

以上這段作者安排譚嗣同自述基於師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國之情，想信救國非殺身不能成仁，此段作者塑造譚嗣同對變法有抱負青年之性格。

另外在文本寫道第十一章〈捨生〉譚嗣同變法失敗，決定參與變法選擇成仁跟王五及黃軫的一段對話如下：

你只注意到我在做一件失敗的事，你卻沒注意到我根本就沒想做成功的事，成功需要時間和氣候，我正好被安排在前段，我是注定要做先烈的人，不是注定要做元老的人。……譚嗣同苦笑了一下：「活著留在北京，已無意義；但死在北京，意義卻有的。承黃軫兄和各位看得起我，我真沒齒難忘。可是我已下決心死在北京，對你們的好意，我真抱歉。」<sup>164</sup>

在文本第九章的譚嗣同說到死就是貢獻力量，「死就是貢獻力量的一種方式，當我發現，風雲際會，多少種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現方法竟是一

<sup>163</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回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53。

<sup>164</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捨生〉，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43。

死最好的時候，我就願意一死。」<sup>165</sup>，此時作者安排譚嗣同在變法失敗決定選擇成仁，因此在書寫過程有意塑造有譚嗣同具仁者之性格。

另外在文本第十二章譚嗣同在獄中的無悔並不畏精神：

人間雖眾生百相，但只能做一種人——只能選擇做一種人，同時還得拒絕不做其他許多種的人，儘管其中還不乏有趣的、吸引人的成分。我不能做烈士又做壽星、不能做改革者又做隱士、不能做天仙又做牛頭馬面、不能獻身給國家又獻身給妻子……我所面對的是兩個方面，一面是選擇做什麼、一面是拒絕不做什麼，然後進一步對選擇的，寄以前瞻；對拒絕的，砍掉反顧。<sup>166</sup>

以上段落文本作者將譚嗣同在獄中，對死亡的無悔精神，型塑成有勇者之性格。

接這在文本第十二章從監牢到法場譚嗣同在獄中，作者描述這段途中的情況如下：

譚嗣同他們六個人從上驛車以後，所表現的氣概，也就有了等級之分。六個人中，有人表現得激越，有人表現得沉痛，有人表現得不服，有人表現得怯懦，但是，譚嗣同表現的，卻是一派從容。<sup>167</sup>

以上段落文本作者將譚嗣同從監牢到法場的譚嗣同，形容一派從容的不畏精神型塑成無懼之性格。

綜合上述，作者在型塑譚嗣同角色上透過第三人稱寫出譚嗣同具有愛國，仁者及勇者的形象十分顯明，譚嗣同在參與變法到變法失敗，被補入獄再到被處決，文本一貫的塑造出俠客性格同時也有仁者形象，此以明顯的具有扁平化的特徵，作者採用了三種並列而又關聯的藝術手段：可逃卻不逃，可活卻不活，慷慨赴刑，其中有忠有義有仁，把這三種性格的一切特徵都濃縮在譚嗣同這個人物身上，因此塑造譚嗣同為俠客性格的人物也將這個角色人物扁平化，這樣的譚嗣同人物塑造技巧是完全符合戲劇藝術。

文本另一個扁平人物為西太后，作者提及書中只有一個女人，並且還是個壞女人，文本唯一的女性就是西太后，性格極為突出作者在文本中描寫西太

<sup>165</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04。

<sup>166</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63。

<sup>167</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85。

后專權及權力慾望大讓人有刻版印象由在專權方面第九章描述如下：「由於西太后的專權，「御門聽政」早就沒有舉行了，被縮小了的皇帝，現在，決心用變法維新做最後的掙扎」<sup>168</sup>這裡作者直接就講西太后專權，在文本譚嗣同口中是以老太婆稱之文本中

譚嗣同笑著，「卓如啊，你一個勁兒的想說動我出走，事事都朝出走有好處解釋，甚至要死也該在海外死，你可太愛朋友了。你明明知道要血薦就是要借這口老太婆的刀才妙！這也叫借刀殺人吧？怎麼可以自殺？老太婆殺了我，才證明給天下這個政府無道，大家該革命；若如你所說，不給老太婆殺而去自殺，不但給這個老太婆脫了罪，自己消滅了他們的眼中釘，並且自殺又變成了種種離奇解釋。<sup>169</sup>

上述裡有個含意是由譚嗣同口中說出「老太婆」殺了我，才證明給天下這個政府無道，正是作者由正義的仁者譚嗣同說出不義的非仁者西太后，也用「老太婆」來指名西太后，如此兩位扁平人物好人與壞人在小說中就被型塑。

另外一個扁平人物是大刀王五，王五為譚嗣同的民間至友，大刀王五對人講義氣不出賣朋友，因此也不會出賣譚嗣同，文本第八章以〈大刀王五〉為章名，可見是小說中一位重要的角色，作者介紹王五如下：

王五北京人本名王正誼，八歲時就成了孤兒北京順興鏢局，鏢局的王掌櫃認為養子改姓王，王掌櫃死後，繼承了鏢局。因為他行俠仗義、為人直爽、武功又高，就被人叫做大刀王五。<sup>170</sup>

以上就是作者開始對王五性格的塑造成行俠仗義、為人直爽、武功高超，因此作者再以第三人稱形容王五，對人講義氣不出賣朋友的狹義性格被塑造，文本情節描述有一次濮太守派了官兵幾百人去宣武門外王五家抓人，王五拒捕，官兵不敢強進宅內，第二天，王五到濮太守那兒自首，濮太守奇怪問王：「抓你你拒捕，不抓你你自首，怎麼回事？」王五說：「你來硬的，我就硬幹；你既撤兵，我就投案。」，以上的對話這裡書寫王五為人直爽，接下的對話又塑造對人講義氣不出賣朋友：

濮太守說：我知道你早已洗手不幹強盜的事，但你總要幫我破破案，幾十個案一齊來，豈不給做官的好看！王五說：大人的忙我一定幫，問題

<sup>168</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83。

<sup>169</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06。

<sup>170</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大刀王五〉，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57。

是你大人要賊還是要人？要賊，我可幫忙追回；要人，只好拿我去頂罪。<sup>171</sup>

以上看出王五的性格，可以從濮太守與王五的對話中可看出，文本作者打造王五是一種行俠仗義之性格，另外作者也描述王五與譚嗣同的關係如下：

因為譚嗣同他相信救中國除了和他一樣的書生以外，也必需還包括五湖四海的各行各業人物，因此譚嗣同與王五、胡七有了交友，譚嗣同有個外號「通臂猿」稱王五為「五爺」、胡七叫「七哥」，王五、胡七叫譚嗣同做「三哥」跟這些粗人相偕，稱兄道弟大家肝膽相照。<sup>172</sup>

由上述可知作者書寫了王五與譚嗣同之關係，稱肝膽相照之兄弟，王五也在作者筆下書寫王五外號京師大俠，這是人們讚美他的俠氣，戊戌政變失敗後王五答應了譚嗣同的請求，在譚嗣同死後去迎救光緒皇帝，王五豪爽答應說：「我們弟兄同意去救皇上了，暗號為『崑崙』計劃，細節你三哥不必操心。」<sup>173</sup>，王五俠氣用在與譚嗣同的情誼上文本以戊戌政變前後的支持更顯露出具有譚嗣同與王五均為俠氣之人。

小說中扁平人物的好處之一，在於易於辨認，只要他一出現，就立刻為讀者的感情之眼所察覺。第二種好處在於他們易為讀者所記憶。他們一成不變的留在讀者心目中，因為他們的性格固定，不為環境所動，而各種不同的環境，更顯出他們性格的固定，<sup>174</sup>譚嗣同的盡忠也成為真英雄，也是流血者，文本對譚的塑造其性格，具豐富的感情及豪邁的氣息<sup>175</sup>，在西太后的專權方面文本有時以西太后有時又以老太婆出現，文本出現西太后是作者的描述，老太婆則是文本角色的稱呼，老太婆有貶抑西太后是歷史的尊稱，由此可見文本的交差利用遊走於歷史與文學中，最後王五在戊戌政變前後對譚嗣同的支持展現俠義精神，譚嗣同、西太后、王五這三位在文本裡，都合乎性格固定易為讀者所記憶，小說藝術創作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在於讀者都希望看到經久不衰的、人物始終如一的作品，這就是扁平人物受到青睞的原因。

然而一本複雜的小說，常常需要扁平人物與圓形人物出入其間，以收互相襯托的效果<sup>176</sup>，小說人物所展現出的理念和性質若超過一種因素，其小說故事弧線即趨向圓形，這種小說其特色是能使讀者驚奇，小說人物具有複雜的人性

<sup>17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大刀王五〉，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59。

<sup>172</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大刀王五〉，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60。

<sup>173</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捨生〉，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52。

<sup>174</sup>E.M.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頁60。

<sup>175</sup>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1988

<sup>176</sup>E.M.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頁61。

特質，更能產生小說作品的逼真性，一個圓形人物必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給人以新奇之感，如果他無法給人新奇感，他就是扁平人物，而圓形人物比較不刻板枯燥，在小說裡流露出活潑的生命，小說家可以單獨利用他；但大部份將他與扁平人物合用，以收相輔相成之效<sup>177</sup>，文本卻將譚嗣同明顯的塑成扁型人物如果他無法給人新奇感，並缺少圓形人物或把譚嗣同塑為圓形人物此為人物塑造之缺，或許文本作者想表達譚嗣同的俠義思想而忽略使兩種人物在作品水乳交融，成為一和諧的整體。

### 第三節 譚嗣同的生與死情節結構

本節將譚嗣同的死前及如何死和死後文本作者如何書寫情節敘述為主要研究，以文本「情節」的小說架構及因果關係(causality)兩種結構研究作者對文本的情節敘述，首先以小說的基本五大架構破題、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為開始，接下來以故事情節即因果結構，情節雖是指事件的敘述但重點在因果關係，我將以空間的因果、時間的因果、人物的因果三種因果作為研究方法，其目的在於解讀譚嗣同生與死的文學張力與小說的價值。

#### 一、文本故事情節

「故事」指的是些按時間順序排列的事件的敘述，它是一步一步的引導使讀者想要知道下一步將發生什麼，同時也是讓也讀者不知道下一步將發生什麼，故事雖是最低層和最簡單的文學機體，但也是小說這種非常複雜機體中的最高要素。

歷史敘述是一種簡略的故事，若小說家能精心安排情節才能讓讀者以好奇心發掘故事智慧與記憶，文本的故事雖為戊戌變法但也是小說，也就是必須以用情節敘述故事，而情節是故事中事件的因果關係，故事是小說的基本要素，情節卻是小說的價值所在，文本中譚嗣同「故事」與「情節」的敘事發展架構如下：以法源寺為起點，變法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的變法活動都不時與法源寺相聯繫，在變法的危急時刻，譚嗣同見袁世凱的前夜就住在法源寺，變法失敗，譚嗣同本可逃走但他不肯逃走，他去見梁啟超表達了只有血薦才能喚醒世人，他願做這樣的血薦者，譚嗣同被問斬後家僕胡理臣收屍后抬起棺材，向西走去一座古廟正門上頭有三個大字「法源寺」故事就此倒敘的展開，以上就是文本中譚嗣同生與死的情節結構。

---

<sup>177</sup>E.M.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頁68。

## 二、情節敘事

故事下有事件的發生，敘述重點在因果關係上，如果能讓我們問故事問然後呢？代表情節緊湊，一部好的小說結構的緊密度必有事事相關知因果關係，情節指的是事件的敘述，但重點在因果關係(causality)上，本節將以譚嗣同與不同人的對話是因，以及展現的果是什麼做歸納研究？情節有分線型及非線型兩種型態，說明如下：

所謂「非線型」是用「散點敘事」也是中國傳統寫意敘事的一種基本技法，作家運用一種意向性的結構，將一個個鬆散的、相間似乎關連不大，甚至可以彼此獨立成篇的事件，納入到大的敘事框架中，從而傳達出敘事指向；而「線性敘事」則是「西方傳統最重要的敘事技法之一，極盛於十八、十九世紀，它是用一條或幾條明確的故事情節將事件貫串，因此，事件與事件之間銜接嚴謹，因果分明。<sup>178</sup>

文本情節利用時間及空間創造出什麼結構？文本的章節結構共分內容有十五章加上起頭楔子與結尾的尾聲共十七篇；但因戊戌政變其涵蓋面非常寬廣，文本對主角譚嗣同其情節結構，基本之佈局以北京「法源寺」為地點開展情節，中間十五章以「人物」角色接棒串連方式展開，戊戌事件本末為故事主軸、最後結局亦是以「法源寺」為地點的收尾，把「法源寺」擬人化為歷史的見證者文本是採用線性敘事方式呈現情節。

一般小說結構包括：開始(事件發生)、發展(事件變得複雜)、高潮(事件矛盾、衝突的頂點)、解決矛盾、結局五部分<sup>179</sup>。研究者將藉以上所提示的線性情節架構——破題、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將譚嗣同在文本中作著如何安排他的生與死來做作分析。

### (一) 開端

文本以楔子〈神秘的棺材〉作為小說的開端，作者首先文本之佈局用楔子神秘的棺材為開始，這口神秘的棺材並沒有說是誰的，但透露了四個訊息：第一是日期是8月16中秋的後一天，第二是地點在北京的法源寺，第三這口棺材裝的是被寧遲致死之人，第四人物有四人法師及兩位收屍之人和黑衣人，這四點讓讀者首先成為非理想讀者，其目的是情節需要，引發讀者好奇的去發掘這

<sup>178</sup>吳明麟：《天龍八部》美學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九十一學年度碩士學位論文），2003，第三章 情節結構、敘述視角與時間空間。

<sup>179</sup>張雙英：《文學概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頁147。



口棺材裝的是誰？發生了什麼事？因此才開始有了先解開地點之謎的第一章敘事法源寺的前世今生。

## （二）破題

於文本破題的安排第一章至第三章是小說的破題〈憫忠寺〉第二章〈寂寞餘花〉第三章〈休懷粉身念〉第一章唐太宗時代的「憫忠寺」演進至現代的「法源寺」，這座建築的歷史遠至唐太宗以詔令於幽州城內建寺，意在悼念在東征高麗戰爭中陣亡的將士，近代清乾隆皇帝大修法源寺後，贈送了「法海真源」牌匾，作者以「法海真源」這四個字為文本的起頭也是文本的結語，在破題之處「憫忠」兩字指的紀念為國捐軀之將士，接著第二章〈寂寞餘花〉作者用康有為與法師的對談，論悲劇英雄袁崇煥雖愛國，卻被崇禎皇帝下令凌遲處死，此處的描寫已經隱含了譚嗣同有著相同的命運，第三章〈休懷粉身念〉作者仍用康有為與法師對談描述康有為對改革前途險惡的了解，並以法源寺的丁香花來比喻自己，「丁香潔身自好，也好看、也好聞。但要做中藥，得先磨成粉煮成湯才有用。若不粉身碎骨，它只是好看好聞而已。」<sup>180</sup>，康有為在皇權當道的時代，其背後還暴虐的西太后以及舊勢力，政治改革之路何等艱辛，引了杜甫的詩「休懷粉身念！」而這「休懷粉身念」此處的描寫已經隱含了譚嗣同將在自身上體現出來。

## （三）發展

文本在發展上共有兩段歷程：第一是戊戌政變的關係人物，第二個歷程是譚嗣同自己表答對參與戊戌政變的想法。在破題的過程中因為講到康有為及西太后在改革中所扮演的重要關鍵，因此接下來第四章到第六章作者開始發展西太后、康有為、光緒帝如何影響戊戌政變的因造成譚嗣同在戊戌政變的悲劇結果，第四章〈西太后〉作者論及西太后的崛起與干政，造成改革力量的失敗。第五章〈康進士〉論及保皇派領袖人物康有為也是譚嗣同的老師上萬言書直接給皇上要求改革，這個建議會成功嗎？接著第六章〈皇帝〉作者論及清同治皇帝及光緒帝表面是「皇帝」，實質都是傀儡，他們軟弱到連自己心愛的女人都無法保護，如何能對抗西太后進行改革，以上三人第一位康有為決定上萬言書直接給皇上要求改革，第二位光緒帝軟弱無實權，第三位西太后的崛起與干政創造了戊戌政變的失敗，譚嗣同在其中與三人的關係是人康有為是他的老師，光緒帝是提拔他之人，他厭惡西太后的干政，在此同時他參與了萬言書。以上為小說發展一段歷程影響譚嗣同戊戌政變的關係人物。

<sup>180</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42。

為了進入小說發展第二段歷程作者安排了第七章〈回向〉及第八章〈大刀王五〉這兩章分別讓梁啟超與王五在政變前與譚嗣同見面，讓梁啟超與譚嗣同在法源寺見面並對談，這裡的書寫手法以譚嗣同的詩來開解譚嗣同的佛學用意，在表示回向與往生，關於功德圓滿的爭論，真正的圓滿應為出世後再入世，救世才是佛主，譚嗣同字「復生」光復的復，生命的生，這個名字也帶著譚嗣同的命運，研究者發現文本在這裡運用佛學思想寫出佛法積極的一面，描述如下：

《華嚴經》有『回向品』，主張已成『菩薩道』的人，還得『回向』人間，由出世回到入世，為眾生捨身。這種『回向』後的捨身，才是真正的佛教。真正把握住這種『回向』奧義以後，會發現佛法絕不消極。<sup>181</sup>

此段書寫同時把譚嗣同的命運帶入積極的一面，接下來也論及先出世再入世的智者、仁者描述如下：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這是多麼高的境界！何等華嚴『回向』的境界！王荊公認為人生如夢，一無可求，他什麼都不追求，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個夢到另一個夢裡，他為人間，留下數不清的功德。這種境界，才是深通佛法的境界。這種先出世再入世的智者、仁者、勇者，他們都是『死去活來』的人。人到了這種火候，就是佛。就是菩薩。而這種火候最後以殺身成仁成其一舍，也就正是此夢成真、此身不妄。<sup>182</sup>

上述勇者殺身成仁成其一舍，都是華嚴「回向」<sup>183</sup>的境界，此段暗示譚嗣同的生死選擇是有思想方面他清楚與執著的一面，情節到了第七章〈回向〉是一個轉折也等同於預告譚嗣同將是一位殺身成仁成其一舍的勇者。

情節進入第八章〈大刀王五〉作者讓譚嗣同與俠義之士王五會談，作者讓梁啟超及大刀王五直覺戊戌變法必定失敗，這一章讓兩位關係人與譚嗣同長談，也讓譚嗣同表達變法無論成不成都要去實踐，這是作者安排讓讀者知道變法前的想法，作者為了安排後續變法不幸失敗大刀王五將出現營救光緒皇帝的

<sup>18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回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30。

<sup>182</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回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36。

<sup>183</sup>曹郁美：《華嚴經》的「十回向」，臺北，人間福報，2022年10月31日，「『回向』的梵語是 parīnāma，回、迴二字通用，直截地說回向即「轉向」，若以現代語詞來說「分享」亦甚好。總之，它有兩種解釋：一、以自己所修的善根功德，回轉（分享）給眾生，並使自己趨入菩提涅槃，所謂「上回下向」是也。經典中常見「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指追求無上正覺之道，普及於一切眾生之意。二、以自己所修之善根，為亡者追悼，以期亡者安穩。這是著重於超度亡者，幫助他脫離苦海，步入佛道，有「做功德」義。」

鋪陳，情節發展至此已經到了第八章結束，文本已經走完一半，將進入作者安排的高潮。

#### （四）高潮

文本作者將高潮安排在第九章到第十二章，此四章依歷史寫成譚嗣同參與政變失敗，選擇不逃亡，從容赴刑場，僕人收屍等情節，第九章〈戊戌政變〉譚嗣同決定去見袁世凱希望他能加入政變並論及「捨身」也就是孔子所謂**求仁得仁**思想表達，讓袁世凱知道譚嗣同改革的決心袁世凱表面同意了，「但是，送走譚嗣同以後一個小時，榮祿就得到袁世凱的報告；第二天清早，頤和園的西太后，從榮祿的跪稟裡，也知道了真相。」<sup>184</sup> 這裡描述了政變失敗之主因，袁世凱往西太后靠攏，無法達譚嗣同之所願，政變側底失敗，本章文本作者以第三人稱全視角來書寫戊戌政變失敗緣由及譚嗣同沒有逃走，去了日本公使館，第十章〈搶救〉譚嗣同拒絕梁啟超之勸進入外國使館接受政治庇護，或保護偷渡扶桑，作者又採用譚嗣同與日本人對話的方式辯論辯論日本武士道與中國俠義之不同並隱喻在日本歷史人物月照和西鄉的故事<sup>185</sup>，譚嗣同選擇做西鄉，文本如下：

不過，今天我們雖然發生了懷疑和辯論，我仍願告訴你們我內心的感覺，我是感謝你們的。並且，就個人的俠義觀點說，我相信你們個人的俠義舉動。好了，今天我還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們日本月照和西鄉的故事在一個矛盾局面降臨的時候，總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訴梁先生，月照與西鄉兩位，我和他各自做法一人。<sup>186</sup>

最後譚嗣同選擇西鄉的死法並讓梁啟超活下來繼續變法，情節到了第十一章〈捨生〉文本作者此章書寫安排譚嗣同與王五的對談內容決定以身殉道，而王五願帶領弟兄同意去救皇上了，暗號為『崑崙』計劃。

#### （五）結局

文本第十二章〈從監牢到法場〉作者以章名為書寫主題，做了譚嗣同在監牢與法場的空間及譚嗣同從監牢到法場的行動的情節安排，空間安排及行動領

<sup>184</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戊戌政變〉，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90。

<sup>185</sup>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233-234頁「西鄉是西鄉隆盛。」平山周說，「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為人家俠仗義，他出國回來，在西方壓力和幕府壓力下，進行勤王尊王的活動。後來事情鬧大，由近衛公安排，避難於薩摩，由西鄉隆盛收容。最後牽連到西鄉。月照不願連累近衛公和西鄉，乃伸頭給西鄉，表示寧死於同志之手。但西鄉卻若無其事，與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後兩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搶救，救起了西鄉，可是月照卻淹死了。西鄉後來變法維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遺願。」

<sup>186</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32。

域之安排在本研究文本時間與空間研究已詳述，本章作者描述了譚嗣同從容被捕，在菜市口斬首後譚嗣同的軀體靜靜地仰臥，他的頭顱滾在一旁。

文本書寫譚嗣同在監牢中的心境外還比喻的寫出另一個監牢在瀛臺囚著光緒帝，接下來到了法場的譚嗣同，作者用「他笑了。突然間，像從浮雲裡劃破一條長空，他的喊聲震動了法場：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sup>187</sup>來描寫譚嗣同死前的吶喊，「譚嗣同的軀體靜靜地仰臥在菜市口，他的頭顱滾在一旁，血肉模糊。」<sup>188</sup>此時這也是譚嗣同在文本中的結局，這個結局也讓作者一以貫之書寫譚嗣同從一開始到結局，給讀者的感覺是位愛國、忠君、不畏死的性格，作為譚嗣同文本角色的結束，這個結局與歷史事件並無不同，然而小說是充滿著想像的，作者以第三人稱的書寫方式譚嗣同的吶喊的說「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也說明的作者慣用第三人稱的書寫方式是用自己的告訴讀者，這一段如果用第一人稱來書寫將更貼近小說藝術。

#### （六）尾聲

情節到了第十三章〈他們都死了〉作者書寫了譚嗣同家僕胡理臣收屍後將棺材停在法源寺的後房裡，這裡又回到法源寺證明楔子的神秘的棺材是譚嗣同，從開端法源寺到尾聲法源寺，總共安排情節書寫了十二章，這是一種故事圓形的寫法，再其次作者書寫余法師的說法：

康有為花了十年心血，只證明一件事，就是譚嗣同用鮮血證明的：改良之路是走不通的。他們用失敗證明了此路不通，結論是，要救中國，只好大家去革命。譚嗣同可以不死卻甘願一死，最大的原因，就是要證明這一結論。<sup>189</sup>

以上這段話表面是第一人稱的書寫方法，但研究者懷疑余法師這個角色其實就是作者本人，因為他為戊戌政變下了結論，他利用小說角色譚嗣同一生作為的表達他的歷史觀。

### 三、情節的因果結構

情節雖是指事件的敘述，但重點在因果關係上，我將以空間的因果、時間的因果、人物的因果三大因果。

<sup>187</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84。

<sup>188</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從監牢到法場〉，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85。

<sup>189</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他們都死了〉，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88。

第一地誌空間的因果：「法源寺」為地點開展情節，中間十五章以「人物」接棒串連方式展開事件本末為故事主軸、最後結局亦是以「法源寺」為地點的收尾，把「法源寺」擬人化為歷史的見證者，在情節安排上第一章的地點「法源寺」開展，情節人物主角為康有為，最後一章的地點及人物亦為法源寺和康有為作為結束，讓第一章談生與死經過主角譚嗣同的生與死讓最後一章見證了生與死，法源寺這空間見證了忠烈也做了憫忠。

第二為時間的因果：文本書寫從 1888 的康有為在法源寺開死到 1923 的康有為又出現在法源寺，這段時間法源寺及康有為歷經了戊戌政變之後，大清王朝衰沒中華民國出現，而時間雖無法停留，但法源寺卻一直都存在，表示法源寺對這段期間的風雲及主角譚嗣同做了見證。

第三在人物關係的因果：文本主角譚嗣同的生是為了變法而死，因此研究發現作者利用敘事空間及時間形成了一個圓，而圓心是主角譚嗣同，描述在他的生與死，作者在這樣的情節安排下，具有中國古典小說圓形思維的表面結構如散而聚、聚而散，合而分、分而合，盛而衰其深層結構是來自中國文化在對認為宇宙、社會、歷史、人生呈現著一種圓形的運行機制的生命體悟中，這個情節結構人物以康有為代表是會老的也會死，以梁啟超為代表是聚而散，物以法源寺為代表展現時空的輪迴，而中心是譚嗣同的生與死決擇，他的仁義是入之道，在文學敘事作品有因有果和諧相融，有生有死，有仁有義情結內容即聚張力。

所謂因果式線性結構，內含有兩個明確的要義，其一是該結構模式主要以事件的因果關聯為敘述動力來推動敘事進程；其二是其敘事線索以單一的線性時間展開，不打斷時間進程的插曲式敘述，按線狀結構，各個情節組成部分按時間的自然順序、事件的因果關係順序連接並由開端到結局，向前發展呈線狀延展，雖然有時倒敘、插敘和補敘，但並不改變整個情節的線式格局<sup>190</sup>。作者如此的情節書寫安排，其結構來自於歷史事件的時間序架構，再將情節與人物融入，因此文本在「情節結構」模式的表現結構破題、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方式與地誌空間、時間、人物關係的因果均可看出是以因果式線性結構書寫。

#### 四、本節結論：

情節就是環繞著主題人物的性格以及性格與性格間的關係，在文本中所展開的一系列的生活事件的過程。因為生活事件都是充滿了矛盾、衝突和鬥爭

<sup>190</sup> 張薇，《海明威小說的敘述藝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頁 42。

的，所以情節的概念，又始終和衝突的概念聯繫在一起，情節開展的過程，是通過下基本的部分組成的，那就是：破題、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等。

綜合以上的論述研究者有下列的發現，第一：情節的時間安排是依歷史事件的安排其書寫結構為線性敘事結構，大量的使用對話體，內容傳達中國文化的下意識思想，佛學思想與孔子儒家的思想，文本主角譚嗣同在生死的抉擇對話上傳達了墨家俠義精神，而在文本主角譚嗣同的情緒表現方式大都是以第三人稱的視角來書寫。第二：余法師這個角色推論可能就是作者本人，因為文本作者在第十三章為戊戌政變下了結論，他利用小說角色譚嗣同在戊戌政變過程中所遭遇的一切作為的表達文本作者的歷史觀。第三：文本作者的書寫利用歷史的情節及小說角色譚嗣同傳達中國的佛學及俠義思想，它是一種小說書寫也是一種俠義思想的表達。

#### 第四節 本章小結

佛斯特：小說比歷史更真實，因為它超越了可見的事實。<sup>191</sup>歷史小說重要的創作綱領在於「回到歷史現場」，賦予歷史生動的細節，賦予歷史人物鮮活的生命並讓讀者身臨其境。歷史求真，小說求美，兩者之間有著差距，甚至會有衝突，歷史小說從這個角度來看，正好是在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在文本歷史小說的敘事方面時間及空間的安排、人物角色的設定，在情節結構的安排有下列的結論：

文本在時間的安排作者以譚嗣同被處決後收屍進法源寺為敘事時間的開始，這也是文本真正的敘事時間，文本是從楔子〈神祕的棺材〉開始時間為戊戌（西元 1898）年 8 月 16 日，再以第 2 章康有為進法源寺之時間為 1888 年，到最後一章康有為從返法源寺為 1926 年，共歷經了 38 年，因此本研究第一個發現為作者以倒敘法來敘事文本。

文本在空間的安排，作者讓與譚嗣同相關的四處空間包括法源寺，瀏陽會館，刑部獄及菜市口，在這些地點同時也描述了譚嗣同從討論中國未來之地到參與戊戌政變被捕後入住的監獄及斬首停屍的地方，文本作者利用環境空間的地誌空間，及空間擺設和行動域三項敘事空間，重現了戊戌政變之歷史場景。

文本在空間擺設具敘事性及連貫性，讓讀者進入對擺設的敘事有共感的空間，同時也隱喻傳達譚嗣同從生到死的過程，當有了敘事地點及空間擺設後，文本作者書寫譚嗣同的行動域的方式是線性敘事結構，隨著歷史事件的時間序

<sup>191</sup> E.M. Forster 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頁 55。

結合事件發生的地點，在行動領域按戊戌政變事件讓譚嗣同由生前從南海會館到死後回湖南之行動領域（南海會館〉法源寺〉回南海會館〉日本大使館〉劉湘會館〉刑部獄〉菜市口〉法源寺〉湖南），書寫譚嗣同文本讓他在日本大使館決定求死，若譚嗣同決定求生而去了日本其順序分別為南海會館〉法源寺〉回南海會館〉日本大使館〉日本，一個決定可能改變了行動域也改變了歷史，中文本作者把法源寺納入戊戌政變事件中，讓關鍵行動領域在譚嗣同生前在法源寺第一次遇到梁啟超及最後寫到譚嗣同死後停屍在法源寺如此書寫表現了生與死、動與靜的張力，這種有張力的敘事結構寫法提高了歷史小說的文學性。

在人物角色設定方面文本卻將譚嗣同明顯的塑成扁型人物，無法給人新奇感並缺少圓形人物若把此為人物塑造之缺，或許文本作者想表達譚嗣同的俠義思想而忽略使兩種人物在作品水乳交融，成為一和諧的整體。

在情節的情節結構模式的表現結構破題、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方式與地誌空間、時間、人物關係的因果均可看出是以因果式線性結構書寫。文本對主角譚嗣同其情節結構，基本之佈局以北京「法源寺」為地點開展情節，中間十五章以「人物」角色接棒串連方式展開，戊戌事件本末為故事主軸、最後結局亦是以「法源寺」為地點的收尾，情節讓法源寺默默地看著時間的堆疊然後隨人物的老化浮出把「法源寺」擬人化為歷史的見證者，以上可說文本是採用線性敘事方式呈現情節。

最後以譚嗣同的視角來看文本敘事，研究者發現整部小說的敘事結構是依譚嗣同在戊戌政變的時間序做架構，再以環境空間作為場景，接下來安排情節，而在主角的內容方面以對話的方式傳達思想，這是構成整個小說的一個脈絡，也是文本作者的設計，同時也是文本作者的歷史敘事。這是一部對話體的歷史小說，文本內作者利用故事的角色對話表現出作者的思想哲理與思想，下一章是文本的俠義的思想研究。

## 第五章《北京法源寺》俠義思想

所謂俠客在歷史上是戰國時期周室由盛轉衰、禮法不再，諸侯趁機群起稱王，天下與社會紛亂百家爭鳴之時，俠之名出現在墨家《韓非子·五蠹》篇：「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俠客行事常訴諸武力，保護清官傲惡鋤奸，不在意法律，反而看見平民百姓遇到危難，憑一己之力替人打抱不平排厄解困，史記對這些人稱之謂的俠客。

文本中的主角譚嗣同與王五文本作者如何描寫他們是俠客和具有俠義精神並展現俠義思想是本章研究目的。

### 第一節 文本「善」與「偽善」的之思辨與歸納

俠客來自於行善，善的定義在文本的第2章情節以康有為及法源寺住持余法師，兩人展開一場唐太宗建法源寺到底是善還是偽善之辯，文本人物的對話是經過作者李敖設計過的，這次的對話康有為代表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可是說是代表儒家及余法師代表佛家，對話重點在「善」之思辨。

文本作者雖以故事中的兩位角色對話傳達訊息，其內容的深層意涵其實就是作者的思維表達，作者本身在敘事學稱隱含的作者，因此本研究所稱的隱含的作者就是作家李敖，本節以文本內容介紹兩人思辨善與偽善之過程並加歸納總結心得，有關善與偽善之辯在文本第二章共有以下六段，第一段康有為問余法師唐太宗是不是善：

唐太宗殺弟又霸佔了弟媳婦楊氏及弟弟的五個兒子，後來，他把弟弟追封為巢刺王，把楊氏封為巢刺王妃……這也是以慰亡魂，給生者看？

192

余法師認為這種慰亡魂，給生者看也不能說不是善。余法師在文本中認為：

在中國帝王中，像有唐太宗那麼多優點的人很少……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有些卻不該做他做了。做過以後，他的優點又來收場，我認為他在

<sup>192</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9。



事情過後，收場收得意味很深。蓋這憫忠寺，就是證明。他肯蓋這憫忠寺，在我們出家人看來，是種善因。<sup>193</sup>

此段談到蓋法源寺以出家人「佛」的角度看來，是種善因。

第二段康有為直接問余法師蓋法源寺會不會是一種偽善？余法師回答如下：

判定善的真偽，要從他的做出來的看。做出來的是善，我們就與人為善，認為那是善；如果他沒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說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認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後悔後做了、還是懺悔後做了、還是為了女人寡婦做了、還是為了收攬民心做了，不管是什麼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難說他是偽善。只能說他動機複雜、純度不夠而已。<sup>194</sup>

此段談到余法師判定善的真偽，是要看有沒做，也就是行善才是善。

第三段康有為不同意行善才是善，他認為存心善才算善，唐太宗所作所為是一種偽善。康有為在文本的說法如下：

我所瞭解的善，跟法師不一樣。談到一個人的善，要追問到他本來的心跡，要看他心跡是不是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轉出惡果，仍舊無損於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惡，便算惡，儘管轉出善果，仍舊不能不說是偽善；進一步說，不但存心惡如此，就便是存心不惡，但並沒存心為善，轉出善果，也不能說是善行；更進一步說，存心不善不惡，但若有心為善，轉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稱道的，這就是俗話所說的『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上面所說，重點是根本這個人要存心善，善是自然而然自內發出，而不是有心為善，有心為善是有目的，跟善的本質有衝突，善的本質是沒有別的目的，善本身就是目的。至於無心為善，更不足道，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但比起存心為惡卻反轉出善果來的，當然也高明很多。天下最荒謬的事莫過於存心為惡，反而轉出善果，這個作惡的人，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頌，這大不公道了！所以，唐太宗所作所為，是一種偽善。<sup>195</sup>

以上是康有為在文本中對善的思想表達，這裡我做了一個整理

<sup>193</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9-20。

<sup>194</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0。

<sup>195</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0。

表格 6：康有為對善的斷定

內心	行為	康有為對善的斷定
存心善	轉出惡果	善行
存心惡	轉出善果	偽善
存心不惡	轉出善果	不能說是善行
存心不善不惡	轉出善果	不能說是善行

這裡談到了一個重點，善是自然而然自內發出，而不是有心為善，有心為善是有目的，跟善的本質有衝突，善的本質是沒有別的目的，善本身就是目的，善是「目的論」<sup>196</sup>。

第四段余法師認為上述是心跡，我們無法判斷人是否存善心，人是多麼複雜的動物，它是善惡混合的、善惡共處的，心跡既是這麼不可捉摸的抽象標準，康有為怎麼能用這種標準來判斷善，余法師是用寬的標準來看善，余法師在文本的說法如下：

所以，我的辦法是回過頭來，以做出來的做標準，來知人論世、來以實踐檢驗真理。我的標準也許比較寬，寬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類——就是存心不善不惡、有心為善、甚至是存心惡的三類都包括進去了，只要這四類都有善行表現出來，不管是有意的無意的好意的惡意的，只要有善行，一律加以肯定。所以我才說，唐太宗肯蓋這個憫忠寺，是種善因。<sup>197</sup>

余法師認為心跡狀態是一團亂，無法檢驗，因此只要有善行表現出來，一律加以肯定為善。以上余法師及康有為兩位對善的認定與標準的思想整理如下：

表格 7：康有為與余法師對善的斷定（一）

內心	行為	康有為嚴格的認定	余法師寬的標準
存心善	轉出惡果	善行	善行
存心惡	轉出善果	偽善	善行
存心不惡	轉出善果	不能說是善行	善行
存心不善不惡	轉出善果	不能說是善行	善行

<sup>196</sup> 引自教育大辭典：目的論 Teleology，<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04252/>，2000，「就目的論的倫理學是道德哲學中的概念而言，與之相對的是義務論的倫理學(Deontological Ethics)；其基本主張為：判斷行動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或是否應為義務的標準，在於行動的結果是否能創造人最大的利益，如果能，即合乎道德，並為所應負之義務。」

<sup>197</sup> 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21-22。

第五段為什麼憫忠寺，是種善因不是善行？康有為問余法師蓋了憫忠寺這種大廟都不算善行只算善因，什麼才是善行？余法師認為：

這要看對誰來說。如果某甲有一兩黃金，他出九錢蓋廟，哪怕只能蓋一磚一瓦，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萬兩黃金，他出一千兩蓋了整個的廟，他的善行，比起來像善因，很難算是善行……唐太宗身為皇帝，當然不止是十萬兩的某乙，他蓋憫忠寺，不能算是善行。何況，他有權力根本就不使蓋憫忠寺的理由發生，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麗？不打高麗，就不會死人，就無忠可憫，所以，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麗，那才算是他的善行。……大人物犯的錯，都是大錯。唐太宗若不是大人物，我也不會這麼苛求了。我承認，要求唐太宗那樣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別人的路線，那反倒不近人情了。<sup>198</sup>

康有為問余法師是肯定唐太宗的善了？余法師認為

當然肯定，任何人做出來的善我都肯定，而不以人廢善。至於想去行善、說去行善，那只是一念之善，並沒有行，那是不算的。善和行善是兩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sup>199</sup>

以上余法師認為唐太宗為權力的掌握者，看待唐太宗他善行要嚴格也就是還要加一條行善的標準，就是身分能力所及大小。

以下是文本中康有為與余法師對善的斷定的總歸納：

表格 8：康有為與余法師對善的斷定（二）

內心有沒有善	行為	康有為對善嚴格的認定	余法師對善寬的標準	余法師對善嚴的標準
存心善	轉出惡果	善行	善行	身分能力所及大小
存心惡	轉出善果	偽善	善行	身分能力所及大小
存心不惡	轉出善果	不能說是善行	善行	身分能力所及大小
存心不善不惡	轉出善果	不能說是善行	善行	身分能力所及大小

<sup>198</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22-23。

<sup>199</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22-23。

這裡康有為與余法師對善必須受到檢驗看法相同，但不同的是檢驗標準方式不同。

第六段論及善重視行與儒家重視心善不一樣，康有為認為余法師講的注意行與做並以實踐檢驗真理，跟孟子及王陽明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樣的，的確余法師認為是不一樣在文本做了以下說明：

孟子認為發善情就是善，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謂善矣；王陽明認為在內心就是善，所謂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這些抽象的檢定善的標準，我是不承認的。善必須要行，藏在心裡是不行的。<sup>200</sup>

康有為認為余法師以上講的是不唯心，而佛教是講唯心，余法師又針對唯心在文本做了以下說明：

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執，釋迦牟尼與何羅邏仙人辯道時說：『若能除我及我執，一切盡捨，是名真解脫。』我執就是主觀的心，善如果沒行出來，只憑主觀的心認為已經是善就善了，這是唯心的魔道，不是唯心的正道。唯心的正道是破除這種憑想憑說就算行了善的魔道。真正的唯心在告訴人什麼是唯心的限度、什麼是光憑唯心做不到的。比如說吃飯，必須吃，想吃和說吃並不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為；善也是這類性質，善要有行為，沒有行為的善才真是偽善。<sup>201</sup>

綜述文本中的儒家以康有為代表儒家及余法師代表佛家，對話重點在「善」之思辨，可以看出儒家與佛家對善的定義不同，康有為提到儒家的善是引孟子及王陽明為例，孟子認為發善情就是善，文本引告子章句上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謂善矣」，情為善情，有就是善，同時也引《傳習錄》王陽明與鄭朝朔對話，所謂「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認為善是存於內心，余法師以佛家的善是因，文本用釋迦牟尼的思想「若能除我及我執，一切盡捨，是名真解脫。」，認為唯心是必須放下我執，我執是主觀的心，而必須無雜念的佈施才是善，也就無心行善才是善，文本中出現了孟子，王陽明談唯心，法師認為是抽象的，而佛家講唯心，文本作者認為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執，而我執就是主觀的心，中國哲學講「忘」就是放下我執，因此善要有行為，沒有行為的善才真是偽善，這裡歸納善行才是善，沒有善行是偽善，善需由行為來檢驗善行，因此這裡傳達文本作者「善」的意識論述觀點，善是行為而且要受檢驗，這個檢驗必須是依身分能力所及之大小善行。

<sup>200</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3-24。

<sup>20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寂寞餘花〉，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4。

另外譚嗣同自己的心學認為，人的善心是可以傳遞，並影響他人的，譚嗣同說：「蓋天下人之腦氣筋皆相連者也。此發一善念，彼必有應之者，如寄電信然，萬里無阻也。」<sup>202</sup> 他想信的善念是可以相連，也可以進行傳遞的。接著他舉了焚香告天的例子：「當函丈焚香告天時，一心之力量早已傳於空氣，使質點大震蕩，而入乎眾人之腦氣筋。雖多端阻撓，而終不能不皈依於座下」<sup>203</sup>。譚嗣同強調當人的內心一發出善念，這些善念就會傳到空氣之中，在傳遞的過程中，無論距離遠近不受阻撓，善念均可以對他人的感化，因為他認為人類的本源的純潔的：「心源非己之源也，一切眾生之源也..... 心源一潔，眾生皆潔」<sup>204</sup>。在譚嗣同看來，既然人心都是同出一源，人與人之間可以相互感通，如此一來，善念即會不斷地在人與人之間傳遞感知，當所有人都會受到這種善念的影響，至此人人則皆有皆有慈悲之心，並帶來的大無畏精神力量。因此，只要人人發揮自己的善念，不斷地影響他人，那麼每個人的心力就會不斷增強，以上譚嗣同的人心同源論強調善念、慈悲之心確實是可以感染他人，以心挽劫的目標就不會是空談。

綜合上述從文本對“善”的歸納，以及譚嗣同的人心同源論，均可導出發善情就是善，善念雖是善行的一種，但行善是需要檢驗的，當人的內心發出善念，這些善念就會傳遞並可以對他人的感化，俠客的行善如何受檢驗？下一節將以分析主角譚嗣同俠義精神的人格。

## 第二節 譚嗣同具俠義精神的人格探究

張灝在《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論及譚嗣同所著《仁學》的三個重要觀念：世界意識、唯心傾向和超越心態。並指出

這三種傳統觀念在譚嗣同的生命中熔鑄成一種特有的理想主義精神。他的烈士精神可以說是這種理想主義精神在他生命中的體現，震撼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為早期中國現代知識份子樹立了一個典型。<sup>205</sup>

<sup>202</sup> 張金：《譚嗣同新學思想研究》，（黑龍江，黑龍江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頁19。

<sup>203</sup> 張金：《譚嗣同新學思想研究》，（黑龍江，黑龍江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頁19。

<sup>204</sup> 張金：《譚嗣同新學思想研究》，（黑龍江，黑龍江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頁20。

<sup>205</sup> 引自：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頁135-136。

張灝認為譚嗣同體現的「烈士精神」，是為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建立的「幽暗/批判/超越」的理論架構，也確定譚嗣同在現代知識份子中的代表性。<sup>206</sup>

張運宗在〈忽說此人是我--試析譚嗣同的性格養成〉<sup>207</sup>，論及性格養成可用運用譚嗣同人生中遭遇「先祖」、「親情」、「生死」和「遊歷」四個生命歷程組合起來，養成了譚嗣同性格。

同治十一年(1872)，譚嗣同與伯兄譚嗣貽、仲兄譚嗣襄入宣武城南私塾，開始接受正規的傳統教育，……傳統的教育，死亡的陰影和仲兄的感情，是譚嗣同性格養成的重要因子。譚嗣襄深具傳統家風中文武合一的氣質，成為譚嗣同性格中的典範與變數。

光緒二年(1876)，北京喉風，五日三喪，歷經死而復生的煎熬母親的死讓譚嗣同面對庶母的虐待，他開始置身傳統引發的兩極化矛盾，致使在性格養成上，倔強的外表與憂傷的心理出現撞擊，而逐漸走進不容於世的孤獨。光緒四年(1878)，二度赴甘肅……，西北大自然的無情死亡加深了他的憂，但遼闊的環境也培育了他的志。……開始轉化成為關心國家社會之憂，以及經世濟民之志。

光緒十五年(1889)，譚嗣同性格養成最關鍵的一年。仲兄譚嗣襄的死，讓譚嗣同真正走進完全的「孤獨」。但是，譚繼洵升任湖北巡撫，譚嗣同展開另一段的遊歷，反而結交到許多臭味相投的師友。「孤獨」和「契交」複雜的交織造成矛盾性格的重大轉化。

光緒廿年(1894)，三十歲的譚嗣同透過《瀏陽譚氏譜》、〈莽蒼蒼齋詩自敘〉、〈三十自紀〉，從族譜、少作、自省三個面向，進行由遠至近、自外而內的人生總整理之後，自我選擇成為超脫地球的「縱人」，開始「壯飛」。<sup>208</sup>

以上為張運宗教授縱觀譚嗣同三十歲以前，性格養成的生命歷程，家風中文武合一的氣質，轉為具有倔強的外表與憂傷的心理，去了西北後開始轉化成為關心國家社會，及經世濟民之志，最後譚嗣同成為一位在凝聚成為不容於世的絕對孤獨，及意欲衝決自我矛盾的性格，也決定了活出為國為民的譚嗣同。

---

<sup>206</sup> 張運宗：〈忽說此人是我--試析譚嗣同的性格養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006年，頁 101-129。

<sup>207</sup> 張運宗：〈忽說此人是我--試析譚嗣同的性格養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006年，頁 101-129。

<sup>208</sup> 張運宗：〈忽說此人是我--試析譚嗣同的性格養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006年，頁 101-129。

譚嗣同在三十年後進入政治圈，他的性格如何影響他的人生後半段？在《北京法源寺》的譚嗣同又是如何的被書寫成另一種的「烈士精神」叫「俠義精神」？以下是本節的研究。

文本中所描寫的主角譚嗣同相信要救中國，光憑書生講空話寫文章是不夠的，還要結交五湖四海中的豪傑之士做朋友，他非常欣賞小時候記憶的一首詩「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他相信「仗義每多屠狗輩」「草澤」之中，必有「奇才」存在，於是他找到了在鑲局做保鏢的大刀王五<sup>209</sup>，同時結交義為兄弟其目的是要打到滿州人，推翻清政權，惟譚嗣同戊戌變法政變失敗後不願逃亡，決定敢做敢當一死了之並相托大刀王五仗義救皇上之事。

文本中所描寫的另一位主角「大刀王五」，本名王正誼是一位行俠仗義、為人直爽、武功又高，這個角色合乎《漢語大字典》<sup>210</sup>對俠之定義為“舊指抑強扶弱、見義勇為的人。”但文本中並未展現王五的俠義意識，因為俠義觀來自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遊俠列傳》。」，俠不僅是披甲帶劍，輕生拼命的武者，還有一種仁義精神，這精神是一般武者沒有的，一般來說俠義精神包括扶貧濟困，懲惡揚善；為人仗義，肯於助人；路見不平，替天行道等。文本卻在譚嗣同的口中透露出了俠義的意識型態，研究發現共有 6 點組成了譚嗣同俠義品格特質分述如下：

- 一、無差別心的義舉：光緒帝身為滿人而譚嗣同身為漢人，但譚嗣同認為不問對方是不是滿人，只要對漢人有意義的事，都要去行俠仗義。
- 二、打抱不平之心：慈禧太后干政，光緒帝為弱者，譚嗣同為弱者打抱不平。
- 三、好漢做事好漢當：譚嗣同例舉貫高故事，不能為了自私的緣故而誣攀好人，要好漢做事好漢當，此為俠客之品格之一。
- 四、知其不可而為之：王五發現譚嗣同早知保皇變法終要失敗，但譚嗣同仍肯為他奮鬥的目標去死。
- 五、講義氣：譚嗣同與王五結拜兄弟時，發誓同年同月同日死，在赴獄時寫信給王五提及「弟義不苟生願來生重為兄弟，以續前緣。」，文本書寫來身為兄弟的江湖義氣表現。

<sup>209</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大刀王五〉，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156。

<sup>210</sup>引自《漢語大字典》：中研院語言所搜詞尋字語庫查詢系統 <http://words.sinica.edu.tw/sou/sou.html>

六、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譚嗣同在赴獄時寫信給王五提到：「皇上是滿人中  
大覺悟者，受我等漢人影響，不以富貴自足而思救國，以至今日命陷險  
地，弟義不苟生。」， 將以犧牲自己完成救國思想。

另外文本對中國的俠客分兩個大類，這兩個大類一類是專諸型，一類是荊軻型，專諸型的俠客為私人的小目標賣命；荊軻型的俠客卻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文本作者僅對中國俠客做了兩個分類，但卻並未對這兩類的俠義精神再說明，而小說中的俠義價值是留給讀者去發現，我依具上述俠義品格六大特質做了專諸型及荊軻型俠義的俠客人格特質差異表如下：

表格 9：文本中俠客兩大類表

俠客人格特質	專諸型俠客	荊軻型俠客
講義氣	有	有
打抱不平之心	有	有
好漢做事好漢當	有	有
知其不可而為之	有	有
無差別心的義舉	無	有
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	無	有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遊俠列傳》。」，俠者必須有仁有義，由上表的歸納得知文本對俠義的意識極致，文本中的譚嗣同的所指就是屬於荊軻型俠客也是李敖理想中的俠義人格，李敖書寫《北京法源寺》的俠義精神來自何種思想？

作者在文本中展現傳達了譚嗣同是是一位以國家的大目標獻身荊軻型的俠客，也是俠義的極致，為了解作者在文本中傳達了歷史事件之典範人物及思想，針對文本做了下列的歸納：

表格 10：文本中俠客引述歸納

引述章節	內容	作者引述	思想
第八章 大刀王五	提倡恢復漢室，桃園三結義，大家拜把子，可成大事，忠義千秋。 <sup>211</sup>	《三國誌演義》	恢復漢室可成大事，忠義千秋。 為忠義可以捨身
	明末孤臣史可法也好、張煌言也罷、乃至顧炎武的	作者的歷史認知	為國挺身殉節

<sup>21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大刀王五〉，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171。



	母親也行，他們的挺身殉節。 <sup>212</sup>		
第十章 搶救	一類是專諸型，一類是荊軻型，專諸型的俠客為私人的小目標賣命；荊軻型的俠客卻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這兩個人都被司馬遷記載在裡。 <sup>213</sup>	《史記》	文本中提及司馬遷是最能欣賞俠客，可惜司馬遷沒能指出俠客們獻身的大目標和小目標有多大的不同，中國人也不注意。 <sup>214</sup>
	人物：荊軻	《史記》	文本中提及荊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為目標視死如歸 <sup>215</sup>
	蘇格拉底如果請求憐憫，他們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於這樣，他願意一死他喝下毒藥，還告訴圍在身邊大哭的學生們要安靜，因為『男人要安靜的死』。 <sup>216</sup>	西方哲人	文本中提及蘇格拉底是聖者，但死得這麼英雄，是聖雄，為維持人格而亡。 <sup>217</sup>
	吉田松陰 <sup>218</sup> 順便想想你們日本的維新志士吧，維新的第一功臣，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陰。… 要糾合志士幫助皇帝，失敗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惡勢力前來，失敗了。最後以三十歲年紀，橫屍法場。	日本明治維新	文本中提及吉田死後，全日本受了感召，風起雲湧，最後達文本中提及維新的果實，這證明了吉田雖死猶生、雖失敗猶成功，他以敗為成。 <sup>219</sup>

<sup>212</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大刀王五〉，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174。

<sup>213</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19。

<sup>214</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19。

<sup>215</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23。

<sup>216</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24。

<sup>217</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24。

<sup>218</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32。

<sup>219</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32。

第十章 搶救	西鄉隆盛 月照不願連累近衛公和西鄉，乃伸頭給西鄉，表示寧死於同志之手。但西鄉卻若無其事，與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後兩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搶救，救起了西鄉，可是月照卻淹死了。西鄉後來變法維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遺願。 <sup>220</sup>	變法維新	文本中提及西鄉隆盛 以同志的死為激勵，去努力完成未竟之業。 以死激勵同志
第十一章 捨生	侯嬴 <sup>221</sup>	唐朝王維《夷門歌》	唐朝王維寫《夷門歌》描寫侯嬴說：『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望風勿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以死表示的侯嬴心與信陵君在一起。 <sup>222</sup>

以上歷史典範人物在文本中作者對俠客的敘事邏輯，展現出俠義的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卻要死，俠義之士選擇死亡這件事不這樣做，並不低；這樣做，就更高，不這樣做，並不渺小；這樣做，就更崇高、偉大。因此我歸納出荊軻型的俠客懷有大目標而死的這項人格特徵包含：能為忠義、為國家，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不妥協的維護人格，激勵同志等。也透露李敖心中認為這是俠義之人最偉大的品格除了存善心也是經過檢驗的行善，這些人格特徵與他人有什麼不同又如何展現的世界觀，將在下一節說明。

<sup>220</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34。

<sup>221</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44。

<sup>222</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244。

### 第三節《北京法源寺》俠義的對應關係、意涵結構分析

文學作品的現實就是解構舊有的結構，再結構出新的平衡以滿足社會群體與環境加諸個人的新要求。以下即從文本中去探討李敖對俠義生死呈現一種對立辯證不斷尋求平衡的過程。

#### 一、英雄與凡人之差別

上兩節提到李敖心中認為俠義之人最偉大的品格有哪些，文本提到英雄與凡人有何不同的基本問題，文本情節中不斷有人勸譚不要死，但譚卻執意要死，而選擇死是價值的選擇，也是譚具有荊軻俠義的人格特質，文本提到「他們不這樣做，並不低；這樣做，就更高。不這樣做，並不渺小；這樣做，就更崇高、偉大。」<sup>223</sup>，文本作者認為英雄與凡人之差就在荊軻型俠義的人懂得為捨身取義，凡人求生。

同時文本作者也做了以下的結語「這不只是英雄與凡人的基本問題，這不只是英雄，這是聖者的英雄境界，這是聖雄。」<sup>224</sup>這樣的俠客死後成了李敖心中的聖雄。

#### 二、生與死的選擇

文本也例舉了歷史上荊軻型俠客的生死選擇，歸納如下：

表格 11：歷代荊軻型俠客一覽

時代	事件	生	選擇死
戰國	刺秦王	王子丹	荊軻
戰國	秦國包圍趙國， 趙國求救，魏王	信陵君	侯嬴
戰國	趙氏孤兒	公孫杵臼	程嬰
漢	趙王謀刺劉邦	貫高	同志
日本明治	變法維新	西鄉隆盛	月照
清	戊戌政變	康有為	譚嗣同

以上事件凸顯了兩個發現：首先荊軻型的俠義夥伴為大目標而願意選擇死一方面是俠義的人格特質，另一方面這些選擇生的人在事件後都成名，但荊軻型俠客再面臨生死時就是會做這樣的價值選擇。其次發現從漢朝到清朝，從中國到日本，歷史從古至今都有這屬於軻型類型的俠義人士。

<sup>223</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224。

<sup>224</sup>引自李敖：《北京法源寺》〈搶救〉，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頁 224。

以譚嗣同這種荊軻型的俠義精神，在自己所著《仁學》中體現如下：

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飾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為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於其衷。<sup>225</sup>

魏德東在〈論譚嗣同的成仁理念〉<sup>226</sup>引述譚嗣同《仁學·自序》及梁啟超在《仁學序》兩人所提，譚嗣同認為自我之藐小應為跳出小我、獻身人類的世界觀：

「在《仁學·自序》中說：『以吾之遭，置之婆娑世界中，海之一涓滴耳，其苦何可勝道。』其生死又何可勝道。也引述梁啟超在《仁學序》說：『今夫世界乃至恆河沙數之星界，如此其廣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然則我之一身，何可私而有？何可愛而有？既無可愛，則毋寧捨其身以為眾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以宇宙的無限反襯個人的渺小，並以此作為跳出小我、獻身人類的世界觀依據，為近代諸多思想流派所共有，譚嗣同自微覺意識到這一點，並以之作為捨身成仁的動力，體現了時代精神。」<sup>227</sup>

譚嗣同是為國家大義而犧牲，也這樣犧牲符合李敖所謂的荊軻型的俠義精神，也符合譚嗣同的成仁理念，更符合李敖心中所謂不是英雄與凡人的比較而是所謂的聖雄。

### 三、意涵結構

高德曼的文學研究方法兼具了社會學和歷史觀，肯定所有的歷史研究都必須是社會學的，因為人無法脫離歷史也無法脫離社會一樣<sup>228</sup>，有關「意涵結構」何金蘭在《文學社會學》<sup>229</sup>定義意涵結構如下：

---

<sup>225</sup> 李麗雯：《譚嗣同《仁學》哲學思想研究屠》，（黑龍江，黑龍江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頁12。

<sup>226</sup> 魏德東：〈論譚嗣同的成仁理念〉，〈《哲學與文化》〉第26卷8期，1999年08月，頁760-765

<sup>227</sup> 引自魏德東：〈論譚嗣同的成仁理念〉，〈《哲學與文化》〉第26卷8期，1999年08月/，頁762。

<sup>228</sup> 高德曼(Lucien Goldmann, 1913~1970)，生於羅馬尼亞，在布加勒斯特大曼理學獲法學學士學位，於1934年在巴黎大學取得公法與政治經濟高等研究文憑，隨後到日內瓦追隨瑞士著名尚，皮亞傑(Jean Piaget)研究之後發展出他的「發生論結構主義」的文學批評方法。

<sup>229</sup>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灣，桂冠出版社，1990。

高德曼認為文學是作家的世界觀的表達，是對現實整體的一個既嚴密連貫又統一的觀點；人類行為是一種嘗試，企圖為某一特定狀況找出具意義的解答，並傾向於在行動的主體與這狀況的客體(環境)之間，創造出一種平衡來。當主體的精神結構與外在世界之間的平衡達到某種狀況時，人的行為可以在這狀況中改變世界；這個平衡化的傾向永遠保著不固定和暫時的特性，一直不斷地以這種辯證方式重複延續下去。這個理論基礎應用到文學創作領域上，就成為文學辯證社會學。一般人在面臨要解決的問題時，都會以行動改變狀況；會試著將思想、感情和行為的具意義又緊密一致的結構找出來，而文學創作在付諸行動時也如此；這個結構高德曼稱之為意涵結構。<sup>230</sup>

《北京法源寺》中談戊戌政變脫離不了歷史，歷史上改朝換代也離不開社會中的俠義之士，《北京法源寺》小說內容都合於高德曼的在人類行為的社會學和歷史觀，高氏的結構主義在假設任何人類行為都是一種嘗試，也是在尋求行動的主體與環境的客體間平衡，但是這個平衡是暫時性的，當主客觀條件改變時，不平衡就會出現，主體就得再次尋求新平衡，如此周而復始<sup>231</sup>，然而《北京法源寺》小說一再顯示國家政治的興衰從漢到清，從中國到日本都有這類專諸型與軻型的俠義人士有關，當主客觀條件國家發生問題時，反政權的不平衡就會出現，客體也就荊軻型的俠義人士就會再度出現，也就得再次尋求新平衡，如此周而復始。

高德曼認指出人文事實，是具有意涵結構所構成，其結構包括實踐、理論和情感三種特性，依這些結構；想要解釋和理解它們，必須採取實踐觀點，建立在接受某個價值整體之上的觀點，<sup>232</sup>依本研究《北京法源寺》譚嗣同為主角以歷史事件戊戌政變中的時空為背景，然而歷史上改朝換代也離不開社會中的俠義之士，這些俠義之士由文本中分兩個大類，一類是專諸型，一類是荊軻型，專諸型的俠客為私人的小目標賣命；荊軻型的俠客卻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我們在前面分析了是荊軻型，專諸型的俠客的不同來自於生與死的決擇二元性意涵結構，接下來探討歷史上改朝換代也離不開社會中的俠義之士，荊軻型的俠客又是如何的解決這種現實中的矛盾，《北京法源寺》如何以文學創作，以譚嗣同的視角，書寫譚嗣同總是會憧憬著一個似有實無的「他處」也就是戊戌政變成功，讓國家富強，有時是因為「此處」的困境，譚嗣同遭政治改革失敗的打擊，無能為力救光緒帝被軟禁，讓他產生精神上的痛苦，才引起對「他處」成為荊軻型俠客的想像，也因「他處」的美好而對「此處」產生不

<sup>230</sup>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灣，桂冠出版社，1990，頁152

<sup>231</sup> 蔡振念：《杜甫與唐宋詩學》，〈杜詩世界觀與對立結構〉，臺北，里仁出版社。

<sup>232</sup>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灣，桂冠出版社，1990，頁117。

滿。文本中的譚嗣同在不断變化的現實整體中創造出一種歷史上不斷出現荊軻型俠客平衡，藉以改變現現實之「此處」中的時間、空間、人類社會，對譚嗣同而言，他這種因現實境況而引起的尋求嚮往「他處」的決定，李敖表現在《北京法源寺》文學創作中，這因譚嗣同企圖改變大清帝國，而以文學作品創造出來的一種俠義精神生與死的平衡。

從文本中分析了解作者李敖在書寫譚嗣同的過程當中，在理論的辯證當中，不斷的對俠義生與死呈現一種對立辯證，並不斷尋求平衡，這個過程建立了俠義精神結構，在情感書寫方面，我們也發現李敖在這建構過程中，譚嗣同與兄弟王五及朋友間在文本的對談中，表現的精神結構常是呈現生與死的二元對立的不平衡狀態，卻又時時努力在尋求平衡，也就在這一尋求平衡的過程中，李敖藉文本人物述說由春秋至清都有為大目標犧牲的俠客，也由於犧牲才得以在生與死的價值觀選擇上呈現出俠義的人格特性，以及千古以來國家政權變動時就會不斷的有軻型的俠義人士重複出現，這些都是作者用書寫譚嗣同時所產生的歷史意識。

#### 第四節《北京法源寺》中譚嗣同的世界觀

所謂「世界觀」，乃是一種聯系緊密，不可分割的，關於人與人以及與宇宙之間的聯系的觀點。<sup>233</sup>高德曼認為世界觀的呈現，是社會生活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及思考文學作品與產生作品的社會背景之間的關係，而社會生活和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是在面臨問題時，所致力尋求的具意義的解決辦法，這會與作品或作家的精神結構有關，這些精神結構組織成作家創造的想像世界。<sup>234</sup>

高德曼認為每部文學作品都會有表達一個世界觀，越是好的作品，越有特別豐富和強烈的個人性，也才可以使一個世界觀存活。<sup>235</sup>

綜上所論，《北京法源寺》李敖在書寫譚嗣同的過程中，將其譚嗣同的思想、情感、行為緊密結合所建構出譚嗣同的世界觀為何？是本節所要探討是李敖如何用新歷史主義寫出譚嗣同的世界觀。

<sup>233</sup> 林積萍：〈試論高德曼的文學社會學〉，《黎明學報》，第二十五卷第二期，2004。

<sup>234</sup> 李秋蘭：〈流亡與文學——論高行健〈靈山〉中的「世界觀」〉，《藝見學刊》，第二期，2011。

<sup>235</sup> 李秋蘭：〈流亡與文學——論高行健〈靈山〉中的「世界觀」〉，《藝見學刊》，第二期，2011，頁46：「作品是作者的精神寄託，尋求靈魂出口的一種方式，誠如高德曼所言，作品是面對的解決辦法所構圖出來的想像世界，高德曼認為每部文學作品都會有表達一個世界觀，作品越是偉大，就越具個人特性，因為唯有特別豐富和強烈的個人性 (individualité) 才可以使一個世界觀存活，直至其最終結束。

譚嗣同在《仁學·自序》中論及墨家與俠的關係：

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在漢有黨錮，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體；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在秦有《呂覽》，在漢有《淮南》，各識其偏端。仁而學，學而仁，今之士其勿為高遠哉！蓋即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遠探佛法，亦云汰矣<sup>236</sup>

蔡日新先生對上述譚嗣同墨家與俠的翻譯如下：

依墨家有兩派：一派是任俠的（即付諸行動的一派），它就是我所說的「仁」的這個範疇，在漢代時有黨錮事件、在宋代時有永嘉一派，他們略得了墨學精神中實踐的這一方面；另一派是窮究事物原理的一派，在秦代有《呂覽》之著，在漢代有《淮南鴻烈》之纂，他們各自認識了墨學思想中的一個部分。（倘使）「仁」且兼有「學」，「學」且兼有「仁」，今天的學人大抵不會認為（我這學說）十分高遠吧！（若）融攝墨學的兩派，並將它們比合於孔教和耶穌教，再向深遠之處探索佛法，也可以算是一門大學問了。<sup>237</sup>

以墨家的任俠即是會付諸行動，實踐俠的精神也是實踐仁的精神，王邦雄認為俠客的行誼來自墨家的傳統，墨家生命的表現於外的是義無反顧，慷慨悲歌的壯烈之行，於內在是以「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兼愛情懷，「生無歌，死無服」以自苦為極的江湖好漢，過去墨家在天下太平時，俠客私劍，不免與國法衝突與對抗，墨家面對政治現實，兼愛理想與不能容於當道，此後產生自我放逐後，孟子結合孔子的道德之仁，與墨家的生命熱血，即謂「養氣」工夫，於是所謂的俠客是保有有墨家的悲壯之氣外，也有儒家的道德良心和道家的虛靜自在，他們超然於現實利害之外，不為名利所動與向權勢屈服，以道義為依歸，故謂之俠義<sup>238</sup>

以上若將其譚嗣同在《北京法源寺》中所呈現的思想是墨家的俠義有仁有義，在面對人的方面他對光緒帝、大刀王五及梁啟超的私人情感上，充滿江湖俠客的情誼，在面對國家方面譚嗣同有著犧牲自己完成救國思想，在行為實踐它載仁學所講的「捨其身以為眾生之犧牲，以行吾心之所安。」，我們可以說

<sup>236</sup> 引自：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289～290頁。

<sup>237</sup> 蔡日新：《仁學注析》，臺北，臺北中華仁學會，二〇〇九年八月重新校訂（自行出版以電子檔方式）。

<sup>238</sup> 王邦雄：〈跳機風波與幫會武打—兼談俠義道與俠客行〉，臺北，鵝湖月刊68期，1981，頁34 - 35。

有遠大的目標和捨身成仁的情操，是作者李敖書寫譚嗣同對俠義兩字最重要的意涵結構，《北京法源寺》中譚嗣同的是李敖將其思想、情感、行為緊密結合所建構出來的譚嗣同有著墨家的世界觀。

新歷史主義者試圖建立文學與某個時期一般文化之間互相關聯，為了擺脫舊歷史主義因此建立了新的假設如下<sup>239</sup>：

1 歷史總是「敘事出來的」，過去不曾以純粹的形式出現，總是以「再現」的形式出現；後結構主義之後，歷史也變得文本化。

2 歷史時期不是統一的實體，沒有單一的「歷史」，只有許多不連續充滿矛盾的歷史。

3 史學家對於過去的研究是非超然客觀也無法超越歷史情境。我們所面臨的過去，是從所有已成書的文本中所建構出來的，而文本的理解符合特殊的歷史考量。

4 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關係必須再次重新思考。沒有穩固的歷史可被視為背景來襯托出文學。文學和其他例如通俗作家、神學家、科學家、史學家所寫的「非文學」文本並無二致。

《北京法源寺》建立俠義精神在清代戊戌政變這段歷史由譚嗣同表現出來的俠，這是符合新歷史主義者將文學與某個時期一般文化之間互相關聯，同時在許多不連續充滿矛盾的歷史中以歷史小說的形式所建構譚嗣同的歷史，也都合乎新歷史主義的假設。

新歷史主義指出，歷史充滿斷層，歷史由論述構成。法國學者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說，「沒有文本之外的世界」（There's nothing beyond the text）。<sup>240</sup>，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結構，我們都透過這種結構再理解整個世界，文本以譚嗣同被捕時在獄中候刑時，流傳題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之後被移至北京菜市口法場問斬，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期間，讓作者使用為故事背景作為譚嗣同俠義精神以文補史之素材，是符合新歷史主義之論點。

新歷史主義學家斯蒂芬·傑伊·格林布拉特<sup>241</sup>（Stephen Jay Greenblatt）的觀點是意圖在於打破傳統的歷史、文學二元對立，將文學看作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共同構成一個「作用力場」，使用歷史語境中塑造人性及伸展自由個性和

---

<sup>239</sup>Raman Selden、Peter Widdowson、Peter Brooker：當代文學理論導讀，〈第七章後結構主義〉，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頁237。

<sup>240</sup>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創立「解結構主義」  
<https://db.nmtl.gov.tw/site2/dictionary?id=Dictionary00029>

<sup>241</sup> Stephen Jay Greenblatt 斯蒂芬·傑伊·格林布拉特（1943 11 07-），美國學者，創立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成為20世紀末英美文學分析的主要模式。



昇華人格精神，在被壓制的歷史現象中發出新時代的聲音。<sup>242</sup>李敖筆下的《北京法源寺》，透過語言的敘述方式，敘述者不斷尋找、否定現實，只為了找尋心中的聖雄，是以文學來實現自我存在的價值，所以李敖以曾經有過當過政治犯及入獄的處境，來生命的成熟度，寫出自己寫要東西，也惟有透過文學創作注入自己生命，實現自我的存在價值，體現其「世界觀」，在文本中讓譚嗣同的死昇華了，讓當今世人了解俠義的人格式多麼的平凡又偉大，綜合上述研究分析這本兼具文學與歷史平衡的《北京法源寺》小說，作者李敖具有新歷史主義用歷史小說的型式寫出譚嗣同的歷史意識，讓主角譚嗣同不僅僅是烈士還具有墨家俠客的世界觀。

## 第五節 本章小結

譚嗣同的一生僅活了三十六歲，三十歲以前所經歷的生命歷程，養成了不容於世的絕對孤獨，及意欲衝決自我矛盾的性格，三十歲以後尤其是最後一年經歷了戊戌政變，經《北京法源寺》李敖筆下的譚嗣同產生了俠義性格，有了主角的性格後，作者李敖在文本中藉由譚嗣同的決定為國成仁並完成自我，展現了作者李敖的俠義思想，這個俠義俠義思想首先來自於善念，經本章對文本敘述「善」的歸納，以及譚嗣同的人心同源論，均可導出發善情就是善，善念雖是善行的一種，但行善是需要檢驗的。

俠義本身就一種行善，作者李敖在文本中的俠義思想，對中國的俠客分兩個大類，一類是專諸型俠客，只為私人的小目標賣命；另一類是荊軻型的俠客能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俠客能不能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成了荊軻型俠義行善的檢驗標準，作者李敖把譚嗣同歸類為荊軻型的俠客。

軻型的俠客在《北京法源寺》經本章對軻型的俠客歸納結果，文本一再顯示歷代國家政治的興衰，自春秋到清朝，從中國到日本，當主客觀條件讓國家發生問題時，反政權的不平衡就會出現，客體也就荊軻型的俠義人士就會再度出現，也就得再次尋求新平衡，如此周而復始，作者李敖把清朝的譚嗣同歸類為荊軻型的俠客，並放入了歷史上裡，這表示作者書寫《北京法源寺》裡的譚嗣同是具有感性類與精神類的組合。

作者以這種荊軻型俠客的俠義意識呈現，讓文本中譚嗣同與梁啟超、譚嗣同與梁啟超不斷的對俠義生與死呈現一種二元對立辯證，並不斷尋求平衡，這

---

<sup>242</sup>王岳川：〈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卷）。

個過程建立了俠義精神結構，最後尋求得到，為大目標犧牲的俠客是俠義精神，的一種平衡為止，在李敖筆下的《北京法源寺》在文本中讓譚嗣同的死昇華了，讓當今世人了解俠義的人格式多麼的平凡又偉大，這裡作者把一般認為譚嗣同是「烈士」形象轉換成與譚嗣同荊軻型的俠客具有「俠義」思想的歷史人物。

最後以譚嗣同的視角來看文本譚嗣同的歷史意識，研究者發現整部小說是以法源寺這一個歷史的符號，在忠烈的文化象徵下，書寫在法源寺的環境空間內加入了善於不善生與死的對話，辯證中以中國的佛教、儒家以及墨家做思想上的討論，最終想要表達的是譚嗣同在戊戌政變的行為表現是俠義的思想，這是構成整個小說的一個思想脈絡，也是文本作者的設計，同時也是文本作者對譚嗣同的歷史意識做一個完整的表達。

因此李敖打破傳統的歷史、文學二元對立，將文學看作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共同構成一個歷史和文學作用力場，用譚嗣同荊軻型的俠客具有「俠義」思想，書寫《北京法源寺》讓譚嗣同與戊戌政變這段歷史上的人與事，有了新的歷史敘事，《北京法源寺》敘事過程中，李敖自己也將其思想、情感、行為緊密結合參與，最後以自己的方式建構出新歷史主義的世界觀。

## 第六章 結論

戊戌政變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一場層面非常廣大的政治風暴，同時對後世在政治、社會和國家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後代學者多以它的驟然起落之因探討，從而歸納出對戊戌政變失敗的深層原因之一是滿漢之爭，康有為上奏在華東建設新都，剪掉辮子，改穿西式服裝，改元維新，抵觸滿洲統治的根基相，另外康有為的出現某程度上破壞了原本改革的進程，康有為也是譚嗣同的老師，也影響六君子的愛國思想，最後譚嗣同認為所有變革要流血才會成功，隨著變法運動的手法激進造成政變失敗，於是最後譚嗣同選擇不逃亡並犧牲成仁。

《北京法源寺》書寫的重點在以譚嗣同認為所有變革需要流血的諸多過程，是最能展現作者李敖長於說人物思想的本事，故依戊戌政變歷史事件，將這場風雲變色的歷史之過程，以北京法源寺地誌為背景，賦予譚嗣同的思想重生，並重新演繹於小說之中。

尊重戊戌政變歷史事件的史實是李敖在架構小說文本的先決條件，而在不影響歷史演變下，用想像情節，刻劃譚嗣同，並用對話的方式甚至變換敘事角度，讓這部歷史小說的整體表現，不同於他相關的歷史小說，且從敘事學的角度下以陌生化小說取名《北京法源寺》，是優於其他傳統傳記歷史小說，更可謂是現代歷史小說寫作上的一大突破。文本其特色在前述諸章已分別討論過，審視《北京法源寺》這部歷史小說從主角譚嗣同視角研究所有特點，個人更歸納出小說文本的三項價值發現如下：

### 一、以文補史的貢獻

本研究《北京法源寺》作者在歷史補白的部分，是以譚嗣同因政變被捕在獄中題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流傳之今「兩崑崙」所指為何？一直被後人討論的歷史之謎，本研究發現若從梁啟超的角度而言，兩崑崙是指康有為與俠客王五，梁啟超認為是譚嗣同死亡後想寄託康有為及王五救光緒，並繼續完成變法是一種忠心的表現，若從譚嗣同後代譚訓聰的角度而言「兩崑崙」是比為譚家之家僕胡理臣和羅升兩位家僕對主人的忠心，也比喻如同譚嗣同對國家的忠心是相同的，在文本中作者安排「兩崑崙」是指譚嗣同與王五，因為文本主角譚嗣同與王五兩人的性格具中國式俠義成分也同為俠義之士，這是文本設計也是作者對譚嗣同中國俠義思想表達，「兩崑崙」這段以文補史必須從文本主角譚嗣同的視角才能發現，這是文本作者設計也是對譚嗣同這位歷史人物定位為具中國俠義思想的政治人物。

## 二、歷史小說型式歷史敘事與文學的平衡

在小說必要的要素中時間與空間是分不開的，故事隨著時間不段的推進，空間是人物與情節發生的地方，以時間為背景空間為前景基礎之上，如何佈置空間環境，讓小說人物得以表現，就成為一項表現作者書寫小說的藝術技巧。

歷史小說是一小說型式的一種，它具藝術價值是因將歷史與文學平衡所產生，《北京法源寺》在歷史方面，作者所創作文本結構是以戊戌政變歷史真實事件及人物為基礎，在歷史事件上是用戊戌政變大約百日過程中譚嗣同所發生的真實事件為故事腳本，再以小說中的角色加以情節上的想像及虛構完成文本，經研究戊戌政變所發生歷史真實事件，在文本中無論是時間或事件之因果也見未竄改，在虛構方面文本基於歷史事件加以想像與虛構，創作了主角譚嗣同的俠義性格，讓歷史情節充滿想像，創造《北京法源寺》文本上的環境空間結構，為讓情節之必要性，安排了讓文本中的角色之間，在地誌上北京法源寺做空間移動，表達了北京法源寺這座古剎看到了戊戌政變一切的因與果，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有著對這段歷史的意識的表達，以文本中譚嗣同的思想意識來完成文本的創作，及用筆參與了戊戌政變的歷史。

文本基於歷史事件在想像與虛構中創作主角譚嗣同具有無差別心的義舉、打抱不平之心、好漢做事好漢當、知其不可而為之、講義氣、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的性格也成功的塑造俠義形象在小說中構成了扁平人物，又作者是以第三人稱的全知的視度，運用第一人稱書寫譚嗣同在戊戌政變事件中，與梁啟超及大刀王五見面時發生的對話內容，多涉及歷史故事和哲學變思，這種書方式容易造成讀者僅能「參與」<sup>243</sup>主角的哲學討論，無法進入小說所帶來的想像與情節的嚮往，意味著作者給了許多知識卻讓讀者的想像空間被限制，佛斯特：小說比歷史更真實，因為它超越了可見的事實，<sup>244</sup>小說與讀者的關係來自小說迷人之處，也在於小說必須是小說它並不靠宗教或意識型態建立，而Thomas C. Foster 也提醒小說法則「如果小說本身很爛，無論背後的哲學思想多麼偉大，都是徒勞無功」<sup>245</sup>，這也說明了歷史小說必須將歷史敘事與文學平衡的重要性。

## 三、新歷史主義下《北京法源寺》傳達新時代的聲音

新歷史主義明確主張，文學也是一種參與塑造歷史的動能，新歷史主義認為文學是歷史現實與意識型態結合，因此將歷史事件轉化成文本，再由文本轉

<sup>243</sup> Thomas C. Foster：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 23 堂小說課，臺北，2014，頁 254。

<sup>244</sup> E.M. Forster 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頁 55。

<sup>245</sup> 引自 Thomas C. Foster：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 23 堂小說課，臺北，2014，頁 260。

化成一般公眾的意識型態<sup>246</sup>，文本作者李敖成功的做到了這一點，他將歷史事件戊戌政變成功的以《北京法源寺》歷史小說的方式傳達了，用歷史人物譚嗣同的犧牲，把烈士轉化為俠義人格精神，因此產生了人性的昇華，也讓在被壓制的歷史現象中發出新時代的聲音，文本中讓當今世人了解俠義的人格，是多麼的平凡又偉大，而歷代這些平凡又偉大的下俠客如譚嗣同，他們的犧牲造就一個新時代的重生，但卻進不了忠烈祠的故事，在歷史上的正傳從未被書寫，因此在《北京法源寺》提供了給人們反思的機會，讓讀者在閱讀《北京法源寺》後能有為這些真正的忠烈們回到法源寺原名產生憫忠之情，最後研究者認為《北京法源寺》也是非常具有主觀性，批判性的作品。

目前學界研究戊戌政變小說者極少，是以有關《北京法源寺》歷史小說研究，幾乎是前所未見，因此本研究所獲致的結果，一來可欲研究《北京法源寺》小說者提供先期研究之參酌。其次，本論文的探討結果也為欲研究《北京法源寺》小說者，顯示可參考研究面向，較全面窺見文學與歷史合一的歷史敘事是如何看待這段史實。

據此以歷史敘事的角度來審視《北京法源寺》，雖不否認小說文本整體還是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與缺失。較於傳統傳記類歷史小說它不但在敘事技巧上有創新，尤其是以法源寺這個建築文化符碼，主角譚嗣同在敘事內涵上近乎真實，其次由這次歷史敘事對《北京法源寺》主角譚嗣同做了一次徹底掃描，個人不但由文本經歷了譚嗣同在戊戌政變失敗的心路歷程，更搜尋到新歷史主義下書寫歷史小說的新興價值，所以本論文研究的成果在於新歷史主義的敘事關照下，歷史小說文本研究之有了新領域發現，最後本研究僅限於文本主角譚嗣同研究，而對於文本其他角色梁啟超，康有為，大刀王五，以及其他如李敖先生所提在文本中重要的主題：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隱、朝野、家國、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強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變、去留、因果、經濟（經世濟民）等等，等諸多範疇皆值得深入研究探討是本研究不足之處，希望未來有更多學術研究者，投入此學術論文研究探討分析。

---

<sup>246</sup>盛寧：新歷史主義，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28-29。

##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 一、專書

- [1]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香港，友方出版社，1958。
- [2] 劉鳳翰：《記袁世凱與戊戌政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 [3] 譚訓聰：《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
- [4]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 [5] 王樾：《譚嗣同變法思想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 [6] 李敖：《李敖回憶錄》，臺北，商業周刊出版社，1997。
- [7] 李敖：《北京法源寺》，臺北，李敖出版社，2000，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珍藏版。
- [8] 張建偉：《溫故戊戌年》〈譚嗣同獄中題壁詩考〉，臺北，時英出版社，2002。

### 二、文學理論專書

- [1] 羅伯特·休斯：《文學結構主義》，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
- [2] 高宣揚：《實用主義和語用論》，臺北，遠流出版社，1995。
- [3] 盛寧：新歷史主義，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 [4] 盧卡奇：《小說理論 Die Theorie des Romans》，譯者：楊恆達，臺北，唐山出版社，1997。
- [5] Raman Selden、Peter Widdowson、Peter Brooker：當代文學理論導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
- [6] 史蒂芬·馬爾霍爾(Stephen Mulhall)：《海德格與存在與時間》，譯者：亓校盛，五南出版社，2001。
- [7] 張雙英：《文學概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
- [8] E.M. Forster 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2002。
- [9] 海登·懷特著，陳永國，張萬娟譯：《後現代歷史敘事學》〈當代歷史理論中的敘事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10] 蔡振念：《杜甫與唐宋詩學》，臺北，里仁出版社，2003。
- [11] Chris Barker 羅氏宏等譯：《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臺北，五南出版社，2004。
- [12] 彼得·蓋伊·劉森堯：《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 Savage Reprisals : Bleak House, Madame Bovary, Buddenbrooks. 》，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 [13]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

- [14] 張薇，《海明威小說的敘述藝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 [15] 陳澄巧：《圖解文化研究》，臺北，易博士出版社，2007。
- [16] Thomas C. Foster：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 23 堂小說課，臺北，2014。
- [17] 李歐納·科仁：《擺放的方式：安排物件的修辭》，臺北，行人出版社，2014。

### 三、期刊

- [1] Gabriel Zoran：〈*Poetics Today*：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Vol. 5，No. 2，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Fiction (1984)，pp. 309-335。
- [2] 王岳川：〈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 年第 3 卷）。
- [3] 魏德東：〈論譚嗣同的成仁理念〉，《哲學與文化》第 26 卷 8 期，1999 年 08 月
- [4] 趙稀方：〈當代文學中的歷史敘述〉，福建，東南學術，2003 第 10 期，2003。
- [5] 林積萍：〈試論高德曼的文學社會學〉，《黎明學報》，第二十五卷第二期，2004。
- [6] 張運宗：〈忽說此人是我--試析譚嗣同的性格養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006 年
- [7] 程錫麟：〈敘事理論的空間轉向〉，《江西社會科學》，2007 卷 11 期，2007。
- [8] 龍迪勇：〈空間敘事學：敘事學研究的新領域〉，《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8 第 6 期，2008。
- [9] 龍迪勇：〈空間敘事學：敘事學研究的新領域—續〉，《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9 第 1 期，2009。
- [10] 張瀛太：〈從敘事視角之運用看朱西甯小說的寫作技巧〉，臺北，《人文社會學報》第 5 期，2009，張瀛太：〈從敘事視角之運用看朱西甯小說的寫作技巧〉，臺灣，《人文社會學報》第 5 期，2009。
- [11] 李秋蘭：〈流亡與文學—論高行健〈靈山〉中的「世界觀」〉，《藝見學刊》，第二期，2011。
- [12] 狹間直樹(はざまなおき)：〈梁啟超對「國家」認知的心路歷程〉，《南國學術》，澳門，第 20163 期，澳門大學編輯出版，2016。
- [13] 魏德東：〈論譚嗣同的成仁理念〉，《哲學與文化》，第 303 期，2017。

#### 四、學位論文

- [1] 吳明麟：《天龍八部》美學，臺北，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
- [2] 黎慕嫻：《敘事性的時間問題》，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4。
- [3] 黃郁秀：《張天笑太平天國小說藝術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4。
- [4] 洪坤雄：《尚洛霍夫靜靜的頓河史詩創作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2005。
- [5] 曾建誌：《北京法源寺》救國思想對民族教育重建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2010。
- [6] 李麗雯：《譚嗣同《仁學》哲學思想研究》，黑龍江，黑龍江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 [7] 張金：《譚嗣同心學思想研究》，黑龍江，黑龍江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

#### 五、其他

- [1]楊照：〈評論李敖：李敖與文學〉，臺北，中國時報 2000.2.17。
- [2]古添洪：〈讀李敖《北京法源寺》〉，臺北，觀察雜誌第 24 期，2015。

#### 六、圖片

1957 年 2 月，湖南省博物館將其匯裝成《譚嗣同遺墨》集，譚嗣同遺墨集為冊頁裝訂，共收入譚嗣同遺墨 15 件，計有給夫人李閏書 3 通，給鄒岳生札 1 通，獄中遺札 3 通，給張薊雲札 1 通，給大伯父譚繼昇夫婦 4 通，《送別仲兄泗生赴秦隴省父》七律 4 首，木版印名刺 1 束。此為博物館網址 <https://www.hnmuseum.com/zh-hans/zuixintuijie/>《譚嗣同遺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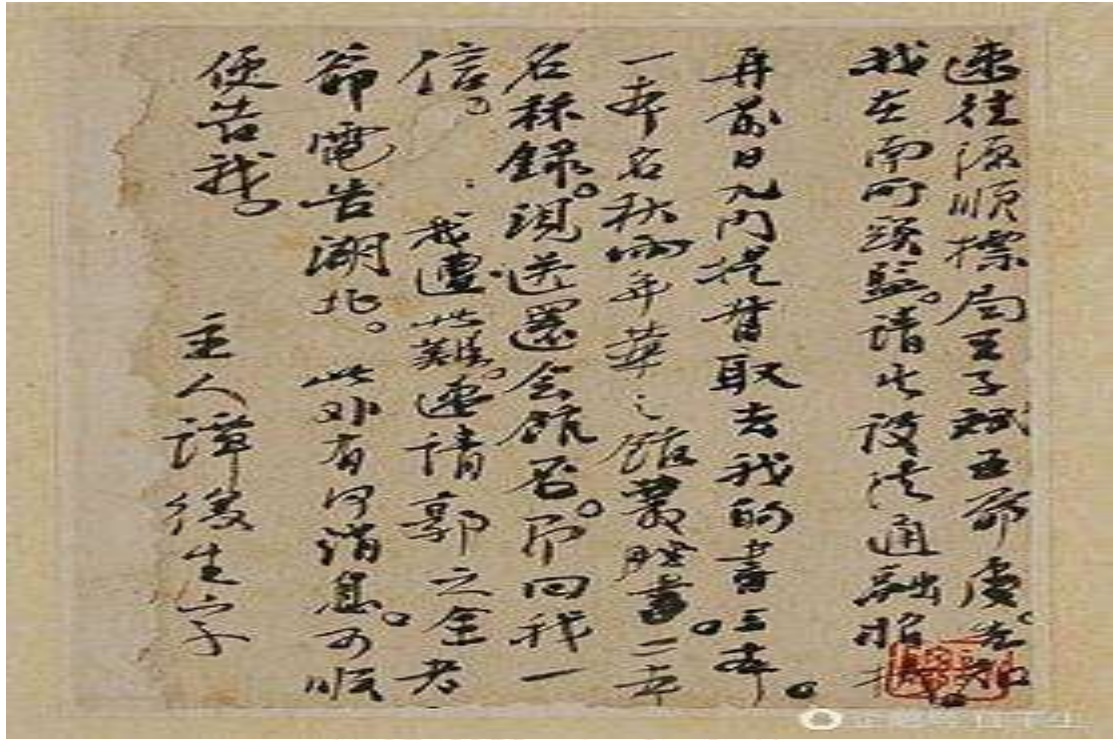


圖 1：獄中遺札第一封

來信知悉。爾等滿懷忠愛，可嘉之至；謝得軍機摺，不用遞了。昨送來各件，都不差缺。我在此毫不受苦，爾等不必見面，必須王五爺花錢方能進來；惟王五爺當能進來。並託其趕快通融飯食等事。湖北電既由郭寄，我們不必寄了。戈什可回湖北。昨聞提督取去書三本，發下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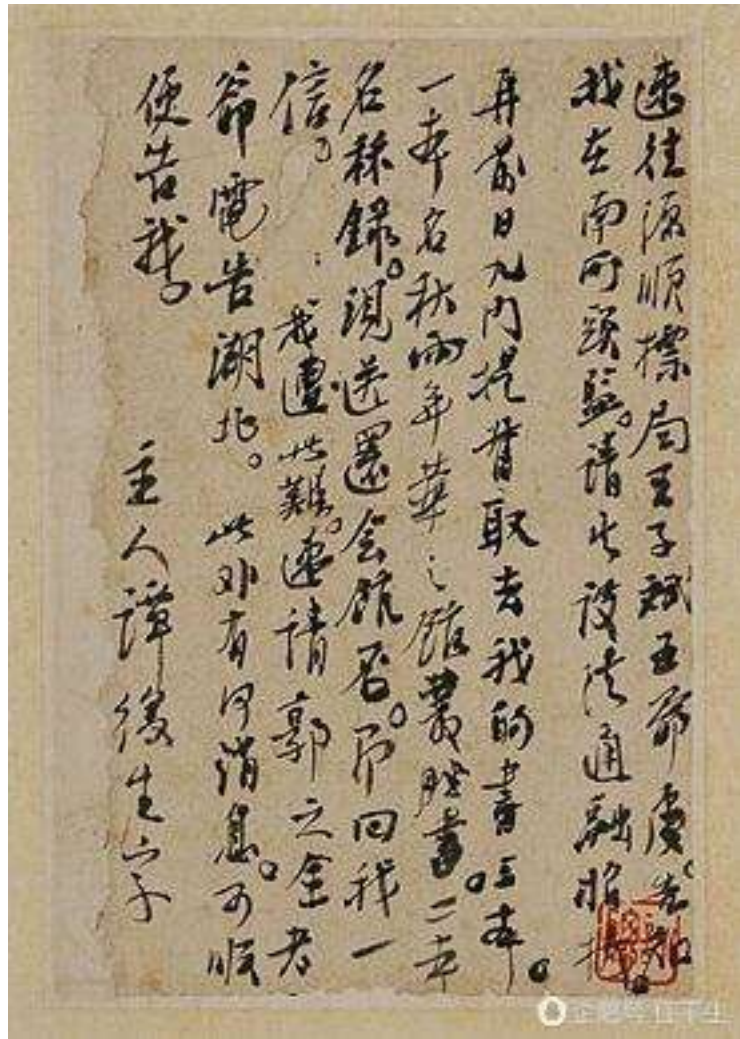


圖 2：獄中遺札第二封

速往源順標局王子斌五爺處，告知我在南所頭監，請其設法通融招扶。  
再，前日九門提督取去我的書三本：一本名《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二本  
《名稱錄》，現送還會館否？即回我一信。  
我遭此難，速請郭之全老爺電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順便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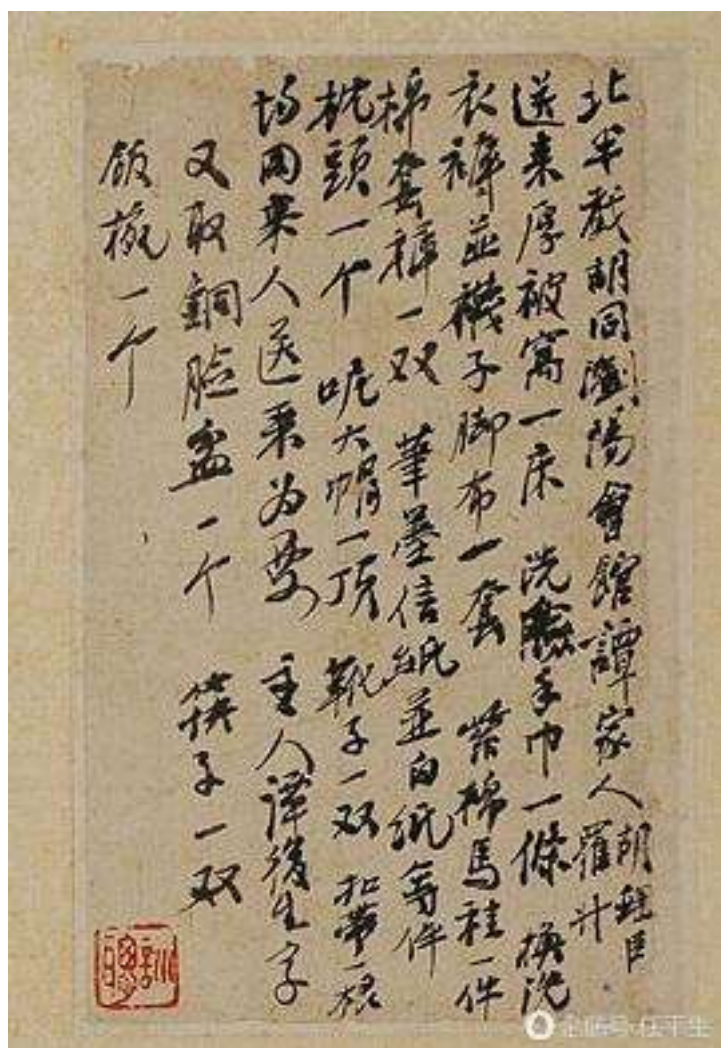


圖 3：獄中遺札第三封

北半截胡同瀏陽會館譚家人胡理臣、羅升：送來厚被窩一床，洗臉手巾一條，換洗衣褲並襪子腳布一套，紫棉馬鞋一件，棉套褲一雙，筆墨信紙並白紙等件，枕頭一個，呢大帽一頂，靴子一雙，扣帶一根，均同來人送來為要。

主人譚復生字

又取銅臉盆一個，筷子一雙，飯碗一個。